

乔姆斯基文集

# 宣传与公共意识

【美】诺姆·乔姆斯基 戴维·巴萨米安 / 著 信强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

就其思想的广博性、新颖性、震撼力和影响力而言，乔姆斯基可能是在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纽约时报书评》

乔姆斯基以无情的逻辑，引导我们仔细倾听领袖们的言论，甄别他们所省略的东西。不管是否同意，我们无法忽略他的观点。

——《商业周刊》

乔姆斯基的作品是理性和激情的混合体。他述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然而，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知道和不能遗忘的东西。

——马库斯·G·拉斯金

ISBN 7-5327-3892-2



9 787532 738922 >

定价:26.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世纪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传与公共意识/(美)乔姆斯基著;信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乔姆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 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

ISBN 7-5327-3892-2

I. 宣... II. ①乔... ②信...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②舆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G219.712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039 号

## 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outh End Press, 7 Brookline Street 1, Cambridge, MA

02139-4146, USA. [www.southendpress.org](http://www.southendpress.org)

Copyright (c) 2001 by David Barsamian and Noam Chomsky

For rights, contact: [southend@southendpress.org](mailto:southend@southendpress.org)

[www.southendpress.org](http://www.southendpres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5-08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 宣传与公共意识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戴维·巴萨米安  
信强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892-2/D·079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

——代序

陆建德

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

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的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着、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哈罗德·品特<sup>①</sup>

## (一)

作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英国剧作家品特所说的现象：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在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中，形容词“Orwellian”(奥威尔风格的)出现的频率很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描写了一种“新语”，它以模棱两可、颠倒黑白为基本特征。乔姆斯基屡屡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中奥威尔式的“新语”。比如，美国把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数百名战俘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些数年前就放弃武装抵抗的中亚



穆斯林是名副其实的战俘,但是有了“敌方战斗人员”之名,他们就被美军强行剥夺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所规定的种种权利。

揭开“新语”的假面具,诊断并治疗语言的核心已染上的顽疾,这是乔姆斯基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业。世有“无多言,多言多败”的古训,但是乔姆斯基早已置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于不顾,直言无隐。这位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已 77 岁,著述之余仍时常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接受采访。他像中国古代的圣哲一样,忙于公共事务,不遑宁处。难怪 U2 乐队的主唱博诺把他称作“永不停息的叛逆者”<sup>②</sup>。

奇怪的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乔姆斯基在我国只为少数语言学家所知晓。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一起推出他的五部著作,堪称今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件大事。《恐怖主义文化》(1988)、《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和美国的政治文化》(1993)、《宣传与公共意识》(与戴维·巴萨米安合著,2001)、《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1986,2002)和《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4)基本上反映了作者政论的主要方面和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渊博的学识、雄辩的风格。

## (二)

乔姆斯基半个世纪前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都有重大的理论和

实用意义,据说人机对译系统的开发也得益于他的学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被普遍认可。在由弗兰克·克莫德主持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里就收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撰写的《乔姆斯基》(1970),这套丛书介绍的“大师”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必说,乔姆斯基在这批现代思想家里是最年轻的。

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是不是与他的政论著作(例如这五本书)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要准确介绍他的语言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他与当时流行美国的行为主义者的差别。乔姆斯基划时代的《句法结构》问世那年(1957),美国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发表《言语行为》一书。乔姆斯基写了言辞激烈的负面书评。斯金纳当时是哈佛的知名教授,乔姆斯基虽有天才之名,毕竟只是麻省理工的一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员。斯金纳相信,人的行为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程序操控,即使是知识的获得,也可由所谓的“学习机”的强化和奖励机制来主导;人与动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经训练后连鸽子也能打乒乓球),人类自由、尊严之类的语言无助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基于这种信念,斯金纳把语言行为也解释成对环境或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然而乔姆斯基把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心智天生具有创造活力的象征。婴儿的心智在学说话的时候并不是白板一块,因此他(她)不简单重复,创新是他(她)的固有天性,这就是人的本质。行为主义者以科



学的名义贬低人性,驳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们眼中的心智没有独立性可言,它不是被动的容器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狗。乔姆斯基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赞赏的是笛卡儿和洪堡的语言观,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潜能,使这种潜能不受拘碍地发展是社会和教育的长期目标。

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也许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某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犹如斯金纳的激励机制训练他的乖乖的动物。美国意识形态的大氛围是不是会像斯金纳设计的护理婴儿的空调柜子那样无微不至地养育并决定美国民众的好恶?

越南战争和美国主流媒体为之正名的宣传更使乔姆斯基意识到,美国普通百姓知道的信息有限,他们掌握的“事实”是经人选择、描述的,于是久处“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而不自知,稍稍受到一点点拨和刺激,他们就会作出预料中的理想反应。在冷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过程中,这种旨在操纵人们思想的“新语”都在积极运作。但民众一旦觉醒,也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战活动是最好的证明。1967年,乔姆斯基因参加向五角大楼进军被警察拘留,一同被临时关押的是小说家诺曼·梅勒。参与反战的经历触发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趣。《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和《对亚洲作战》(1970)两本书预示了美国社会一位古代以色列国耶利米式的批判者的诞生。

1970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

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罗素晚年发起禁止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他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可以断定,乔姆斯基得到这一荣誉的原因是剑桥学者在他上述两部政论著作中看到 he 继承了罗素和平主义的精神。这次演讲名为《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分两部分,分别为“论解释世界”和“论改造世界”。乔姆斯基说的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在演讲涉及越南战争的部分,乔姆斯基提到“东京湾事件”纯系捏造,这一指控已为 2005 年 10 月 31 日的《纽约时报》证实。<sup>③</sup>

### (三)

乔姆斯基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裔,父亲是美国颇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也算是克绍箕裘了。年轻时乔姆斯基曾在以色列生活学习,他从来未曾因自己的族裔原因而放弃对以色列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方面对巴勒斯坦都是一味袒护。他指出“以一巴冲突”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应改为“美/以一巴冲突”。以色列始终以美国为后援(或者说美国外交由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所左右),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美以联合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乔姆斯基的《致命的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了解中东问题缘起的必读书,也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犹太民族确曾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令乔姆斯基失望的是,当一些



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很多犹太裔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同胞在巴勒斯坦欺压本土阿拉伯人的行为是痛心的,以色列修正学派史学家、海法大学的伊兰·帕泼博士的新著《现代巴勒斯坦史:一块土地,两种人民》(2004)试图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立国前后的历史,这表明以色列国内也存在批评政府的声音。在《霸权还是生存》一书里乔姆斯基简略地谈到以巴和平进程。他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说阿拉法特)在压力下不断作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让步。当乔姆斯基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时他引用的是来自以色列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例如:以色列史学家、后来继列维任以色列外长的什洛莫·本-阿米的话道出实质:“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把这种彻底处于依附状况的“巴勒斯坦国”比为南非在实行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为黑人族群圈定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令人遗憾的是以往中国读者只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协议,仿佛它是外交解决的典范。

既然提到乔姆斯基严厉批评以色列,还得一提 2005 年 11 月 29 日乔姆斯基和哈佛法学院讲席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就中东和平进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人以为乔姆斯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只是业余水平,真正的专家不会重视他的论证,<sup>④</sup>那就大大地错了。这位德肖维兹是美国的明星学者律师(曾为辛普森辩护),他的《为以色列一辩》(2003)一书竭力以律师的语

言解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sup>⑤</sup>，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学者中已很难找出比德肖维兹更能言善辩的斗士了。我相信，乔姆斯基敢于就他曾讨论过的议题（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洲的战争与和平等）与美国有关领域的任何“职业选手”辩论。对纷繁复杂的细节的透彻了解，对各类原始材料的驾驭引用，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和敏锐的识别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被他批评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畏而又可敬的对手。

#### （四）

有一种宣传是标语口号式的，目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宣传者强聒不舍，效果恰得其反。另一种宣传作用于无形之中（说得肯定一点就是“润物细无声”），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宣传”的名号。美国多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为了取得实效非得小心翼翼地隐瞒真正意图，也不让有些话题背后的推动者露出马脚。一些对所谓“事实”的讨论后面往往潜藏着利益。政府为推动某一政策也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一般不命令受众全盘接受，有关部门会通过隐匿的权力网的徐徐引导之手“制造赞同”。<sup>⑥</sup>问题的形成、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公开讨论，其根源并不是澄澈透明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一实例来了解乔姆斯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揭露所谓“事实”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美国媒体不断传来消息：建立于30年代“市场失灵”



期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破产,政界人物也提出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该体系的基金管理人预测,到2032年,基金将严重不足,工人保障金只能拿到应得数额的四分之三。乔姆斯基坦然说道,要预测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几乎是开玩笑,发出警报的人所依赖的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基金管理者假定的美国今后经济年增长率为1.7%,这数字远远低于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它居然会被用来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像是别有用心。乔姆斯基乐观预言,将来的美国工资和社会保障税款都将有可观的增长(这已被证实)。“狼来了”的呼声之所以出现,乃因基金管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想把这笔巨款投入股市,它将成为华尔街的财源。当时投资股市的收益要比购买政府国债高。但乔姆斯基反对把社保基金用来投机冒险。他坚持,如何管好基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反之,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互相扶助,团结一致。如基金真的遇到麻烦,调高甚至不设社保基金征税最高限额(当时为72600元,年收入中高于此数的部分不必付社保税),就可解决。乔姆斯基作这番分析时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正在疯涨,第二年股市急转直下,当时若动用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美国中下阶层受害最大。预言危机者实际上想把美国的公共事业私有化,他们先要说这些事业机能失常,然后交给私营企业去管理。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和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时,乔姆斯基不断显示出类似的犀利眼光。

我国的拉美研究是较薄弱的,对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与我国尚未建交的中美洲各国(有的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历史文化

与政治我们更是所知不多。乔姆斯基的这几部作品(特别是《恐怖主义文化》)中牵涉中美洲的内容很多,对我们的帮助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欧美知识分子对中美洲政局议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奥特加总统的朋友。

1979年7月,独裁统治尼加拉瓜多年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美国担心根据门罗主义早被圈定为自家后园的拉美会继古巴之后再出现一个左翼政权,于是就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深表关切。后来美国国会竟直接干预尼加拉瓜内政,表决通过支持该国反政府军的法案,其内容几乎与宣战相去无几。反政府军在美国支持下袭击教育设施和农场,桑地诺政权的社会建设规划无法正常付诸实施。美国一次次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罪魁祸首总是有碍于它实现霸权的一方。1984年,美国以桑地诺政权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诸国提出的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欧共体各国向尼加拉瓜施压。不料尼政府出其不意地接受协议,美国羞怒交加,立即另找借口展开新一轮宣传攻势。此事个中细节读来虽然有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人寒心:美国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感兴趣。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致使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出丑(但在美国国内,诺思上校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翌年8月5日,亦即国会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两天后,里根政府抛出中美洲“和平方案”,以此作为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指导性文件。方案要求尼加拉瓜改变政治制度,交战双方都停止输入武器。乔姆斯基如此评

论这一方案：

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常常如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必理会协议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sup>⑦</sup>

幸好这方案在首脑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乔姆斯基上面这番经验之谈何其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将国际条约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手段。其实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早就在对美国国际法学会发表演讲时明言，涉及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的问题便不复存在，美国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与限制。也许在艾奇逊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还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精心制作合法性的幌子，近年来则是对外界的反应毫不在意，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尽由美国自由选择。乔姆斯基不无感叹地写道，正是通过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或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美国尝到并迷恋上做“人类的老爷”<sup>⑧</sup>的甜头：

悲惨的事实是高压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以暴行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



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非较为弱势的民族所能享有。

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制裁同样残暴不仁。为了更易一国合法政权，“解放”所谓受压迫的人民，先对该国实行严厉制裁，借饥饿和疾病之手夺去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妇孺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灾难归罪于受害国政府及其政策。乔姆斯基追溯了这一符合所谓“法律程序”的毒计的渊源，发现早年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和后来的美国人清除印第安人的手法也讲“人道”。《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写道，美国人“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完成了西班牙人未竟的事业：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灭绝印第安种族。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镇压、征服要比托克维尔所知道的血腥得多，当今的美国史学界已无意为自己国家与生俱来的污点遮遮掩掩。

## （五）

比较或对比，这是乔姆斯基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中用得特别频繁的方法。他会将两次事件突兀地并列，让读者意识到两者如此类似，然后指出美国政府或舆论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1918年1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议会，为此受到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的责难；同年几个月之后，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解散

了海地的国民大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上一些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恐怖行为受到广泛的谴责,最近还有电影强化人们的记忆;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时被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炸毁,机上73人罹难,其中包括获奥运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此事已被人们扔入记忆的空洞。在80年代,波兰一宗教界人士被暗杀,美国不依不饶,波兰政府严惩凶手;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广受教民爱戴的罗梅洛大主教被害(1980年),六位耶稣会教士遭暗杀(1989年),美国不加顾问,歹徒逍遥法外。胜利的人侵者追究萨达姆部下使用毒气的责任;美国自己在越南打了一场化学战,橙剂、脱叶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并致使很多婴儿畸形;英国于1919年入侵阿富汗时,国防大臣丘吉尔下令使用毒气,在阿富汗人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借此“迅速结束前线普遍的无序状态”。这样的比较事例,乔姆斯基可以举出很多。现在的国际社会对非法入侵和占领已经习以为常。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三十年代的国联默认德国的侵略,我们就会谴责可耻的绥靖政策。易位思维导致惊人的结论:“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

对类似的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这是美国实施双重标准吗?乔姆斯基告诉我们,其实美国有多重标准,所有标准自始至终都为一个宗旨服务:谋求美国利益(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年初的《告别演说》里提醒美国人警惕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感触尤深的是美国媒体紧密配合政府，实行自我审查十分积极。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乔姆斯基写道：“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狺狺狂吠。”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sup>⑨</sup>

美国式宣传的成功来自精心培养的民众心中的“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美国政策往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1987年，英国《卫报》驻华盛顿记者布鲁默在评前面提及的美国版中美洲和平方案时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美洲各国和平努力的台，惟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这几本书中有很多分析美国媒体、揭穿美国宣传的内容。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sup>⑩</sup>。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极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掌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



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为维护本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履行承诺，切实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文件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官员一次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交代了相关的各种细节，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制裁有何合法性可言？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演示了“窃钩窃国”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丛林法则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在这过程中，国际组织也常为强权提供方便。在《海盗与君主》的1986年初版序言里，乔姆斯基转述了一个故事，其主旨与这两条中国成语十分相似。亚历山大大帝曾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说：“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强权即公理，所以恶人、战犯都是被打败的。只有崇拜权力和胜利的人才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的事例绝非鲜见。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是一个现实，在他所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还是可以容忍，当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非凡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波斯人的军旗上点缀起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迷人符号，世人不免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侮辱，也会挺身而出，好意劝说：“这又何必？”上帝之友来到为战火所蹂躏的别国领土，向当地那些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终获“自由”。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当仁不让地纠正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 (六)

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乔姆斯基的这套书将大大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同时又提升我们与美国对话的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往我们经常凭一些简单概念、抽象名词来为一个国家定性。说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之类空洞无用的套话。其实美国国家政府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乔姆斯基在六十年代末的科研项目大都是为国防部做的,实验室经费来自三个军工部门,而且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预算的90%来自五角大楼。后来,随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在预算中比例的扩大,名为私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国家主导了美国的研究开发系统,那些富有开创性、风险高而且又不会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国家的资助。计算机、卫星、晶体管都先由公共部门开发,然后转交私人企业。假如研究没有经济回报可言,那么它的成本和风险是社会化的,亦即由纳税人大家来承担。如果研究取得成功,国家机构就会把成果转让给私营公司开发,收益是私有化的。乔姆斯基因此称美国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阅读乔姆斯基,我们也得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绝非始于中国纺织品冲击美国市场之时。里根经济学是所谓放任自由的经济学,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吊诡的真理:里根政府是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政

府。为挽救本国工业,里根政府大大增高贸易壁垒,市场并未充分向外开放。正是这些措施防止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冲垮美国工业基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社会上却流行“消费者选择”一说。也许是出于远见,里根政府一面限制进口,一面将公共资金注入工业和高科技,取得惊人成就,因特网开发的费用最初也由政府提供<sup>①</sup>。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更无所顾忌,中海油和迪拜港口公司海外业务受控就是明显的例子。

乔姆斯基和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用战斗性的修辞和不屈不挠的博学对美国的权势中心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作为教师、同事和朋友,他却是和蔼温良之人。罗素曾描写的理想的世界也是乔姆斯基追求的目标。那是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创造的精神生机勃勃,“生活是一次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冒险,其基础不是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冲动”。这位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也是孜孜不倦的知识和情感的养育者,不少中国学生曾受他亲炙。乔姆斯基相信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同情、团结和互助,因此激烈反对学校和社会灌输并崇尚竞争意识。他认为争强好胜是社会刺激的结果,而非人的天性。他曾说教育体系不应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这是“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如果连小学也要以公布考试分数的形式来激励学生,那更是一种野蛮的措施。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制度暗中鼓励幸灾乐祸的心态,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欣赏别人的成就,只喜欢看到别人被比下去,他们相互之间也无法精诚合作。



这种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不正是他一切政论的出发点吗？

2006年3月15日写毕于东夷小舍

###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

- ① 摘自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于1990年5月31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演讲《啊，超人》。该文即将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3期发表，译者肖静。
- ② 英文是“Rebel without a pause”，由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直译是没有原因或事业的叛逆者)演变而来。
- ③ 《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纽约万神殿书局，1971)，第103页。正是这“东京湾事件”导致越战全面升级。乔姆斯基在后来的论著中一次次指出美国发动侵略或实施轰炸的借口都是编造的，即使谎言被戳穿，当局还是若无其事。他引用塔西陀的名言：“罪行一旦被揭露就无所遁形，惟有厚颜无耻。”
- ④ 萨义德曾就此抨击美国那些所谓的“专家”。见《论知识分子》(三联，2002)中关于业余精神的部分。
- ⑤ 美国史学家芬克尔斯坦在《超越无耻》(2005)一书中暗示德肖维兹的著作涉嫌剽窃。
- ⑥ 这是由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也可译成“制

造共识”。

- ⑦ 《恐怖主义文化》，第 15 页。此前（尼加拉瓜 1984 年选举后），美国媒体曾炒作米格战斗机进驻尼加拉瓜的虚假消息。美国对国际协议的态度让我想到拉·封丹寓言诗《褙褙》（远方译）：

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  
对自己，我们的目光象鼯鼠。  
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恕。  
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最近的所谓“伊朗危机”反而提醒世人注意美国自己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 ⑧ 英国 18 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作《漫游者》中用语。英国史学家基也南一部出版于 1969 年的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以此为名。
- ⑨ 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 ⑩ 这本书系与爱德华·S·赫尔曼合著，1988 年出版。书中的个案研究写得透彻精湛。赫尔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全美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教授，他还与乔姆斯基合写了《人权的政治经济学》（1979）。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著有《真正的恐怖网络：事实上的和宣传中的恐怖主义》（1982）。2005 年 9 月他在《Z 杂志》上发表文章《伊朗“危机”：侵略的前奏》，很值得一读。美国全方位的跨国宣传的效果也十分惊人，详见谢·卡拉-穆

尔扎著《论意识操纵》(2000年),中译本于2004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 ⑪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69年建ARPA网,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类似的NSF网,采用了ARPA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因特网,并负责维护网络主干网。



我第一次致信诺姆·乔姆斯基是在1980年左右。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竟然欣然回信给我。四年后，他第一次接受了我的采访。此后，我又多次采访他，并出版了一系列访谈录，还包括一些电台广播节目。尽管我们并没有做过任何推销，甚至在左翼的期刊上也从未做过评论，但是访谈系列丛书的销量却依然十分惊人。多年来，在与乔姆斯基的合作过程中，他对理念的坚持、耐心和泰然的心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从不对你施加压力，也从不盛气凌人，他连珠炮似地向你指出大量的事实真相，其中又常常不引人注意地展现出意味深长、富有冷嘲色彩的幽默感。就他的思维能力而言，他具有令人敬畏的能力，他能将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大量信息组织起来，并形成逻辑上连贯一致的分析。

多年来，乔姆斯基一直笔耕不辍。正如“U2”乐队的博诺(Bono)所说，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他不仅连续出版了大量政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还始终是一个繁忙的演说家。他总是接到大量的邀请，甚至有时提前数年便确定了行程安排。尽管他的演讲朴实无华，但他所到之处却总能吸引数量众多的听众。正如有一次他对我所言及的：“我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型的\*、极富个人魅力的演讲者，即便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也不愿意。我对于说服他人从来不感兴趣。我喜欢做的就是帮助他人说服他们自己。”就这一点而言，相对于其他在世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为之付出努力的时间更长，也更为

---

\* 克里斯玛型的(charismatic)，有领袖气质的。——译者



孜孜以求。

在此我仅举一例来证明他对普通公众的关心。1998年，我邀请他到波尔德(Boulder)来参加 KGUN 电台 20 周年庆典并发表演说。尽管他当时刚刚做完手术，身体乏累，但是他依然慨然应允，并谢绝收取任何费用。

对于许多人来说，乔姆斯基是个很特殊的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他经常被誉为一个敢于面对强权高压说出真理的人。这一评价是如此普遍，几乎已是老生常谈。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向我们、向普通民众传播真理的人。正如他在 30 年前作出的一个经典论断所言：“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说出真理，戳穿谎言。”

就像南部和西部非洲的苏非教派(Sufi)的先知一样，乔姆斯基通过他的实际行动来传播真理。他的实际行动蕴含着平等主义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让诺贝尔奖得主在他的办公室外坐等，直至他的学生写完给高中报纸的投稿。他的实际行动还包括警醒世人关注人们对语言——诸如“自由贸易”和“国家利益”这类术语——的蹂躏和破坏。他的实际行动也体现在他对从东帝汶到巴勒斯坦，到哥伦比亚，到对东哈莱姆区的普通民众的关心和帮助。如果你需要一个代言人，如果你需要一个签名，如果你需要帮助，乔姆斯基都将与你同在。他的行动将告诉你他的思考，但并不是要告诉你应该如何思考。他的行动是要安慰那些遭受苦难的人，警醒那些生活安逸的人。他并没有简单地去诅咒黑暗，而是靠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点燃了一枝照亮黑

暗的明烛。

尽管他的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他是我们的拉比\*、传道士、婆罗门和伊玛目\*\*。

戴维·巴萨米安

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

---

\* 拉比,犹太教中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译者

\*\* 伊玛目,对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的尊称。——译者



# | 目 录 |

---

导言 .....	1
第一章 激进主义者的胜利 .....	1
第二章 美国对世界：请退避三舍 .....	34
第三章 因为国家的缘故 .....	101
第四章 处于崩溃边缘的东帝汶 .....	147
第五章 西雅图事件的意义 .....	156
第六章 冲破禁锢，解放思想 .....	180
第七章 团结一致 .....	251
注释 .....	276

---

# 第一章

## 激进主义者的胜利

1998年5月10日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

您最近作演讲的行程安排十分繁忙，要访问多伦多、位于明尼苏达州威诺纳的威诺纳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伦敦以及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您去这些地方的主要活动是什么？我知道您吸引了大量的听众。

如你所见，我的日程安排是根据上述各地的重要性来决定的，最后在波尔德达到了高潮。这简直再好不过了。（笑）多年来我几乎一直如此。无论在哪里，都会有数量众多、热情洋溢、兴趣浓厚的听众积极参与进来。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严肃的问题，并且希望讨论一些十分重要的话题。一些二十年前我从未想过要进行讨论的话题，今天却已然成为广为人们所关心的热点。对于某些特定的听众，我的确从未犹



豫过要向他们讲些什么。伦敦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位于工业中心地带的韦恩堡的演讲则是由“东北印第安纳州劳工联合会”这一由十余个劳工组织组成的联盟来加以组织安排的。我对于威诺纳地区不太熟悉,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以农业和小工业发达为主的地区。但是在上述两地,那里的听众极为投入、热情并且长于思考,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之相比。他们希望能够认真理性地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思考他们能为之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您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在向宗教唱诗班发表演讲,或者是在向普通大众讲话?

这些地方都不是受左翼激进主义者煽动的地方,听众都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普通老百姓。

那也就是说,并没有很多《Z杂志》的订阅者或是公众勇气出版社(Common Courage Press)读物的读者了?

你时而能够碰到一些,但是他们都散处各地。我的确遇到一两个曾在“Z媒体研究所”(Z Media Institute)工作过并对该杂志比较熟悉的人,但是99%的听众显然不属此列。

在某种程度上,韦恩堡似乎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子。

对于我来说的确十分独特。我曾经在很多地方,例如加拿大和海外其他国家,对工会成员发表演讲,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美国的一个主流劳工组织邀请去韦恩堡这样的地区演讲。它位于中西部偏东,属于我国工业核心地带——事实上,这里一直被视为一个思想意识相当右倾的地区,但是你在那里却并不会会有这种感觉。在演讲结束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以便为工会募捐,最低金额为 25 美元,但是听众数量依然十分众多。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几个小时,并进行了极有意义的讨论,讨论一直进行到次日清晨才结束。

1998 年 5 月,您在《Z 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内选民》(*Domestic Constituencies*)。在文中您讨论了不同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有关动议。您在评论中指出:“发现宣传话语中被省略掉的东西永远都能给人以启迪。”<sup>①</sup>那么针对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的宣传辞令,您通过调查研究又有何发现呢?

《多边投资协定》是一项重要的投资协议。迄今为止,围绕该协议而展开的计划和深入的谈判业已有三年之久。一开始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内进行的,后来由于阻力重重,自 1995 年 5 月起,又交由设在巴黎的、由 29 个富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来加以讨论和推动。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公司企业团体也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其中。有一个名为“美国国际商务委

员会”(U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利益团体,一直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最主要的游说组织。1996年1月,他们出版了一部专著,向选区选民宣传《多边投资协定》的有关内容及其重要性。<sup>②</sup>但国会却依然对此不甚了了。在《国内选民》一文中,我也采访了许多主流媒体,但是他们却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沉默。《纽约时报》甚至对此未有任何报道,只有《华尔街日报》曾有一篇文章涉及此事。<sup>③</sup>3月初,《华盛顿邮报》才刊登了第一篇报道文章。<sup>④</sup>该文报道称:由于基层选民的强大压力,经合组织各成员国未能签署该项协议。尽管该协议的谈判一直在秘密进行,但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公共利益集团以及基层选民的积极活动之下,对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其退缩不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它显示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一年前,加拿大率先将该项议题公之于众,以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即便如此,这相距各国(秘密)进行紧密磋商谈判的时间已有两年。随后,加拿大国家级电视台和主流媒体如多伦多的《环球邮报》和《麦克莱恩杂志》(Maclean's)也开始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今年1月,澳大利亚也效仿加拿大打破禁忌,并随即在国内引发了抗议浪潮以及大规模的讨论。数月前,欧洲也终于鼓足勇气,就此协议展开公开讨论。

但是在美国,除去你也许会称之为统计上的错误外,却几乎一切如常。人们并非对此一无所知,所有传媒领袖肯定知晓此事,企业界也了解此事。对于寻求授予总统“快车道”权力以迅速批准贸易协定,这一议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幕后推动力量。很多人对“快车道”计划

充满愤怒,尽管媒体肯定知道这是一个中心议题,但是我却找不到任何文章讨论此事。去年7月,《迈阿密先驱报》曾撰文讨论《多边投资协定》。<sup>⑤</sup>当时,“快车道”法案尚未在国会提出,但是业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该文指出:“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已经向白宫发起攻势,要求行政部门在同国会商讨“快车道”法案时将《多边投资协定》作为予以考虑的核心议题。他们希望能够借此使《多边投资协定》强行获得通过。这无疑比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扩展至南美洲要远为重要。但是如果有文章提及此事,我也没有发现。像许多其他事项一样,媒体没有对这一议题加以报道,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是,尽管存在着隐瞒和压制,但是却已有足够多的民众能够被组织起来,以阻止该协议的通过。

这是一起极富戏剧性也十分重要的事件。去年2月,《商业周刊》发表标题为“你从未听说的富有爆炸性的贸易协定”的文章。<sup>⑥</sup>如果你没有阅读过“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的著作,你就不会听说此事。这是一个,或将是一个富有爆炸性的贸易协定。现在该协定的谈判业已转至一个更加讳莫如深的框架之下进行。谈判仍将继续,也将需要更为严肃认真的激进主义者来曝光所发生的一切,展开辩论,如果应该予以反对便坚决抵制。我认为应该这样,而人们如果能够拥有相关信息便可自行做出决定。

谈判进程为什么要如此遮遮掩掩呢?



有很多原因导致大众无法获得有关信息。媒体和商界领袖深知公众将对此予以强烈反对。事实上,尽管商界人士、媒体百分之百地支持“快车道”计划,白宫也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宣传造势活动,然而正是由于公众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至于其支持者根本无法使之在国会获得通过。即便是那些强烈支持该项计划的国会议员,也迫于络绎不绝前来造访的选区选民的压力而投下了反对票。即便对事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对于这类事情,公众却具有一种正常的、富有怀疑主义色彩的本能反应。

关于“快车道”计划,还有一点未被提及,但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即关于该计划的争论被表述得似乎等同于和自由贸易相关的讨论。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首先,他们所讨论的这些协定绝非自由贸易协定,这些人士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而此事也与自由贸易毫不相关。但是除此之外,即便是最热诚的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如果他们恰好也对民主原则深信不疑,也可能会起而反对“快车道”计划,因为这正是该问题的症结所在。该问题的本质在于:“总统和白宫是否有权通过秘密谈判达成贸易协定,然后在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国会也未对此进行任何讨论的情况下便要求国会投票表示‘赞成’或是‘反对’?”这是一个事关民主的问题,而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协定问题。

白宫官方的立场是:我们必须遵守这样一条原则,即总统个人有权单独参与国际贸易谈判。这当然不成其为原则。例如,在人权问题上,国会多年来始终横加阻挠、削减相关开支,或是提出保留意

见。事实上,在众多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在批准人权公约方面的记录也许是最糟糕的,其部分原因即在于此。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一项人权公约在美国获得批准,因此,至少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总统个人专断的原则。在贸易问题上也许如此,但其原因却在于他们试图强行通过有关协定,而他们知道此举绝不会受到公众的欢迎。《华尔街日报》曾相当婉转地承认了这一点。该报刊登的一篇颂扬“快车道”计划的文章声称该计划是“没脑子的”(a no-brainer),其所能带来的好处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希望该计划得以实施。但是文章也指出,批评者也拥有所谓的“终极武器”,即公众的反对。<sup>⑦</sup>因此你最好将公众排除在谈判和决策过程之外,这就是该文的弦外之音。

对于《多边投资协定》问题,他们担心“终极武器”将锋芒出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而且其威力相当惊人。许多人认为我们对很多事无能为力,前景暗淡。但我认为绝非如此。围绕《多边投资协定》问题展开的争议,反对力量所显示出的强大威力令人惊诧不已。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所需要对抗的则是当今世界最为集权的国家、最为富有和强大的国家集团、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几乎遭到全面控制的媒体。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极为团结的权力组合。然而,尽管如此,基层的激进主义者却成功地遏止住了前者的企图。

随着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罢工取得成功并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您认为是否可能出现一种趋势,从而导致“快车道”计划的夭

折、《多边投资协定》被废弃,以及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反对轰炸伊拉克的抗议活动也将随之获得成功。

对你的提法我惟一持保留意见的一点就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现象,相反,这一趋势业已存在多年。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便得到了广泛支持,其影响之大使得里根政府始终不敢直接插手中美洲事务。他们(行政部门)再也不敢像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东南亚那样为所欲为。原因就在于公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只能采取间接迂回的方式,通过秘密的恐怖活动来实现其目的。

通过目前媒体对危地马拉主教胡安·杰拉迪(Juan Gerardi)之死的报道,你可以从中看出端倪。去读一读这些报道吧。你将会发现这些报道省略了少许东西。事实上,中美洲另一位宗教领袖被谋杀了,而媒体并没有将之作为一条重要新闻来报道。谋杀事件距今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当时正值受害者即将发布一份由教会完成、名为《永不再现》(*Never Again*)的重要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分析了发生在危地马拉的种种残暴行径。<sup>⑧</sup>这是近年来所发生的最为恐怖的暴行之一。根据他们的统计,约有20万人被杀害,150余万难民无家可归,以及成千上万的孤儿和寡妇。该报告将这一灾难80%归因于政府行为以及与之相联的准军事部队成员的恶行,10%归因于当地游击队,余者则不得而知。

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它是由美国建立起来的,由美国为之提

供武器装备、加以训练并给予支持。由于美国民众的普遍反对，美国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其中，因此便雇佣当地人为之服务。整个国际恐怖网络——台湾(地区)、以色列、英国、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根廷的新纳粹分子——都卷入了中美洲事务。根据上述教会的报告指出：危地马拉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暴行都发生在里奥斯·蒙特(Rios Montt)统治时期，而他则是华盛顿的宠儿。里根总统一再赞扬他是民主国家的真正朋友，却不断遭到人权组织“无聊的苛责”，而与此同时，他却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国人。<sup>⑨</sup>

美国几乎被排除在相关讨论之外，一些报告甚至对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只字未提。但这一切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关键在于，美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其中。危地马拉既没有遭到B-52轰炸机的狂轰滥炸，美国也从未调遣重兵在其境内屯扎巡视。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1980年代激进主义者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声浪，才迫使美国政府悬崖勒马。当时，反对浪潮不仅遍及城市和大学校园，甚至波及西南部和中西部的乡村地区，声势浩大。因此，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眼前。规模宏大的民众运动——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运动——都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它们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就这一点而言，“快车道”计划十分引人注目。正如白宫所指出的：总统可以随时自行做出决策选择。从未有人对此予以关注，因为人们认为总统这样做无可厚非。如果总统希望通过秘密手段达成许多重要的贸易协定，同时却将国会和公



众排除在外,那么又有什么不妥呢?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这样做存在着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们不仅认为存在着某些问题,而且感觉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某些极为强大的权势集团强行通过“快车道”法案。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您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合著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值得和不值得的罹难者”。《纽约时报》只在第5版报道了暗杀胡安·杰拉迪事件。<sup>⑩</sup>如果是一位古巴的主教被暗杀,您认为媒体将会如何报道此事呢?

所有报纸都会以头版通栏标题来报道这样一条消息。这一点显而易见,根本无需讨论。

由此看来,观念的因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这只是又一个例证而已。事实上,在上述我和埃德合著的书中,在其中的一章,他将上百位死于中美洲的宗教殉道者和一位在东欧遇害的波兰牧师做了一个比较。<sup>⑪</sup>在波兰,凶手被迅速绳之以法,并被判长期监禁。而中美洲上百位殉道者——其中包括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以及四位美国女教徒——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埃德针对媒体做了一个采访调查,结果发现,对这一位波兰牧师的报道比上百位宗教殉道者的报道都要多,而且在性质上也大相

径庭。对于前者,媒体呼吁应该顺藤摸瓜,矛头直接指向最高领导层,例如指责“克里姆林宫无法逃脱罪责”等等。而对于大主教、修女、美国女信徒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宗教殉道者的遇害,媒体却一律视之为在当地发生的意外事件。他们也根本无法辨识事件的真相。因此,媒体对上述事件的报道很少,而且往往放在次要的版面上,也没有任何细节的描写。时至今日,在美国依然没有人认真地探询过罗梅罗大主教的死因。

当六位耶稣会知识分子惨遭谋杀之后,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东欧国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东欧那些曾遭遇磨难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视为英雄,但事实上,在后斯大林时代,中美洲持不同政见者所经历的苦难无人能及。来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尽人皆知,他们的著述也随处可见,并频频被转述和引用。《纽约书评》也刊载有他们的文章。而中美洲那些在我们的监管之下经历了远为深重的苦难的持不同政见者,例如上述被害的耶稣会智者,则经历了双重谋杀。首先,他们被那些受过美国训练的、曾经杀害罗梅罗和成千上万的民众的军人谋杀,然后,他们又被知识界所谋杀。要杀死一个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比压制他的一切著述更好的办法呢?我从未在美国的主流出版圈子里见过他们的只言片语,也很少有任何文献提及。埃德提出的“值得和不值得的罹难者”这一术语十分正确。

由于一旦被曝光或是受到公众的监督,《多边投资协定》便将随之

寿终正寝，因此它也被称为是一个“政治吸血鬼”（Political Dracula）\*。您在发表于《Z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了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在美国，权力的设计者必然造就一种力量，它只能被感知，而无法被发现。只有处在黑暗之中，权力才能保持强大；一旦暴露在阳光下，权力便将开始蒸发。”<sup>⑫</sup>

这是对上述问题一个十分出色的阐释。亨廷顿是个聪明人，他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他也了解使公众被蒙在鼓里，从而确保公众不会干预政府决策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政策便将由真正的权力中枢来设计和付诸实施，而逃避任何形式的监督。“快车道”计划即属此列，而《多边投资协定》的案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多边投资协定》问题的要害在于，它是要在对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的背后设置一道民众无法逾越的障碍。实际上，它是要在大公司围墙的背后设置这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除非发出国会传票\*\*，否则你不可能知晓那些专制体系内部的运作。当它们要针对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做出决策时，便将成为一个十分高效的暴政体系。

对此，世界银行曾有一个绝妙的说法：公众应该能够在所谓的

---

\* Dracula, 德拉库拉, 是 19 世纪英国作家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所著小说《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之王的名字。——译者

\*\* 译者注：指国会发出传票，要求有关人士到国会公开作证，从而使一些敏感、重要信息得以公之于众。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隔离状态”(technocratic insulation)下工作。<sup>⑬</sup>根据这一论调,决策者都是技术专家,通晓如何统筹管理各项事务,他们个个精明能干,因此不得不远离监督和群氓的干扰。这本来就是陈词滥调,并非什么新鲜观点,但是由于我们在表面上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任何人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派出杀手四处横行,因此亨廷顿的这番话描述出了上述观点必须采取的形式。

当您谈及“值得和不值得的选民”这一话题时,在您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谁的身影呢?

这一点在《多边投资协定》案例中得到了异常清晰的体现。你说的那篇文章是我发表在《Z杂志》上的《国内选民》。这一题目取材于白宫关于《多边投资协定》所作的一份公开声明。国会曾就此事质询白宫,但是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为了应对国会以及开始显现的公众的反对声浪,行政部门的确发布了一份由助理国务卿斯图亚特·艾森施塔特(Stuart Eizenstat)和贸易副代表杰弗里·朗(Jeffrey Lang)撰写的公开声明。据我所知,媒体从未报道过这份声明的内容,但是确实有过这样一份声明。在声明中,白宫发言人向公众保证他们将信守对民主原则的郑重承诺。因此他们声称:我们正在力求通过各种方式,向所有与此利益攸关的国内选民通报有关情况,并征询其意见。我们不会漏掉任何人。他们还宣称,由于我们对民主原则怀有坚定的信念,因此我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正在发挥领导

作用。该声明的内容大致如此。

现在我们要做一点逻辑练习。国内选民指的是谁？显然不是指国会。事实上，国会内部肯定有部分人知晓此事，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国会则甚至没有得到任何通报。曾有 25 位众议员为此致函白宫并提出质疑：行政部门怎么能够在谈判业已展开三年之后仍然不告知国会？因为根据宪法授权，国际贸易事务属于国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他们收到的回信与你们致函白宫后收到的回信一样，是由电脑打印的，上面写着：亲爱的大卫，非常感谢你十分有趣的评论。这就是他们得到的答复。因此，国会不属于国内选民。普通公众显然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可以说是属于“反面选民”(negative constituency)，行政部门的理念就是要将他们排除在外，以免制造麻烦。

因此，普通公众和国会都不属于“国内选民”的范畴。但是“美国国际商务委员会”却属于其中，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信息，并深深地卷入到了决策过程之中。企业界也同样介入其中。白宫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谁是他们的国内选民？政治领袖以如此清晰粗鲁的方式，不加粉饰地表明他们对世事的真实看法，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认知。尽管这同你在八年级公民课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或是与你在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课程上所学的知识大相径庭，但是这却是铁的事实。因此，他们能够如此直白地说出来的确很好。而媒体如此精明，自然会将该声明压制下来，使之归于沉寂。也许将来会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



您甚至曾经说过：“美洲人”(Americans)一词所指称的并不是真正的美洲人\*。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洲人”(Americans)一词的内涵应包括所有生活在西半球的民众。但是现在美国却独占了这一词汇。在拉丁美洲,人们使用“北美洲人”(North Americans)一词来称呼美加两国的人民。而“Americans”一词则专用于指称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这部分也是由于语言学上的问题,即你很难将“合众国”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

也许我应该澄清一下。您说这句话时,是在引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经济迅猛增长,美国人正在经历一场童话般的经济繁荣和扩张,这里的“美国人”一词指的是哪些人?

曾有连篇累牍的文章谈论美国的经济繁荣。例如你刚才说的那篇文章,其标题便是《繁荣而沾沾自喜的美国》。<sup>⑭</sup>今年5月3日,我访问英国。《时代》周刊“每周评论”版的第一篇文章便名为《富裕而快乐的美国》。<sup>⑮</sup>该文通篇讲述的都是美国童话般的经济繁荣,美国人民生活富裕、充满自信,一切都妙不可言。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

---

\* “Americans”一词本义为美洲人,在地理上涵盖了南北美洲两大洲,同时也有美国人的意思。——译者

问题：他们说的是哪些人？是那些占美国人口总数约三分之二、在过去 25 年中工资收入始终停滞不动甚至不断下滑的普通民众吗？他们是否也一样沾沾自喜、生活富足、充满自信？抑或是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说的“工人缺乏安全感”？对于美国童话般的经济繁荣，格林斯潘曾将之归功于“工人安全感的缺乏”（worker insecurity），由于工人不敢要求增长其工资收入，从而使资本家可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而这对于经济的迅速增长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sup>⑩</sup>

是这些普通工人感到沾沾自喜、充满自信和生活富足吗？抑或是那些常常光顾廉价食品店（food banks）的人吗？而事实上，尽管经济飞速发展，但人们对这些廉价食品店的需求却在不断攀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感到生活富足的并不是占美国三分之二人口多数的普通公众。上述这些文章清晰地指明了作者脑海中所关心的对象。对于那些沾沾自喜、充满自信、快乐富裕的美国人，他们所举出的惟一的、也是被他们屡屡提及的例证，就是那些在股市中获益的人。这很好理解。你的确能够看到很多人在股市中赚了大钱。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全美约 1% 的家庭拥有约 50% 的股市市值，其中 0.5% 的家庭拥有约 40% 的股市市值，另外 0.5% 的家庭则拥有余下的 10%，而全美约 10% 的家庭拥有整个股市市值的 90%。因此他们在股市获益良多，他们的财富如此巨大，并且均位居美国最富有的 0.5% 或 1% 的富豪之列，因此联邦统计局（Census Bureau）甚至都没有将他们的财富统计在内。他们的行为形同强盗。此外，另有大约 20% 至 25% 的国人

生活尚可,或是比较富裕。而占总人口数量 75% 的其他国民则没有被计算在内。<sup>①</sup> 他们的生活境遇较之从前反而更趋恶化。但是当你说美国人“沾沾自喜”、“生活富足”的时候,你所指的并不是这些普通民众。你无法在高档餐厅、公司董事会议室、编辑办公室或其他类似场所看到他们的身影。而“美国人”在此所指的却是常常光顾上述场所的那些富人。

还有一些文章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表达了上述观点。我有一种感觉,即记者,至少一部分记者,必须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纽约时报》的路易斯·尤奇特尔(Louis Uchitelle)是一位出色的经济专题记者,他发表的有些文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篇似乎题为《重现美国的黎明》(*The Rehabilitation of Morning in America*)。<sup>②</sup> 黎明重新出现了。而约翰·韦恩(John Wayne)则正在步入黄昏。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多么伟大而奇妙的时代。他在文中通篇引用了“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ing)主席杰里·贾西诺斯基(Jerry Jasinowski)的话,而此君则一直在鼓吹利润正在急速增长,而这一切又是多么美妙。随后,尤奇特尔在文中又声称:尽管数百万美国人仍在为生计所困,但是他们却已然接受了贾西诺斯基先生所说的“正常的比例”(the right proportions)。<sup>③</sup> 也就是说,他们的雄心壮志已然消磨殆尽。他在文中援引了密歇根大学公众态度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言论,他认为,这就好像人们在说,尽管我们很难维持生计,但是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因此我们宁可维持这样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式的“沾沾自喜和富裕生活”。在过去,他们往往会认为他们应

该能够维持生计,也许会过得更好一点,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适当的优先照顾,雄心壮志也已不复存在。如果他们还能生存下去,这已经够好了,因为情况本可能会更为糟糕,至少今天他们还有工作可做。但是他们不属于美国人,他们既不沾沾自喜,生活也不富裕。他们属于这样一个群体,即只要能够勉强过活,他们便感到十分快乐。

您是否发现报纸的头版新闻和经济版的报道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如果真是如此,怎么解释?

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多年来始终如此。首先,经济版的文章能够令其读者信服。他们面向的受众是狭义上的“美国人”。他们能够放心地让这些“美国人”去对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其次,他们所面向的这些“美国人”也需要有人为他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将影响他们的收益和权力,因此他们宁愿对现实状况拥有一个可以容忍的、合乎实际的认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传媒领袖来说,如果普通公众的视线被导向他处,他们会觉得更为舒服自在一些。因此,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对此我不想如你所说的那样过于尖锐。我从未见过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是我认为如果有人做了相关研究,你便会发现这一点。例如,国内一些最出色的新闻报道都是由《华尔街日报》刊载的。你所说的问题早已存在了很多年。

针对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英国出版的《经济学家》周刊在一篇重要社论中提出了许多非常关键的问题,并认为美国的经济拓展过度,经济泡沫也可能会破裂。<sup>②</sup>

许多经济类刊物早已讨论过这一问题。现在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资产膨胀”(asset inflation)现象,也就是说,企业股值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经济增速十分缓慢。某些人所说的童话般的经济繁荣景象,其实际增速却是自二战以来最为缓慢的,甚至低于20世纪70和80年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复苏——由于经济发展有其周期性,因此就会有经济复苏期——在此期间,绝大多数民众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增加,而他们的工作时间却较之以往延长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股票价格和负债额度却出现了急速攀升。

您是指个人还是公司,抑或两者皆然?

两者皆然。全部债务。非政府债务。如果你注意一下经济增长率和负债率两者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它们是紧密对应的。在80年代中期,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经济增长十分缓慢,而负债额则迅速增长。这都是值得引起我们真正关注的迹象。对此有人指出,尽管据称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膨胀,即并非植根于生产性经济(productive economy)的资产膨胀。



股票市场的繁荣与真实的经济状况有所脱节。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写了一部十分出色的著作——《华尔街》，他在该书中指出：当企业试图为进行投资而筹措资金时，他们很少会求助于股票市场，<sup>②</sup>而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筹措。事实上，他们回购股票的速度比他们发行股票的速度要快得多。股票必然与控股者相关。因此，无论是公司合并、购置、贸易还是财产的转移，都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公司合并和购置行为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埃德·赫尔曼(Ed Herman)和理查德·杜·波夫(Richard Du Boff)是少数几位曾对此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股票价格和短期收益的压力问题，而非如何创造生产性经济。此外，还有很多严重问题有待解决。任职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迪安·贝克(Dean Baker)曾撰文对此有过很好的研究。他指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教育和人员培训——的资金投入下滑极为严重。而如果缺乏必要的设施以及雄厚的“人力资本”——这是一个十分丑陋的词汇——即拥有技能、知识、接受过培训、富有创造力的人员，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却在下降。无论是从道路上的坑洞，还是从国人阅读数量上，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这一点。《经济学家》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才会认为我们将会遇到麻烦。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

本年早些时候，行政部门似乎已决意要轰炸伊拉克。但是在俄亥

俄州哥伦布市所发生的事件则彻底打乱了政府的计划。

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克林顿政府此前从未想过要使其政策立场接受公众的检验。他们只是从白宫电闪雷鸣般地发出指令。显然,这一次克林顿,或者至少是他的公关顾问们,觉得在轰炸另一个国家之前,应该向公众有所宣示。于是他们精挑细选了一个看似十分保险的地点: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因为这里似乎不会有太多的激情澎湃的激进主义者,从而不会引发一场燎原大火。行政部门事先做了精心准备。一切事项都受到了严密控制,只有特定的人士才能进入会场。持异议者事先受到监控,因此届时只有“合适的”人才能向总统提问。

尽管做了上述周密的布置,但是该市许多居民却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们举行群众集会,散发传单,与其他民众接触,组织了大量的基层公关活动,并成功地促使部分由官方指定的提问者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向克林顿提出一些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多家电视台向全球实况转播了这次演讲活动。我虽然没有观看这次节目,但是事后我阅读了有关的文字记录。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将官方坚固的宣传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随后整个防线便彻底崩溃。对于这些问题,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均无言以对。他们一个个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置答。尽管提问人的问题只是寥寥数语,但是却足以使政府精心打造的宣传机器土崩瓦解。在这一轮的较量中,支持轰炸伊拉克的人遭到了挫败。

事后不久,科恩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克里斯·布莱克(Chris Black)采访时作了一段很有意思的陈述,他声称:“军事力量将是第一手段,对此将不会再有城镇集会、试探气球,或是一系列冗长乏味的警告和最后期限的设定。”<sup>②</sup>这又一次体现了亨廷顿的理论:下一次我们必须确保公众不会与闻任何一项不公开的、业已准备就绪的行动计划。公众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一事件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为数众多的示威、抗议、集会和抵制行动。尽管肯定会发生这类事件,但是此次演讲活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事后行政部门被迫做出让步,这一事件肯定是其中诱因之一。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惟一的原因,甚至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却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海湾各国的强烈反对。对此我们的媒体没有予以详细的报道,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不应遭到忽略。科威特是惟一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的国家,但是这种支持也谈不上热情可言。就连一向对美国俯首帖耳的巴林,也明确拒绝让美军使用设在该国的军事基地。海湾各国尽管实际上都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此次也发表了一份措辞极为强硬的声明,谴责美军的轰炸计划。作为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的表现尤为突出。沙特没有只是简单地声称:我们对此感到不快;而是表示了极为强烈的反对。此外,沙特还采取了一系列无疑使美国感到惊慌失措的措施。

沙特和伊朗两国是多年的世仇宿敌。事实上,如果仅从技术角度

来看,它们之间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大约 25 年前,伊朗占据了沙特的部分岛屿,两国无疑是敌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此时(采取军事行动前)访问沙特,却受到了极为冷淡的接待。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信号:我们不希望你们(美国)插手。我们也不喜欢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前总统——哈舍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对沙特进行了国事访问,却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拉夫桑贾尼与沙特国王举行了会谈,并在沙特全国各地走访参观。媒体不应该忽视所发生的这一切。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件。美国曾出面组织了一个经济首脑峰会,并希望将之与所谓的中东和平进程联系起来。峰会地点设在卡塔尔,但是在开幕之际却几乎没有什么国家代表出席。相反,无论是埃及抑或是沙特阿拉伯,却前往参加了在德黑兰召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峰会。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意义重大的信号。海湾各国以此向美国清楚地表明:你不能欺人太甚。多年来,伊朗一直在推动建立海湾地区安全管理机制,从而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边缘化,而此次峰会则是迈向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尽管很难说海湾各国采取的这些举措其诚意如何,但是华府却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无疑是导致行政部门做出让步的部分原因,而我则怀疑这是其中最主要的动因。

美国事实上使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被迫对伊拉克实施轰炸,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知道实施这一军事行动毫无战略价值可言。轰炸不会对萨达姆·侯赛因造成任何损害,只会

导致大量的平民伤亡,这反而可能会加强萨达姆的统治地位。此外,甚至连五角大楼也坦承:轰炸还有可能导致对伊武器核查的中止,而事实上对于摧毁伊拉克武器库来说,核查远比轰炸更为有效。对伊实施轰炸的计划在海湾地区遭到了强烈反对,而对于那些美国所支持的国家来说,轰炸将对其政权的稳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无人可以预知。民众所掀起的抗议浪潮可能会导致其政权的倾覆。行政部门被迫转而采取了现行的拖延政策。我想,他们也许会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暂缓原定的军事行动。也许以后他们还会故伎重演,但是他们的处境却已然相当不利。

我们来谈一谈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吧。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四小虎”被吹捧为未来的经济模式。但是那里却爆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宣传机器又是如何将之合理化的呢?

首先,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亚洲并非一个同质化的地区。例如,台湾(地区)便几乎没有被危机波及,而韩国的经济也相当稳固。

韩国是世界第 11 大经济体。

亚洲各国并非和谐美好的社会,因此我也不建议任何人将之视为效仿的典范。但是如果仅就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而言,韩国和台湾



(地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确令人惊叹。大约二十至三十年前,韩国的经济状况与菲律宾相差无几,而今天它的经济总量则远超昔日,人们的生活也变得富裕很多。现在,韩国业已建立起一个相当稳固的工业和经济结构。而台湾(地区)则几乎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与之相比,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但是外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个由外来资本控制的国家。而印尼则基本上是一个家族产业。没有人知道苏哈托家族及其亲朋好友拥有多少资产。但是一般估计约为3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印尼一揽子援助计划提供的金额。对于印尼目前面临的债务清偿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让苏哈托家族交出它们所掠夺的财富。印尼拥有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潜在的非常富庶的国家。泰国的经济状况也极不稳固,其国内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例如,在以色列工作的许多外籍劳工——基本上相当于奴隶工——都是泰国人。他们在国内无法生存,于是只好来到富裕的西方国家去从事那些最为肮脏污秽的工作。

尽管亚洲各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其基础却十分薄弱。上述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以韩国为例,尽管它的经济实力是上述各国中最强的,但是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却非常高。韩国没有发展起自己独立的科技增长能力,因此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只是日本经济的一个分支。与之相比,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更为独立一些。但是诚如我刚才所指出的,每个案例之间都存

在着差异。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韩国的问题与其强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密切相关,对此我深表赞同。美国对韩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韩国开放金融市场。大量的投机资本流入金融市场,随后又迅速撤出,而让韩国蒙受巨额损失。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的大型工业联合企业日益独立于政府的控制。其中很多企业(尽管并非全部),任人唯亲,腐败问题严重。他们举借巨额贷款,却根本无力偿还。于是所有这些企业便(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纷纷破产倒闭。尽管存在上述这些问题,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韩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亚洲)虎”这一称呼并非言过其实。

日本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大约一百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创造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还经历了因二战导致的毁灭性打击。这一点的确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回到你提的问题上来,此间的看法是这证明了美国(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吃苦耐劳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和企业主导的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同时,这也意味着由国家下达指令干预市场运作的方法宣告破产。这一观点实在荒唐可笑。首先,上述问题是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金融自由化,即将金融市场向自由流动的资本开放。这基本上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

其次,美国自身的状况也十分荒谬可笑。里根政府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一届政府。事实上,他们为了挽救美国的工业企业,将对付进口的贸易壁垒增加了一倍。如果他们在80年代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品质更为优良的日本产品便将充斥美国的汽车、钢铁和半导体市场。美国主要的工业基础也将被彻底摧毁。因此里根政府不仅对商品进口予以限制,更有甚者,还为美国工业注入了大量的公共资金。

因此,尽管有人不断鼓吹和标榜“自由市场”,您却发现现在美国经济中始终存在着政府的干预。

不久前,艾伦·格林斯潘刚刚发表了一篇演讲,鼓吹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和消费者选择理论(consumer choice)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此,他列举了一系列事例,<sup>③</sup>其中互联网是他的主要例证之一。(但是)互联网首先是由五角大楼开发的,历时三十多年,其中绝大部分的理念、动议、创新、硬件设备以及技术开发所需的费用,都是由政府提供的。随后,互联网被移交给私人企业所有。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为零。格林斯潘所给出的其他案例,如计算机、卫星、晶体管等,也概莫能外。对于格林斯潘所列出的这张清单,全世界即便是最无知的经济学家也肯定知道,这正是教科书中在解释那些事先主要由公共部门开发随后又转交给私人企业的技术产品时所列举的事例。

在上述事例中有一项几乎形同笑谈,那就是晶体管的开发过程。晶体管首先是由一个私人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研制开发的,但是它属于一种垄断产品,因此既不存在市场,也没有所谓的消费者的选择。由于这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垄断产品,贝尔实验室可以制定垄断价格,事实上形同征税。只要贝尔实验室拥有一天的垄断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实验室。他们花费着公众的财富,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但是,一旦政府解除了对晶体管开发的管制,贝尔实验室便完事大吉了。

不仅如此,贝尔实验室一直在利用二战期间由政府斥资开发的技术。而且,他们找不到任何个人买家来出售晶体管。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高质量晶体管唯一的客户就是政府,在这一点上,晶体管与计算机的情况十分相似。在此期间,贝尔实验室能够开发科技、拓展规模、锻炼营销技能,以便最终能够打入市场体系。但是如果说美国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严格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技能的自主发挥,而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对此我觉得很难加以描述。

顺便提一句,上述现象植根于美国历史的本源。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系统,即19世纪出现的规模巨大的新系统。这些系统的基本理念在诸如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这些地方取得了成功,因为那里需要有可互换的零部件和认真仔细的质量控制。随后,这些系统被移交给私人部门。事实上,里根政府所做的不仅仅是保护美国工业,为尖端科技的开发注入公共资金,它还不得不克服美国管理方式的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有许多人担心,不

合适的管理方式导致了美国落后于欧洲,尤其是日本。问题不在于开发先进灵活的生产工艺,而是由于管理方式的失败,才导致了美国的落伍。

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五角大楼挺身而出。它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并启动了一项名为“工业生产技术”(ManTech)的发展计划,试图通过一体化的生产、电脑控制生产设备、灵活的生产工艺等手段,来设计规划所谓的“未来的工业”。由于里根主义者(Reaganites)都是极端的中央集权论者,超乎常规地坚决反对市场主导原则,因此,该计划在里根执政期间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最终被移交给了私人企业。与东亚各国“政府管理”(state-managed)经济模式的失败相比,这就是美国式的吃苦耐劳的个人主义和市场中的消费者选择。这套说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尽管事实真相并不那么浅显易懂,如果你仔细观察,甚至会觉得十分复杂艰深,但是如果这套说词被登载在《真理报》(前苏联共产党党报)上,人们将会为之捧腹大笑。

您的诸多言论似乎都与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有关。我偶然读到《新闻周刊》1993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您的一段话,即您不得不做好准备,以回答“显而易见的问题”。<sup>④</sup>您的潜台词就是说只有儿童具有这种本领了。

在我进入高中以后,我的智力发展便受到了阻碍。由于我必须进入著名的传统公立高中,我便似乎坠入了一个黑洞。



为了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是否都必须“发现自身内在的童心”？

任何曾与儿童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儿童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性。他们乐于探索事物，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繁重的学校教育将使他们丧失这些特性，并将他们纳入一个模式，使他们的行为中规中矩，停止独立的思考，从而不会引起任何麻烦。这一过程从幼儿园开始，直至亨廷顿所说的“不要让群氓为国家大事而烦扰”。公众被认为应该成为顺从的生产者，服从命令，而在其余时间则应成为被动的消费者。不要思考任何事情，也不要了解任何事情，不要让你的头脑被《多边投资协定》或国际事务这样的事情所干扰。只是去做你被告知的事情，关注上述事务之外的事情，使你的消费最大化。这就是公众应起的作用。

像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这样的人认为，公众必须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这符合那些“负责任的人”(responsible men)的观点。<sup>⑤</sup>他们的这一观点其实与数百年前的理论同出一辙。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在17世纪爆发的英国革命——人类现代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当时这一理论便已得到了清晰的表述。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数年前，在您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进行的一次谈话中，您对马克思，尤其是普世理论(theory in general)提出了质疑<sup>⑥</sup>。您并不擅长

于理论,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理论很了不起,我也一直在研究理论。但是“理论”一词不应该被滥用。当你能够从一些并非浅显的原则出发,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对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提出解释,你便拥有了一种理论。但是这很难做到。在硬科学(指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译者)领域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有少数几个科学研究领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却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可以理解。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当你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问题领域,通过理论来加以理解的可能性也将急速下降。

对于人文科学,我几乎想不出什么可以冠之以“理论”之名。马克思当然值得研究,他是一位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并提出了某种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式。抽象的理想化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研究事物的必要方法。他探究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人们必须询问的是:他的理论与当时的或现在的真实的世界之间有什么联系?对于社会主义,除了零星的寥寥数语之外,他几乎丝毫没有论及。他并没有形成一个革命的,或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但是对于他所从事的关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研究,我们应该加以学习,也应该有所了解。如果你愿意将其称之为理论,那也没什么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许多被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文学理论或是其他——令人迷惑难解。我不知有哪种知识(understanding)如此深

邃,以至于使我们无法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将之表述出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赋予职业专长以崇高的声誉。人们有责任不要言过其实,进而声称能够提供我们并不拥有的东西。如果你宣称建构起了一个理论,能够从一些重要的原则推导出出人意料的结果来,那么就让我们亲眼见识一下。

您对于对个人的神化以及民众对某人的狂热崇拜评价不是很高。

说我对此“评价不高”算是一种很客气的说法。我不认为应该对任何个人或任何事加以神化。在任何真正存在着理智和进步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其发展运作的方式。例如,在硬科学领域中,任何进步都是在研究生讨论班中取得的,在那里,大约一半的理念是由学生提出的。他们有着许多有趣的想法,通常既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成分。你能够将这些想法加以梳理、改进和变化,但是在物理学中并不存在爱因斯坦主义(Einsteinism)。只有在那些缺乏理性实质并试图加以掩盖的领域,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才会存在这种观念。

对于您来说情况如何?

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是各种情况都有。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当时适逢一个令人相当振奋的时刻,我在其间取得了很多

进展。

您的健康情况还好吧？

这并不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话题。我还能再活几个月吧。（笑）



## 第二章

### 美国对世界：请退避三舍

1999年2月1日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

当我打算采访您时，我总会感到有些紧张。我该如何开始采访呢？怎样才能吸引您呢？这些采访就像轮盘赌似的，谁也无从知晓问题从何而来，或者需要哪方面的细节。您对此有何感受？

你已经占了上风，我只是你的仆从。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很容易，只要服从你的引领即可。

我注意到您也许会失去掌控。这一点从您不仅知道（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哪两支球队进入了“超级杯”决赛，而且还知道比赛的结果便可以得到证明。

我一直阅读报纸的头版报道,至少是《纽约时报》的头版。它们都会报道是哪支球队赢得了比赛,比分是多少,但是有些事情要比这更为糟糕。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我的确是要在我即将年过半百之际,参加有生以来的第一场职业篮球比赛。我有一个苏格兰裔的外孙,最终帮助我实现了一个秘密的梦想,即让我可以找到一个借口去参加比赛,这个借口就是因为有个孩子硬拽着我要参加。这场比赛很快就会举行了。

这听起来很不错,无疑这可以使您在繁重的演讲、采访和写作工作之余,得到一次解脱和休息。我想向您请教一个源于苏非派\*教义的故事。这则故事名为“黑暗中的大象”,据说是由13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鲁米(Rumi)创作的。在这个故事里,几个被蒙上双眼的人被要求只用触摸来“观察”大象。一个人摸到了大象的一只耳朵,便说:大象就像一把扇子。而另一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便说道:噢,大象就像是一条绳子。又有一个人则摸到了大象的腿,他说道:大象就像一根柱子,等等。这个故事道出了表象与真实的差距,以及错觉和欺骗产生的模式。

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一个物质分子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考察角度。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你

---

\* 苏非派(Sufi),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译者



则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标准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实验呢？做实验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旨在努力剥落你认为——无论你的观点是对是错——对决定事物运作的基本原则无关紧要的东西；然后看看能否将事物加以简化，从而使这些基本原则得以清晰地表露出来，再试图由此重新构建复杂的现实。但是你永远都无法达到它，因为现实实在太混乱了，存在着太多的干扰因素。

在硬科学中的任何实验都是为了发现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角度。而实验对于像人类事务这样很难理解又极其复杂的问题来说就更为必要了。你必须发现一个角度，从中也许能够发现某些有趣的事情，从而意识到你很可能抓住了这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你希望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对于那些试图解译传统智慧的人，您有什么建议吗？您可以以任何一件时事为例——无论是全球化问题还是伊拉克危机。

第一就是要持怀疑的态度。就以你最后举的那个例子伊拉克危机来说吧。你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要轰炸伊拉克并且坚决维持对伊制裁？你会发现群情激愤，而且众口一词，无论是托尼·布莱尔、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还是报纸的编辑和评论家，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那就是，萨达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他甚至犯下了最可怕的“终极”罪行——用毒气毒害自己的人民。<sup>①</sup>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野兽生存在世上。我回顾了关于此事的许多报道，这是评论

家、学术刊物和其他人关于制裁理由的几乎完全一致的说辞。

一旦人们对某事达成几乎一致的意见，这就应该成为一个信号。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如果人们对此看法一致，对于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一致意见，你就应该对自己提出反问：这是正确的吗？伊拉克问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可资检验的例证。任何一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任何一个没有能力将这种想法挥之而去的人，都会立刻想到这一点。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当萨达姆在1988年3月犯下滔天罪行之际——向哈拉比亚(Halabja)这个库尔德小镇释放毒气时——美国和英国是如何反应的呢？这一切都是有据可查的。当年8月，在两伊实现停火后仅5天，而伊朗则已然基本停止了对抗行为的情况下，萨达姆再次故伎重演。而美国和英国又做出了何种反应呢？答案很简单。美英继续而且事实上还加大了对萨达姆的强劲支持。这一事实可以立刻向你表明：萨达姆的上述所作所为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对萨达姆的描述是正确的，他的确是一个犯下了“终极”恐怖罪行的禽兽，但是美国和英国却认为这很好。他们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萨达姆。所以这不可能是他们现在想要摧毁他的原因，任何人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能明了其中的道理。

接下来你要反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这一切如此明显，为什么却没有人说出来呢？我想你应该能想到原因之所在。这就是你应该如何看待问题的角度。伊拉克危机就是一个例子，而我之所以以之为例仅仅是因为你刚才最后提到了这个话题。一般而言，当你对一个社会进行研究时，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应该是：权力是如何分配

的？谁是主要的决策者？是谁决定了要生产什么、消费什么和分配什么？谁将要登上政治舞台？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是由谁做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能很容易地找出答案。

然后你就应该追问：政策和对信息的塑造是否反映了权力的分配？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无效假设”。除非你有反面的证据，否则你就只能接受它。先从无效假设开始，然后探究这是否正确？事实上，你通常都能按照这个方法解释许多事情，当然并非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复杂了。你将会发现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而你则要试图将它们加以分析整理。事实上，这就像在实验室里研究化学分子一样。只不过你碰巧研究的是人类事务而已，但这丝毫不应减损理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旦当你发现理性思维基本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会对一个制度结构的运作形成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伊拉克问题上，就连最基本的理性思维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人想检验一下我的观点，你可以考察一下，当我们声称：我们必须轰炸萨达姆，因为他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时，而对于这些罪行，又有多少次是“在我们的支持下”进行的。从中你可以获知理性在这件事上是否可行。这一案例所给出的答案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是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

回到刚才那个苏非教派的故事，它指出人们往往处于被蒙蔽、隔离和孤立状态。他们认为大象的尾巴是一条绳子。人们也无法对事

物形成全面认知。

如果我们探究得再深入一些,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那些致力于塑造人们的思想和态度的行业所刻意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产业包括:广告业、公共关系产业和那些高谈阔论如何治理世界的有责任心的学者。他们声称,他们所关心并孜孜以求的就是使人们被孤立起来,即如你所说的,被原子化。其原因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形单影只,那么他就无法对一件事形成深入的理解;而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思想,然后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就像在科学实验室里发生的那样。极少有哪件事是由单独的个人来完成的。此外,就是要让人们关注那些不会对权力的真实运作产生影响的事情,也就是说,绝对不要让公众知道内情。

就以目前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为例吧。弹劾克林顿案可以说是个可笑的闹剧,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惹人注目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精英阶层对此事的痴迷,不论是左翼自由派的杂志,还是右翼的杂志和报纸都是这样,概莫能外。而在另一方面,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此却兴味索然。一年多来,公众都在希望此事尽早结束。这显得有些不合常理,因为一般而论,由于对此事的宣传铺天盖地,人们应该很有兴趣才对。但是尽管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公众却采取了十分抵制的态度。

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我想这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有关。我们必须紧接着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弹劾案？为什么在精英阶层——媒体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大多数人之间会存在这阶级性差别呢？于是，我们必须为此找出一个原因。我想这也许和人们的兴趣有关。例如，民意调查告诉你人们不关心哪些问题，那么它同时也会告诉你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工作、教育、保健、安全、环境保护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问卷调查上的提问方式往往十分褊狭，一般来说问题是这样的：你喜欢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好像除此之外便别无选择。换句话说，你喜欢这个政党的哪一部分？就我刚才所说的人们关心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民众会选择喜欢民主党。

那么其他问题又如何呢？还有一些问题被称作“文化议题”，比如家庭价值、犯罪、保护人民不受恐怖袭击、政府的道德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公众则倾向于选择共和党。假如你是一个共和党人，你希望公众关注什么事情呢？答案十分明显。所以我们立刻就能明白为什么对于这个党派界限分明的弹劾案，共和党力图使之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反，民主党人和左翼自由派，事实上是左翼激进分子却签署声明宣称：我们必须保护总统免受“性麦卡锡主义”（Sex McCarthyism）的指控？为什么他们这么关心这件事？你也可以找出一些原因。对于促使公众关注就业、保健和教育等问题上，民主党的兴趣未必就比共和党强多少。两党的立场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民主党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加以只言片语的评论，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与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做法没什么差别。所以如果公众关心的是上

述问题之外的其他领域,(对民主党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趣事,足以使公众只关心这些荒诞不经的琐事,而忽略那些真正利益攸关的大事。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肆意妄为,而不会被公众察觉。接下来,就在人们关注这些事情,而没有查问他们应该询问的问题时,他们也许就会瓦解社会保障体系。至于为什么左派人士——他们应该赞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观点——也会陷在这件事中,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但这部分人毕竟为数不多。至于为什么精英阶层都痴迷于此,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人民是危险的。如果公众能够直接参与重要事务的决策,他们可能会改变权力的分配,损害富人和特权阶级的利益。

就民主党而言,假设克林顿受到弹劾,实际上对于民主党来说也是一项政治收益,所以他们对此并不真正在意。这依然和伊拉克的情况十分相似。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纸和杂志上展开的讨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克林顿与国会之间发生的这场基本哲学问题之争,如何使美国陷入了巨大的道德困境。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人们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即:如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那么为什么两党的立场判若水火?是否真会有什么原则性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则问题——能够使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截然对立,毫无回旋余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你如何看待两党,它们之间几乎在任何一个观点立场上都存在着重叠之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能够将它们分别开来。所以你马上就可以推断出,如果两党的意见截然相反,那么所涉及的一定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足以使我们停止



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能够相对自由与公开地讨论这些话题,那么这些话题将会成为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这些答案显而易见,或许未必正确,但是它们的确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如果这些显而易见的答案从未被人讨论过,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但是时间不会很久。

让我们做一假设,如果您将要进行一项民意调查,你认为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在1988年的时候,与美英结盟的萨达姆政府曾用毒气屠杀自己的人民——库尔德人?又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白宫的性丑闻?

我想有许多人知道萨达姆政府用毒气杀害过库尔德人。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下述这些关键的字眼:“(萨达姆)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们也不知道,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1991年3月,萨达姆又重新得到了我们的垂青。战争刚刚结束,在美军控制的伊拉克南部地区便爆发了起义,其中包括一部分伊拉克将军。他们并没有转向美国寻求帮助,而只是要求获得被美军没收的武器装备,并且在萨达姆反攻时得到一些保护。但上述请求却遭到了拒绝。美国拒绝向他们提供被缴获的武器装备,也没有阻止萨达姆政府的武装直升机对他们的屠杀行为。对此,诺曼·施瓦茨柯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的说法是我们被伊拉克人“欺骗”了。<sup>②</sup>当萨达姆派出军用直升飞机时,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会向民众射击。萨达姆

告诉我们他不会这么做，因此我们被骗了。好家伙！我们太笨了。你们应该要相信这一点。

但事实的真相却是：当萨达姆残酷镇压伊拉克南部地区的起义时，布什政府却对此无动于衷。接下来，萨达姆又把矛头指向了北方，残酷镇压了库尔德人的起义。而美国政府竟然再一次袖手旁观，直到民怨沸腾之时才不得不假意采取一些措施。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因为他们希望萨达姆能够将这些起义镇压下去，保持伊拉克的统一。而这是我们公开宣示的政策。他们当时就曾公开表示：我们必须维持稳定，让“铁腕人物”继续当政。<sup>③</sup>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奉行这一政策。几天前，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国会作证时就曾声称：如果推翻萨达姆政权很有可能会导致更为糟糕的后果。<sup>④</sup>

我最近正在拜读您的《海盗与君主》(*Pirates and Emperors*)一书，并把萨达姆换成穆阿玛尔·卡扎菲，将伊拉克换作利比亚。<sup>⑤</sup>我发现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比亚与今日的伊拉克有很多相似之处。

事实上，时间还要更早一些。这是一系列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只是偶尔在名称上有所改变。例如，今天是2月1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纽约时报》。其中有一篇关于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的

大幅报道。他是一个强硬派,负责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目前正在主持一项每年耗资 110 亿美元的反恐行动,以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攻击。<sup>⑥</sup>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并没有具体说明克拉克是如何保护美国不受恐怖袭击的,但是却列举了一些由美国发动的——尤其是针对利比亚的——恐怖活动。事实上,克拉克曾参与策划了 1986 年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但是有意思的是,该文却并未提及此事。在 1986 年,美国对利比亚发动了一次大型的恐怖主义行动——轰炸了两座城市,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卡扎菲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他们为轰炸行为提供的借口——即便这些借口是正确的——无法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正当性。这实际上是一场战争犯罪。但是该文对此却只字未提,而只是谈到了美军为之采取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向记者散布假消息。因此,这只是一次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文章也的确提及克拉克还曾参与策划了对苏丹与阿富汗的轰炸行动。那也是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就拿苏丹来说吧。1998 年,美国轰炸了并彻底摧毁了当地一家主要的制药厂。这家工厂可能为苏丹全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药品生产。后来,美军才支支吾吾地承认他们可能炸错了目标。但是这也属于反恐行为,而并非恐怖主义行动。如果伊斯兰极端分子摧毁了美国一半的制药工业,我们很可能认为这是恐怖主义行动。但是因为这次是我们做的,所以这就是反恐。事实上,如果你看了整篇文章,你就会发现一系列美国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称之为“反恐”行动——但却没有一个例子说明这是在保护美国不受恐怖袭击的。事

实上,1986 年对利比亚的轰炸——这是迄今为止最恶劣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被用来说明我们是如何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这就是标准。你可以随意挑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时期,然后就会发现大量类似的例证。

在同一篇文章中,被称为这次反恐行动“沙皇”的理查德·克拉克就警告大家要警惕“网络战争”(Cyberwar)和“电子珍珠港事件”(electrical Pearl Harbors)。

我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与对苏丹制药厂的轰炸相比,你如何将可能的网络战争称为恐怖主义威胁呢?它们甚至和我们不在同一个时空。能发动网络恐怖行动的极有可能是发达国家,而美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拥有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让我们重新回到克林顿的话题上来。在时事通讯《左翼商业观察家》中,道格·亨伍德写道,“莱温斯基事件最糟糕的一点就在于:它与一些人对比尔·克林顿的固有仇恨纠缠在一起。他被起诉的罪名都是错误的。”<sup>⑦</sup>如果由您来起草弹劾文本,你会包含哪些条款?

亨伍德说得很正确。“是否应被弹劾”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不知道这些罪名是否足以使他受到弹劾,但是他确实犯下了许多罪行。比如轰炸苏丹是战争罪。轰炸阿富汗是战争罪。在 12 月轰炸

伊拉克是战争罪。强制实行制裁——现在只有美国坚持进行制裁——导致大量民众死亡,这也是一项重罪。当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有报告指出,已有50万伊拉克儿童因为制裁而死亡,你对此有何感受?”她对此的回答是: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sup>⑧</sup>我认为,如果确有50万儿童因对伊制裁而死亡,这绝对是一项重罪。但是她却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同时还有所谓的“福利改革”,以便使人们不再依赖“救济金”。这些词汇很有趣。克林顿成功地推行一项计划,取消了对生活窘迫且需要抚养孩子的妇女的支持。现在我们必须为她们找到工作。到目前为止,她们并没有工作,照顾与抚养孩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工作”应该是指坐在华尔街办公室里倒卖外汇等等。这才是工作,你因此才可以获得丰厚的酬劳,而抚养孩子则不是工作,因为这没有一点社会价值,也不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福利改革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一次胜利,因为现在接受福利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必须去问问老百姓。但是如果政府预期的事果真发生的话,将妇女与儿童驱逐出福利制度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工作收入非常低,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工资幅度中位于低端的人的收入。他们将被迫把孩子丢给极不完善的保育体系。这难道算是成就吗?我没有说这一行为应该受到弹劾,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犯罪。

此外,对国内犯罪问题不闻不问,从而使得美国的囚禁人数不断

上升,这又属于什么行为呢?如果这尚不足以招致弹劾的话,至少这也是一种犯罪。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单子。当然华盛顿的官员们并没有犯下以上的罪行。但是有些罪行是真实存在的。而如果是别国的首脑犯下了这些罪行,我们肯定会坚持要求将其移送国际战争法庭予以审判。

对于联合国宪章以及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您又有何高见呢?

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十分清楚明白。它明确规定:除了为抵抗武装进攻而进行自卫,其他任何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如果别国对你发起进攻,你可以进行自卫直到安理会采取行动。此外,在安理会认定和平手段无法奏效而特别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也是合法的。自始至终,美国都没有接受过这一原则。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国开始公开地、赤裸裸地、无所顾忌地挑战这一原则。在早些时候,美国只在国内文件中规定拒不接受这一原则。在1947年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后不久,美国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第一份备忘录——“NSC1/3,1947”号备忘录——所关注的就是意大利即将举行的大选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他们担心在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中,左派政党可能会取得胜利。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而答案则是:如果共产主义分子在民主竞选中获胜,美国将进行全国动员、命令第六舰队整装待命、支持准军事组织的行动——换言之,美国将利用意大利国内的恐怖



活动搞垮新政府。这无疑属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范畴,但是这是一份不为人知的秘密文件。密谋颠覆、停止食物供应、重新扶植法西斯警察、摧毁劳工运动等等,通过这些行动已经足以达到美国的上述目的。但是,如果上述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推翻新政府的话,我们也很可能会使用武力。此后,这类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内部文件中,你都可以发现上述这些措施一直在得到执行,对此我就不一一指出了。美国多次指出——有时甚至是明确指出——即使没有遭到外来武装进攻,美国也计划并将使用武力。这是美国一再清晰阐明的政策,而且可能是对武力的最大限度的使用。

例如,在1956年,除了一如既往地表示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外,美国政府还决定将允许使用生物武器,而在这方面,美国已然拥有了充足的武器装备。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之后,开始以间接的方式将该政策向半公开化的方向转变。例如,在联合国工作的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就曾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辩护(但是当时没有人这么说),而将之称为抵御“内部侵略(internal aggression)”。<sup>⑨</sup>

什么是“内部侵略”?这意味着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并不是武装攻击行为。当某国内部发生冲突,而你要将它镇压下去,你就不能将之称作是一种侵略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攻击行为称为“自卫”的话,那么你就是彻底抛弃了联合国宪章。但是,你必须仔细思考一会才能明白这点。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肯尼迪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美国国际法学会”

发表演讲,虽然他肯定知道对古巴进行封锁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为之进行辩护。他指出:这无关大碍,因为当涉及到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便不再是问题。我们将不受国际法的约束和限制。<sup>⑩</sup>

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切全都公开化了。当里根轰炸利比亚时,国务院给出的官方理由是:这是为了防止美国在未来遭到攻击而采取的自卫行动。<sup>⑪</sup>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为抵御武装入侵而进行自卫是合法的。如果利比亚入侵美国,你可以自卫。但是这是针对未来攻击的自卫。这简直就是扇了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一个耳光,也就是说:看,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因为未来可能受到袭击进行提前自卫,但这就是美国官方所给出的理由。

同年,有时被称为“国际法庭”(World Court)的国际法院第一次就上述事件做出裁决。国际法院直言不讳地明确指出:美国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了武力”,同时美国也不能以行使自卫权为名,而对利比亚进行轰炸。<sup>⑫</sup>这是国际法庭根据国际法所做出的明确的宣判。这是目前最高的权威。而当时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两院对这一裁决的反应却是立即加强非法使用武力的力度,同时还额外批准了一大笔款项用于违禁援助(contra aid)。美国全国上下,包括媒体、自由派舆论、著名的国际律师众口一词:好了,国际法院名声扫地了。就像《纽约时报》所说的:国际法院的行为表明它是一个“反美论坛”,因此使自身丧失了威信。<sup>⑬</sup>这就等于是说,我们有权使用武力和暴力,如果有人对此不理解,那么就请走开,不要挡着我们的路。

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做出过一个官方解释,虽然并没有受到多大

的关注,但是却值得一看。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Abraham Sofaer)指出: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我们可以确保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sup>⑭</sup>尽管他并没有直言个中理由,但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大权在握,我们拥有所有的财富与权力,它们只能对我们言听计从。但是现在,随着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成功和联合国成员国的增多,我们已经不能确保大多数国家会接受我们的领导了。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由国际法庭或是联合国来评判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们有可能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可能和我们的意见相左。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错了,相反,是他们错了。索费尔声称:对于属于美国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我们都必须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而哪些事务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则由美国自行决定。当时,属于美国国内管辖范围的事件就是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打击。国务院做出的这一解释,适值国际法院做出了相应裁决,以说明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后者的裁决。从这里你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一点,即国际法对于美国来说一文不值。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任意使用武力的政策已经完全公开化。对于1993年年中对伊拉克的第一次轰炸,克林顿的理由是:这是对伊拉克武装进攻的自卫反击。克林顿所言的武装进攻是早在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了,据说有些伊拉克人卷入了一场未遂的暗杀前总统老布什的行动,但是否真有伊拉克人卷入其中,却根本无从知晓。因此,两个月以后,我们向巴格达发射导弹以进行自卫。对这种说词我们甚至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应。

这等于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们将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而且这一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12月份，美国与英国又一次绕过了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了轰炸。

12月份的轰炸太令人震惊了。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报道，这简直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他们不愿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的理由极其明显，因为安理会是不会允许对伊拉克动武的。（对美国来说）安理会只是另一个“敌对的论坛”，诉诸安理会毫无意义。如果美英想要使用武力，他们就会使用，而且尽可能大张旗鼓地使用，以表示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蔑视。军事行动就发生在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一危机之际。参加会议的国家事先并不知情，但是他们可以打开收音机说：正当我们召开会议之际，导弹就已经落在了巴格达。这再清楚不过地向世界各国宣布：你们是无关紧要的。国际法同样无关紧要。我们是流氓国家，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何时使用武力与暴力。

现在我们要问，对此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几乎100%的赞同。事实上，“赞同”这个词用错了。这件事根本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对于轰炸伊拉克一事，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评论，只有一条稍稍靠点边的评论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们不能被一个技术性问题所吓倒。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如果我们决定轰炸，“我们将设定日程

表——不是联合国，也不是萨达姆。”他重申了美国的标准态度，即安理会没有否决美国决策的权力。<sup>⑮</sup>这种说法实在太荒唐了，因为这违反了世界各国的共识。不仅国际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联合国宪章也规定安理会有权否决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这一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英国，因为它是我们的走狗。也不是以色列，因为它是我们的附庸。只有那些不依附于美国的国家才应该遵守这些规定，而不是我们。

这是美国明显、公开、堂而皇之的政策，你甚至不能说这已然得到了知识舆论界的“赞同”，因为这一政策已如此深入人心，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因而都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当然，我们是一个暴力的、恐怖主义国家。这一评判是正确的，也是公正的。这一政策与1949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我们虽然蔑视国际法，但是只敢在四十年后才会得到公布的秘密文件中表现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公开挑衅了。我们高举着一面宣扬大旗，上面写着：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不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有枪有炮，而且我们将会使用它们。

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此有什么反应？

美国对此没有报道，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这一事件。例如，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印度法学家协会”(Indian Council of Jurists)就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美国与英国犯有战争罪。这

一消息是在12月22日宣布的。我的一个朋友查了一下数据库,想看看有没有相关信息,但是至少到年底都没有,甚至连报道也没有。梵蒂冈宣称这是一次侵略行动。但这一消息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报纸某页的末尾。而在阿拉伯世界,则一致谴责这是侵略行径。在英国,舆论对此事件的反应并不像美国这样统一,例如《观察家报》的一篇社论便公开谴责美英两国的行为是对伊拉克的侵略。但是在美国,我却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sup>⑯</sup>

离开美国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媒体。我在1月份时去了泰国。《国家报》是泰国的两家英文报纸之一。苏拉维特·杰安纳玛(Suravit Jayanama)写了一篇措辞非常尖锐的文章,名为《在后冷战时期遏制美国》(*Containing Ame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文章写到:“当华盛顿谈论遏制萨达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遏制这个狂热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超级大国?”<sup>⑰</sup>

这是世界各国大多数人的态度,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当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垄断了武力而且还公开宣称:我们将选择何时使用武力和暴力,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就请走开,这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恐慌。无独有偶,海湾战争后世界各国的反应也是如此。在美国,海湾战争被宣扬成道德与勇气的胜利。但是如果你环视全球,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我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世界各国的相关报道,人们普遍感到非常恐惧。他们说,这些家伙已经疯了。他们下一个要攻击谁?已然不存



在可以对美国形成威慑的力量了。美国将会我行我素,其他国家最好要小心从事。

1998年8月美国对阿富汗和苏丹进行导弹袭击,遭到了许多联合国成员和安理会成员国的反对。当美国在12月对伊拉克发动进攻之后,对此表示反对的国家的数量进一步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开始感到担心与害怕,而这正是美国试图挑起的情绪。美国也丝毫不掩饰这一点。12月份的时候,联合国的一位资深欧洲外交官说道:美国已经抛弃了联合国。美国甚至不希望联合国继续存在。美国现在依靠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来推行它的政策,因为美国认为它可以控制这些组织。他的看法是比较准确的。我认为美国还是会把一些棘手的问题丢给联合国。而对于北约和世贸组织来说,美国只有在它们服从美国的指挥时才会利用它们。当欧盟在世贸组织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时,克林顿政府仿效了里根撤销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做法,撤销了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实际上,美国将之称为“国家安全豁免”(national security exemption)。<sup>⑩</sup>我们必须拒绝向古巴提供食物,否则我们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将面临危险。美国没有直白地表述这一理由,因为这实在是太荒谬了,但是很显然这就是其中的技术性原因。所以对于世贸组织来说,是的,只要它服从美国的命令,那么美国就会利用它。如果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就会将之交由世贸组织处理。如果北约也是对美国言听计从的话,那

么情况也与世贸组织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联合国却并不是十分驯服。

长久以来,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相当耐人寻味。在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很喜欢联合国。它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想要联合国做什么,它就会做什么。殖民体系瓦解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20世纪60年代,虽然联合国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非常敌对,但是仍然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例如,虽然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都强烈反对越南战争,但联合国却从未对此进行过讨论。1966年12月,我和吴丹在联合国总部进行了私下会晤。虽然报道私人谈话有一些不公平,但是很明显他对我说的话也曾对其他人说过,那就是他觉得越南战争是真正的暴行,应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联合国对此却无能为力,甚至不能进行公开讨论。而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情况却大不相同。联合国可以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并加以谴责。但是当美国入侵越南时却不可以。

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甚至有人企图要取缔联合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当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南方国家,试图打破西方国家对信息系统的垄断地位,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力图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信息媒体与科技时,而美国却对此做出了歇斯底里的反应,随后便发生了一连串十分有趣的事情,其间夹杂着大量的对上述努力的污蔑与辱骂,称这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是试图推行国家对新闻的严密管制。事后证明这全是谎言。而谎话在遭到批驳之后,又被一再地重复,但那些对此进行批驳的言论却又得不到公开发表。

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埃德·赫尔曼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希望与愚蠢》(*Hope and Folly*)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⑩</sup>但我却没有找到任何对此书的评论。威廉·普雷斯顿是研究联合国历史的专家。他评论说,在美国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企图破坏思想交流的自由场所时,美国却拒绝公开发表对这些谎言的批驳之词,从而证明在美国也并不存在这样的自由场所,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事实也正是如此。埃德·赫尔曼以他详尽的写作风格介绍了有关此事的媒体报道以及它的整个运作过程,包括拒绝发表批驳的言论和在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欲盖弥彰等等。

这一切,包括对所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都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恐惧,即权势阶层害怕失去对信息与观念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如果别人获得了这种控制权,他们就有麻烦了。对此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存实亡。它已经被驯服了。美国现在正在试图破坏联合国,这也是美国拒绝缴纳会费的原因,因为联合国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了。当它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美国还会利用它。所以当索马里行动失败后,美国并不会受到什么损伤,因为美国可以指责联合国,说是联合国的无能导致了这个结果。有时候美国不愿意做某些事,而联合国恰好可以作为替罪羊,这时美国也会用到它。

您还曾指出:与利比亚相似的另外一点是发生在1986年4月

“黄金时段”的轰炸。

利比亚的情况很具戏剧性。媒体和评论员发挥了很大的自我控制能力才没有对此进行报道。对利比亚的轰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的下午7点整。这可不是什么小把戏,因为7点钟正是美国的三大电视新闻网的晚间新闻时间。这就意味着里根政府可以免费在电视上做宣传。首先,电视摄影机立即转向了在黎波里与班加西发生的战事——全面停电、炸弹爆炸,这些都是激动人心的事。然后你就会看到里根政府声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对未来的袭击进行自卫反击”。他们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新闻的内容,之后一切就按他们的计划进行了。

人们肯定会问,为什么轰炸会在7点整晚间新闻开始的时候发生呢?这可不是一件易事。从英国到利比亚有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美国不能直接飞往利比亚,因为欧洲国家不允许。他们反对对利比亚进行轰炸,所以美国空军只能借道大西洋和地中海。他们在7点准时到达目的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在黄金时段的电视上播出而定时进行的战争罪行。

人们会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电视新闻网的人员会在利比亚呢?美国广播公司是不是在利比亚有一个站点?他们会在那里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通知:在利比亚当地时间早上2点时做好准备,我们会让你们看一场好戏。这些公司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这种事是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你可以回头看一下1986年的新闻,看

看关于这个内幕当时有多少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伊拉克。轰炸是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点进行的,就在新闻节目开始之前。或许这只是个巧合,但是我认为这很值得怀疑。

今年1月,您在剑桥做了一次题为“生存动员”(Mobilization for Survival)的演讲。听众中有人问您美国应该对伊拉克采取什么措施?您的回答很有趣。

我再次认为,当我们考虑任何类似事件时,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我们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现在有一种先人之见,就是我们应该对萨达姆采取一些措施。这对吗?假如有人问到,伊朗应该如何处理萨达姆?这个问题合适吗?你可以想一下伊朗可能做的事。或许他们会用核武器进攻伊拉克。这个答案正确吗?这个问题正确吗?伊朗和我们比起来,有更多的理由担心萨达姆。伊朗在十年前遭受伊拉克入侵时就失去了成千上万的人民。他们是毒气与化学战的受害者,所以他们更担心萨达姆。

我们应该问伊朗需要对萨达姆采取什么措施吗?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显得很荒谬。伊朗不应该对萨达姆有任何举动,因为它没有这个权力。如果他们没权力,我们就更没有权力了。毕竟,我们是萨达姆的支持者。我们并没有被他攻击,反而支持他的暴行。所以我们必须对萨达姆采取措施的想法本身就很有问题。

如果你硬是要问,我们应该对萨达姆采取些什么行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像伊朗应该做的那样——遵守法律。如果伊朗感受到了萨达姆的威胁,那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此采取行动。事实上,伊朗目前并没有感到威胁,因为萨达姆在美国的进攻与制裁后元气大伤,他根本不能造成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威胁。但是如果伊朗确实有此感觉,它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应该如何对付萨达姆?第一件事就是要记住一个医学格言,“第一,不要伤害别人”。如果你记住了,你可以开始问,我们能做一些好事吗?让我们从“第一,不要伤害别人”开始。我们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们顽固奉行扶持萨达姆的政策,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致使成百上千、甚至是上百万人死亡。这都是在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必须停止这些行径,并且停止支持萨达姆。轰炸伊拉克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不仅仅是因为轰炸本身,而且是因为轰炸结束了调查小组的工作。虽然调查机制尚不完善,但是却远比轰炸更成功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

克林顿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而且,美国政府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一后果。他们事先就说,如果我们进行轰炸,调查工作就会停止。这无异于制造伤害。事实上,反对一个民主政府就是在制造伤害。1998年12月,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一次有趣的评论中就承认了这一点。她说,“我们认定,如



果伊拉克人民能够有一个真正代表他们的政府,人民就会受益。”<sup>②</sup>这是我们在1998年12月份所认定的。请你注意这句话的真正涵义。1998年12月之前,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能够维护伊拉克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反对这种观点。现在,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依然反对这一观点。

美国能不能做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呢?毕竟,美国拥有巨大的权力。或许能够做一些,对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伊拉克的反对派提出了一些建议,值得考虑,而是否要执行这些建议还需要我们做出决定。但是如果立即就设定我们必须“进入”伊拉克并“做些什么”,这是有问题的。谁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爱德华说,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埃德·赫尔曼和您最近发布了一篇关于伊拉克的声明。<sup>③</sup>您在声明中指出:“有良知的人们,现在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将此事作为当务之急,就像美国人组织起来阻止越南战争一样……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动一场运动来取消(对伊)制裁。”我知道您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制裁,比如您就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共有四个人签署了那份声明。声明是由在得克萨斯大学任教的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起草、组织与发表的。这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那些真正在做事的人总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只知道那些站出来说话或是签名的人。这是他的请愿书,

我们只是联署而已。

人们实施任何制裁都需要拿出证据。能够举出证据吗？有时候能。就以南非为例，我对此有两点看法，第一就是对南非的制裁是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的。黑人和一些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都赞成制裁。这是个很好的论据。如果人们都赞成，那么这说明，但不是证明，这或许是个好主意。第二，如果美国能够遵守制裁措施，对南非进行制裁倒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美国没有。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破坏制裁行动，并继续和南非进行商贸往来。

这是“建设性的接触”吗？

里根当局反对制裁。是国会强迫行政部门同意的。之后的记录便含糊不清了。美国并没有严格执行制裁。事实上，我相信和南非的商业往来反而增多了。但是进行制裁确是一个好主意。对罗得西亚，也就是现在的津巴布韦，也同样应该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可以而且也确实产生了建设性的成效，而且大多数人都赞成。

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 1991 年海地的军事政变。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并且一直有证据表明，绝大多数人虽然因为制裁而遭受苦难，但都愿意接受制裁。他们一有机会就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如此，但是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我认为在这件事和在南非的事上，制裁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美国没有阻碍制裁的话，就太好了。但是美国却的确阻碍了制裁的实施。

制裁行动很快就遭到了破坏。在海地军事政变之后,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马上进行了制裁。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老布什政府就宣称美国公司免受制裁。《纽约时报》刊载了这一消息,并称赞说这是一个好的举措,因为政府对制裁措施的略加修改更符合海地人民的最大利益。<sup>②</sup>这是个很好的润色。

与海地的贸易来往仍在继续,但不是全面进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两国双边贸易上升了50%。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任何制裁机制的核心要素都应该包括对石油的禁运。中情局在国会作证时,始终声称已对海地实施石油禁运,制裁正在进行。但是每一个海地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石油在不断地涌入。你可以看到富裕的家族正在建造大型的油田。你不知道石油是从哪进来的,但是它确实源源不断地进入海地。

1994年9月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准备解放海地的前一天,美联社以头条新闻——这意味着所有的新闻社都看到了这条新闻——报道说,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非法授权德士古公司(Texaco)向海地军政府输送石油。<sup>③</sup>这是一次民主的重大胜利。那天我碰巧在看新闻,所以我看到了。司法部也平静地承认了这些事实。这表明,美国政府知道进入海地的石油来自何方。克林顿,以及他之前的老布什都告知德士古公司,虽然总统下令禁止向海地输送石油,但是政府不会执行这条禁令,所以如果该公司愿意,他们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美国通过瓦解制裁机制暗地里支持军政府,直到军政府对人民做出了无数暴行之后,美国政府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出手干涉,扶

植让-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重新登上总统宝座,但是条件是,他必须服从1990年大选中下台的总统候选人的安排。但是这是一个实施制裁具有正当性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例,你必须一件一件地分析。对于制裁事先总是有人强烈反对,我们必须找出证据来证明制裁的合理性。有时候我们是有充足的理由来加以证明的。

对伊拉克的制裁已将近十年。有关文件清楚地表明:制裁给普通伊拉克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这件事还有另一面,就是制裁在某些方面壮大了萨达姆的实力。比如,制裁削弱了萨达姆反对派的力量。人们忙着维持生存。每个人都变得绝望、睚眦必报,臣服于任何形式的权力。这些都是对灾难的自然反应。我们还应该铭记在心的是:1991年的轰炸和制裁本身就是生物战的一种形式。上述行为属于确实使用而不是威胁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你破坏了洁水、污水系统与发电系统,你相当于在传播细菌,从而导致疾病。这就是生物战。

我们绝对有理由担心生物战会在伊拉克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爆发,但是我们应该更加担心包括生物战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相关文件的记载十分清楚。人们可能会争论死亡的儿童人数是否真有50万,是更多还是更少一些?但是它造成的实质性伤害却是毋庸置疑的。而它同时壮大了萨达姆的力量,这也是毫无疑

问的。

几乎每年《纽约时报》都会有一篇题为“许多阿拉伯国家认为对以色列存在双重标准”的文章。<sup>②4</sup>然后就会有一篇相关报道，并引用了许多学者与政治领袖的话说：那么美国也在奉行双重标准。当您游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谈到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时，人们有何反应？

我不会这么说。我也不认为存在着双重标准。我不认为美国的政策有不一致性。只有一个标准，而且美国自始至终都在贯彻这个标准。这些政策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内权势阶层、政府—公司关系网（state-corporate nexus）的利益。美国一直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政策，没有什么双重标准。它们和法律、道德或是福利无关，而是旨在谋求某些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一一说出这些利益。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但是却可以清楚地得到指认。我认为美国政府一直坚持维护这些利益。所以当人们，全世界的人们，说到双重标准和政策的不一致时，我的回应就是，你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不对。这个政策是贯彻始终的，前后连贯的。冷战改变了这一政策战略上的应用，但是在冷战前美国就已经开始实行这个政策了，冷战后则继续加以推行，有所改变的只是战术上的应用，这和其他政策是一样的。

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意识到了吗？当然。以我们的盟友埃及为例，

它的一家半官方性质的报纸《金字塔报》办有英文周刊，我每周都会看。他们十分痛恨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的“双重标准”，但是我认为“双重标准”这个词用错了。此外，印度、泰国和其他地方也如此。甚至连一些西方国家也称美国的观点“奇怪地不一致”。欧洲大陆广泛反对美国对西亚，就是我们说的中东的立场。他们说这是美国在行使双重标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这个政策是相当理性的，虽然有时候人们会理性地选择一些无用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是非常理性、一致的，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在解释与推行这个政策。如果把它称为不合理的、是双重标准、或是不一致，就太不准确了，因为这样说的前提是认定有一些疯子做事不按常理出牌。事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这些官员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计划，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并尽力付诸实践的。他们不是不会犯错，实际上他们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充分显示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有时在基辛格的操作下，这些错误简直变成经典。然而，美国的这个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且具有连续性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您上一次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时事纵览”栏目，时值1991年2月海湾战争期间，您曾做了2分钟的评论。<sup>⑤</sup>

2分30秒。对此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和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他们坚持先看我的稿子来确定是不是可以播，而且时间只



有2分30秒。他们必须录下来,确保无误。我没有机会说他们审批之外的东西。我第一次念的时候,花了2分36秒。他们告诉我要读得快一点。第二次,我成功地在2分30秒的时间内读完了他们审批过的内容。

您主要点评的是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国家。您当时设想美国会对特拉维夫、安卡拉和雅加达进行轰炸。

当时那样说是可以的,因为在1991年时,土耳其开始加大对库尔德人的攻击。那时我不知道,但是自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支持土耳其对其东南地区的库尔德人大肆进攻,几乎摧毁了整个农村地区。大约有100万人逃到了库尔德地区的半官方首都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土耳其使用了美国提供的喷气式战斗机。国会发现后表示反对,因为这是非法的。土耳其犯下了一长串的罪行,包括使用酷刑、侵犯人权、入侵塞浦路斯。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太糟糕了。那么,为什么不轰炸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呢?因为是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装备。事实上,土耳其在加强对库尔德人的镇压的过程中,可以算是美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至于雅加达,苏哈托治下的人权状况和萨达姆的一样差,甚至还要糟。

《纽约时报》可不这么认为。

据克林顿政府的一位官员称,苏哈托是“我们自己人”,一个仁慈的独裁者。<sup>⑤</sup>他 1965 年上台之时,屠杀了大约 50 万人,剩余的那些人就不用我们多说了。那年,也就是 1991 年,在我发表评论的几个月之后,在东帝汶发生了帝力大屠杀。公众最终注意到了这些事情。所以,当然要轰炸雅加达。

以色列一直占领着黎巴嫩的南部部分地区,这违反了安理会 1978 年 5 月一致通过的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军的决议。美国却告诉以色列,不用理会联合国的决议,因此以色列军队就继续占领着该地区。他们一直对黎巴嫩的其他地区进行恐怖袭击,对那些被占领土进行残酷的镇压活动。以色列内部还对战俘滥用酷刑,窃取以色列境内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我们还可以列举一大堆的罪行。所以,轰炸特拉维夫,这很好。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应该受到轰炸的国家。

如果你看到美国主要援助对象的名单,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严重践踏本国的人权。“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人权组织每年都会指出这一情况。他们说,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所提供的所有援助都是非法的。美国不能向系统地迫害人民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是浏览一下援助的名单,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在西半球,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主要的军事援助对象是哥伦比亚,它拥有世界上最差的人权记录。

这就是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中所要阐述的。当然,你不一定非要轰炸这些国家。如果你想要阻止这些国家的恐怖活动与暴

行,就不要支持它们。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了第一点,“不要伤害别人”。没有必要轰炸雅加达或安卡拉,只要停止向它们提供援助,然后你就可以想想下一步能够做些什么。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您为时 2 分 30 秒的评论,完全被鼓吹海湾战争的大量宣传淹没了。

坦白地说,我很惊奇,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竟然还允许我占用这一点时间。这实在是太少见了。通常他们都坚持完全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在公众的压力下,他们愿意挤出一点微小的空间。

但是您的评论却没有任何上下文的语境。普通听众肯定会说:什么?轰炸特拉维夫?我不懂。然后他们就会去看下一条新闻了。

这让我会想起了“夜线”(Nightline)节目主持人的评论。

您说的是杰夫·格林菲尔德(Jeff Greenfield),他曾经是“夜线”节目的主持人。

他谈了一点,非常的正确。他解释说为什么不让我参与他们那个节目,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听起来像是从海王星来的。第

二,我的评论不简洁。<sup>⑦</sup>对此我表示同意。

您两点都同意了?连说您是来自海王星您也表示同意?

从他的观点来看,是的。事实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在那 2 分 30 秒的时间内所说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听众都会认为我是从海王星上来的。没有前提,没有背景,也没有证据。我的评论和他们所听到的截然不同,合理的反应就是:这个家伙一定来自海王星。这个人疯了。这是对的。

关于简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是一个很好的词。你必须恰到好处地构筑你的评论,使它能刚好挤在两个广告之间,或是夹杂在一连串的宣传中间。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就你所说的话进行解释。所以你只有面临非常简单的选择,要么你重复别人的老生常谈,这不需要论证;要么你就只能说一些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听起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简洁要求你不能用证据来论证你的观点,而大量的统一的言论只会使我的话听起来很荒唐。

所以基本上我同意他的评论。我认为他们对工作十分尽职。因为这样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思想控制,避免人们进行思考,即便是思考像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极其简单的事情,比如,为什么两个党派之间会对一个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产生分歧?或是为什么我们要轰炸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残害人民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没有时间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

就范围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的和地缘政治的局势而言,您如何看待美国对欧洲的政策走向?欧元,这一新的货币将在未来的十年内开始使用。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法兰克福基本上已经在印制和管理欧元了,而柏林不仅成为德国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欧洲主要的交通枢纽。您认为欧洲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件好事吗?

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欧洲”。迄今为止,欧盟仍处在各中央银行(central bankers)的严密控制之下。欧洲是一个由中央银行支配的体系,这就意味着实施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及努力削减社会福利契约(social contract)。在某些方面,欧洲确实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例如,欧元可能成为另一种全球性货币,这将给美元的统治地位带来各种复杂的影响。比如,石油价格不再简单地以美元标价。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美国的力量。

欧洲与美国之间是有分歧的。无论欧洲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它和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看法。中东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在这个前提下指的是除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英国是美国忠实的走狗。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在东欧、巴尔干、西亚、石油生产国和其他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要记住美国与英国不仅仅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处于孤立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在伊朗问题上也受到孤立。在古巴问题上他们则是完全孤立的。事实上,美国在古巴问题上只是孤军奋战,连英国也持有异议。以色列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立场,他们必须这么表态。但是他们也违反了对古巴实施禁运的规定。在伊朗

问题上,美国与英国基本上是孤立的,但不是完全孤立,以色列是和它们站在一起的。土耳其或许也对此表示赞同。但是欧洲整体来说是持反对意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会在世界事务中表现得更加独立,这将把美国推向一个更为艰难的境地。

欧洲会成为一支什么样的力量还有待观察,但肯定是一支独立的力量。美国在推行它在西亚地区的计划时会面临艰难的局面。这个计划对美国来说颇为重要,因为西亚地区是世界能源之所在。在我看来——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我们手头没有相关文件——美国尽力表现得专横暴力、睚眦必报且不受控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吓退欧洲和其他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劝服你,那么你们就滚开吧,因为我们是专横暴力的,也是很危险的。大约一年以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发布了一份有关战略部署计划的文件,名为“后冷战时期威慑的要点”(Essentials of Post-Cold War Deterrence)。<sup>⑧</sup>虽然很难获知整份文件的内容,但是仍有部分内容被披露出来。该文件宣称,美国应该建立起暴力的、睚眦必报的、不受控制的国家形象,而这将会对人们起到震慑作用。

这听起来很像尼克松的疯人理论。

这可以说是尼克松的疯人理论(madman theory)某种形式的再现。没有人知道这个理论是否存在,只不过H·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或是其他什么人声称这个理论是由尼克松率先提出



的。这个理论清晰易懂,但并不是由美国首先提出的。之前就曾有人提出来了,大体是说,我们无法说服其他人,但我们十分强大。在武力方面,我们是无可匹敌的。因此,建立一个暴力的、睚眦必报的、不理智的和不受控制的形象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用核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基于美国兵强马壮,以及美国所处的孤立状态(特别是在西亚问题上),这样的理论是有道理的。这也可以部分说明美国对苏丹、阿富汗或是伊拉克的轰炸。美军对伊拉克的攻击可以说是对联合国最厚颜无耻的侮辱。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受任何控制,而且睚眦必报,因此他们最好是小心为妙。伊朗和伊拉克问题都是这样。在伊朗问题上,欧洲,即使是英国,也希望能够让伊朗重回国际大家庭。

他们最近建立了外交关系。

很明显,他们希望伊朗回到国际社会。在中东,以色列、土耳其、巴勒斯坦当局之间明显结成联盟。他们之间看起来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巴勒斯坦曾是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中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它们的结盟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因此如果此事能够不公之于众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这就是巴勒斯坦当局的作用。他们最好能用残酷的手段控制以色列或者说是美国统治下的“班图斯坦”<sup>\*</sup>。这样就可以使巴勒斯坦问题

---

<sup>\*</sup> Bantustan,指南非当局控制下的黑人定居区,或称“班图自治区”。——译者

得到缓解。

以色列与土耳其是两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此国际社会已作出了反应。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已经向恢复友好关系的方向迈进,这一点相当引人注目。伊朗至今依然占领着沙特在波斯湾中的一些岛屿。埃及也参与了此事,还把叙利亚也拖了进来。

结盟的对象不停变换、丰富的石油资源、装备精良的军队,这一切使得中东成为一个十分危险、动荡不定的区域。这里是世界能源的主要来源。而且所有的预测都表明,它的作用在未来还会不断扩大。

欧洲,甚至是阿拉伯国家,都不希望伊朗再次陷入以前的孤立状态。有趣的是,美国的石油公司也希望伊朗能重回国际社会。但是美国政府至少目前对此表示反对。这就是为什么中亚石油管道的铺设会引起这么多的争执。石油公司和欧洲希望管道穿过伊朗,这是最便宜、最稳定也是最佳的路线。美国却否定了这个计划。他们希望管道最终通到土耳其,并绕开俄罗斯。因为这将涉及到谁能够控制里海的石油资源并从中获益的问题。虽然里海不能和波斯湾相提并论,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利益已经相当可观,所以才会引发许多争论。

回到刚才你所说的话题,欧洲越独立,它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权就越大。

美国与欧洲已经出现了贸易战的迹象,比如香蕉贸易争端。

欧盟与美国目前正在世贸组织进行一场激烈的争执,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公司。欧盟向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欧洲殖民地提供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希望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该地区那些大的生产商,那些非常富有的公司都是由美国公司掌控的。所以他们想要进行公平竞争,而这意味着加勒比海那些岛国将会遭到压榨。

您曾经多次谈到您不是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您不可能支持每件事。那么您在决定参与某一件事时会考虑哪些因素?例如,您一直密切关注东帝汶。但是在西藏问题上,尽管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您却并没有多作评论。

部分原因在于你能够为某件事做些什么。这和日常生活是一样的。如果你对某件事束手无策,那么说得再多也毫无益处。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谴责成吉思汗,但这没有一点道德价值。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某事?例如,对于一些美国直接参与的事情,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大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一件事引起了媒体多大程度的关注。如果这件事受到了广泛关注,有许多人都在谈论,那么我对此再说些什么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即使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以南非为例,虽然我认为消除种族隔离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但是我说的很少。原因就在于,对于种族隔离已经有非常强有力的反对的声音了,这时我再站出来说:我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赞同,就不会有

多大的助益了。我宁愿讨论一些不太受人关注的事情，那些一直被隔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但本质上却十分重要的事。在这些事件上，我们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从上面的问题中，你可以做出一些判断。

还有一些事则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我碰巧从小就关心以色列或曾经是巴勒斯坦的那片土地。我是在充斥着这些问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曾在以色列生活过，读过希伯来语的报纸，在那里还有许多的朋友。所以很自然我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除去部分个人原因之外，我认为上述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西藏问题，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写过一点东西，指出我们应该牢记并反问自己：为什么西藏隶属于中国的版图？其他的偏远省份情况如何？西藏、满洲和蒙古为什么属于中国？事实表明，美国对此表示赞成。在当时，英国也是世界主要强国之一。西方国家与美国都支持把这些偏远的省份纳入中国的版图，主要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朋友蒋介石将要统治这片土地。所以西方国家支持这个准法西斯政权(quasi-fascist regime)控制这一地区，它们希望蒋介石政权能够变得越强大越好。当时也曾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例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一位专门研究蒙古与中国其他偏远省份问题的专家，便曾表示强烈反对，而他则被约瑟夫·麦卡锡指责为共产主义分子。当中国在 1950 年解放西藏时，西方国家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而只是延续了以往的政策。

1 月 6 日，我在泰国看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了

调查越南二噁英问题的《哈特菲尔德报告》(*Hatfield Report*)。节目里说,二噁英是越南战争的一个富有破坏性的遗产,大约14%的越南南部地区遭到了污染,今天在越南出生的一些婴儿因此出现了裂腭、精神疾病和畸形等问题。但是对于此事,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只有《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sup>29</sup>

《哈特菲尔德报告》很有趣。我想它是由加拿大政府和其他组织资助的一班加拿大人搞的。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选取了一个拥有良好的(用于对照试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的山谷。他们发现了含量极高的二噁英。戴维·兰姆(David Lamb)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是当时对此事做出的惟一报道。之后,又陆续有人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我一直在收集有关的文章。一年前,《华尔街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sup>30</sup>《纽约时报》也时而有所报道。他们和戴维·兰姆都不约而同地写了一句话。好像是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兰姆谈到这里会是研究二噁英后果的最佳场所。他写道:我们对此事的漠不关心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理想的测试点。越南南部遭受了化学战,但北部没有。他们幸免于难,所以我们有了对照物。那里的人具有相同的基因,因此可以起到良好的对照效果。通过对比南方与北方,我们可以发现化学战,特别是二噁英造成的后果以及生物破坏情况。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时代》周刊驻东南亚记者巴巴拉·克洛赛特(Barbara Crossette)在科学版上写了一篇相关报道,说这是个很有趣

的科研机会。<sup>⑩</sup>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应该向他们道歉，毕竟是我们使西贡的医院挤满了近 50 万早夭或严重畸形的婴儿。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应该向那些受害者伸出援手。我们丧失了一个学习有用事物的好机会！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但它却极富戏剧性地证明了你早些时候所引用的泰国报纸的言论，我们必须遏制美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权力，而且因为它的学术文化的恶毒。能够看着化学战的后果，然后说，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因为这里有对照物，这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很少有记者亲自到越南来亲眼目睹这件事。有时有些记者会这么做。我只知道有一个很出色的以色列记者名叫安侬·卡普里欧克 (Amnon Kapeliouk)。他也是《世界报》驻以色列的记者。几年前，他去了越南并在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报纸上对他的所见所闻做了报道。<sup>⑪</sup>太可怕了。他说，这使我想起我们在审判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和约翰·丹珍朱克 (John Demjanjuk)\* 时所听到的罪行。他不是说这里有一个好的实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而是说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罪行。

---

\* 丹珍朱克，曾是纳粹集中营警卫，丹珍朱克在 1952 年申请美国移民时隐瞒了这段历史。2004 年美国司法部将 84 岁的丹珍朱克驱逐出境。——译者



哈特菲尔德的研究正确地指出,针对越南的化学战旨在销毁食物供应。这是发动化学战的主要目的。当肯尼迪在1962年根据“农场雇员计划”(Operation Ranch Hand)授权美军进行化学战时,目的之一就是为摧毁那些进行“内部侵略”的国家的食物供给。它造成的生态破坏是巨大的,人员伤亡也极为惨重。我想越南估计有50万人受到伤害。结果很明显。美国之所以关心这一议题,是因为一些美国越战老兵也是二噁英的受害者,当然程度比越南民众要小得多。

他们也直接接触到了橙剂\*。

橙剂含有二噁英。当然它对于生态、农村以及大多数人的毁灭性伤害只发生在越南,不在美国。我曾经看到过一些令人震惊的评论。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例子,现在我再说一个。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华尔街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对越南某一遭受化学战的省份作了报道。<sup>③</sup>文章是从现场发来的。作者质疑道:为什么美国不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呢?随后该文指出:美国因为战败后情绪低落,因此无法关注到这件事。

先不说美国并没有战败——相反它胜利了——这表现出美国的道德水准低得令人惊讶。我们消灭了一个国家,让成千上万的人因癌

---

\* Agent Orange,一种用作化学毒物武器的除草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为橙色,故而得名。——译者

症或天生的畸形而遭受痛苦或死亡，400 万人在战争中死去，三个国家基本上被消灭。而我们却情绪低落到无法注意到这一切，因为我们太痛苦了。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以外的人们都认为应该遏制这个超级大国了吧。

兰姆写道，“美国从来没有在橙剂对越南人造成伤害这件事上表过态。华盛顿似乎没有人想要承担这个责任，每个人都想忘记这场战争。”<sup>④</sup>

每个人都想忘记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达到了主要的战争目的。美国最担心的是越南可能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可怕的是，这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这种病毒可能会传播到其他的国家。美国在战后彻底消除了这一担心。因为，当你消灭了一个国家，它就不会独立了，这样也就不会给他人树立什么榜样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商业媒体意外地发现了这一点。《远东经济评论》撰文指出，你们这些家伙应该宣布胜利，回家去吧，因为你们确实胜利了。<sup>⑤</sup>

但是美国并没有达到其最高的目标。它没有把越南变成另一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美国说它失败了。但是事实上，美国已经实现了主要的目标。现在，我们回家了。美国的态度太令人震惊了。卡特总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可以算是各国元首所能说出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我们不欠越南什么，因为“破坏是双方面的”。<sup>⑥</sup>没有人对此做出评论。这番话并没有影响他作为伟大的道德

英雄的地位。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就更糟了。事实上,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可能觉得卡特过于倾向于道德等值,因为卡特说破坏是“双方面的”。里根甚至根本不值一提。他一向是别人递给他的便条上写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老布什想必是自己写的发言稿。他说道,越南人应该明白,我们不想要求获得赔偿。我们只是想让你们诚实地描述对我们所犯下的罪行。老布什的这番话被刊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里。<sup>⑦</sup>

我不知道编辑是不是刻意安排的,就在这篇新闻的旁边,刊登了一篇思考为什么日本不肯完全承认自己战争罪行的文章。文章使用了一个词“bansei”,可以翻译成“遗憾”或是“悔恨”。<sup>⑧</sup>接下来就是一大段的哲学讨论:他们应该为他们的侵略行径道歉,但是他们退缩了,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也有罪。我们都知道法国、英国和美国从来没有进行过屠杀,只有日本人才这样做过。所以他们并没有讲真话,也没有承认他们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有坏的基因。

与该文相邻的老布什的讲话则声称:越南人知道我们不是要求赔偿,我们只是希望他们向我们道歉,并诚实地描述他们的罪行。<sup>⑨</sup>说的时候真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我收集了 1988 年后期的一些相似的报告,并编排在一起。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报道,因为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这是个理想的“测试域”(testing area),或者你愿意怎么称呼都行。

1962 年到 1971 年,美国用橙剂污染了越南南部的大片土地。当

谈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问题时，是不是也应该谈到这件事？

这是一场化学战。这件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化学战和生物战同属一个类别，是二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日本人广泛地研究了细菌战。他们有一个邪恶的项目，由 Shiro Ishii 负责。他们在人身上做门格尔\* 式的实验(Mengele-style experiment)，试图研发细菌战与其他生物战形式。显然，他们的研究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你在人身上做实验，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令人发指。但是战争刚结束，美军就收编了这个研究小组。研究人员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罪行的审判。当时的苏联军队抓获了几个，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但是却被美国斥责为表演。同时，美国将他们全都笼络在自己手下，接收了他们的一切成果，并将之纳入美国在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和其他地方的化学与生物战项目。到 1949 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化学与生物战列为第一次打击的选择之一。到 1956 年，率先使用化学与细菌战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直到最近，我才相信美国曾经在朝鲜和中国进行过细菌战。我一直认为这只是宣传。但是现在不相信不行了。有新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斯蒂芬·恩迪克特(Stephan Endicott)和爱德华·哈格曼

---

\* 门格尔，绰号“死亡天使”，奥斯威辛集中营医生。以用囚徒作医学试验而臭名昭著。——译者

(Edward Hagerman)所著的《美国与生物战》一书是基于美国和中国的档案文件写的。虽然我不能说是百分百的准确,但是却已经足以证明美国曾经发起过细菌战。<sup>④</sup>至少有间接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曾在朝鲜,或许也在中国进行过生物战。如果你在两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认为这是胡说。但是我想现在已经不能这么说了。已经有证据表明,这或许是真实的。

美国极力地想要掩饰这一切,甚至一直否认曾接收过日本军队。最终这件事在20世纪60年代创刊的激进派专业刊物《关心亚洲学者通讯》被揭露出来。<sup>④</sup>它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其中引述了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美国最终只好承认了这一问题,所以对于这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

你谈到了化学战。对越南就是直接使用化学战的,事实上是化学战得到最广泛使用的一个战例。而且,化学战现在还在进行。目前在伊拉克就进行着类似生物战的战争。但是先看一看哥伦比亚和安第斯地区。这场疯狂的毒品战争的部分内容——在这里“疯狂”并不是指失去理智——几乎和毒品毫无任何关系。战争中使用了一种生物武器以检验它是否可以用来销毁可可。没有人知道后果将会如何。要了解计划的细节很困难。但是他们引进了一种生物重组的菌类,据说可以消灭可可。谁知道他们将要怎么做呢?此外美国还用了一种除草剂,它的制造者道公司(Dow)多次公开声称这种除草剂很危险,不能够使用,特别是在南美洲这样的地区。但是美国还是用了。这是一种除草剂,和别的不一样,是使用某种菌类来消灭庄稼的。他们

还要做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个实验，就像日本人做的实验。这是用像哥伦比亚的农民这样的无关紧要的人来做的实地实验。或许它会消灭可可。或许它会消灭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迟早会找到答案的。

谁来喷洒这些药物呢？是麻醉品管制局还是哥伦比亚军方？

都有。美国向他们提供了设备。我不知道美国的飞行员是不是也曾参与其中，但是这也没什么两样。这是美国和哥伦比亚军方的联合行动。当然你肯定会问，为什么农民会种可可呢？他们喜欢吃可可吗？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哥伦比亚在三、四十年前是小麦生产国。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它的小麦生产却因为美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Food for Peace program）而遭到破坏。该计划向哥伦比亚输送了大量的农业产品，从而断绝了该国的一项主要出口业务。

咖啡是另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是对于小生产商来说，只有当咖啡的价格较为稳定时才有利可图。如果咖啡的价格起伏不定，你就不能指望农民种植它。一个大公司可以忍受一年的价格下跌，等待来年。但是那些指望着咖啡养家糊口的人却无法承受。所以曾经有人努力想要建立一个咖啡生产商的垄断组织来控制咖啡的价格在一定的幅度内波动。但是美国先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早些时候，后来又在 80 年代后期横加阻挠，这使得许多小生产者被迫退出咖啡行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你可以去城市,住在贫民窟里做个若有若无、受人摆布的人,然后被警察杀死。或者你可以搬到偏僻的地方种一些可以营利的东西,像西方国家告诉你的那样,做个理性的资本家。你也可以按照美国设定的标准做个理性的农民,那就是种可可。

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玻利维亚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切断了除生产可可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强迫农民放弃生产供当地消费的庄稼,而转而种植可以出口的作物,并且像一个理性的资本家一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还必须消灭这个国家,再把它建立起来,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这个新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军事国家,它将会消灭那些被迫种植可考的农民。这就是美国对安第斯地区的政策的本质,计划的一部分就是使用生物武器。

现在这个计划正在进行。要找到直接的证据太难了。所以我只能提出这件事,做一些猜测,但是它看起来确实是如此。这是个实验,就像在越南进行化学战也是实验一样。那个实验对几十万越南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那些非常关注堕胎问题的人却一点也不关心装在瓶子里的越南婴儿。这只是个实验,再说他们只是些没有价值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地区,特别是老挝和越南,所造成的另一个遗患,就是未引爆的炸弹和地雷。

你不时地会听到类似于7个越南儿童在玩耍时踩到地雷被炸死的消息。但是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是老挝。当时美军在老挝投下了上亿颗炸弹。美国政府承认大多数的轰炸和越南战争无关，其目的只是为了阻断胡志明小道，这本应令人感到义愤填膺，但事实上大多数轰炸行为却并没有激起众怒。大多数炸弹扔在了老挝北部的查尔平原，在那里一些农民正在进行低水平的革命。那里成了人类历史上受轰炸最为严重的地区。虽然后来内柬埔寨(inner Cambodia)受到的轰炸更为猛烈，但是在那时这已经是历史之最了，而且攻击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社会。

对此我有一些了解。因为当时我就在那里，离万象只有几英里。我采访了一些难民。当时有几万名难民从查尔平原逃出来。我是和一个能说老挝话的美国志愿者弗雷德·布兰夫曼(Fred Branfman)一起去的。他一直想引起人们对此事的关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一起采访难民，并在《与亚洲作战》(*At War with Asia*)一书中写到了此事。<sup>④</sup>

受到轰炸的人多年来一直在洞穴中生活。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武器，包括能够穿透洞穴的火箭炮。弗雷德·布兰夫曼几年前还回到了查尔平原。他去了一个受到火箭炮攻击的洞穴。那时所有在里面的人都死了。他们之所以住在洞穴里，是因为不能住在外面。他们试图在晚上种田来维持生计，因为晚上的时候轰炸会停止。最致命的武器是一种绰号为“炸弹小子”(bombies)的色彩鲜艳的小型炸弹。地雷只能够阻止坦克，但是“炸弹小子”则是用来炸死或炸伤人的。这是它

惟一的目的。

根据其制造商霍尼韦尔公司的介绍,它们有70%—80%的命中率,这有点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这是真的,你会想这可能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无论技术怎么差劲,要制造一种在20%—30%的情况下都投射不出去的炸弹简直是太难了。如果它真的发射失败,那么它将是一种很有效的杀伤性武器,因为后来肯定会有别人碰到它的,但这只是猜测。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地区可能分布着几亿个未引爆的炸弹,而具体数字根本没有人知道。

受害者大都是儿童和农民。事实上,有人曾经在老挝境内的一个省做了一次仔细的调查,发现有50%的受害者是儿童。小孩子在玩的时候,看到这些漂亮的東西,就会拣起来,然后他们和周围的人就会被炸死。农民们在耕地的时候也会引爆这些炸弹。我们并不是在谈历史,因为时至今日这样的爆炸事件还在不断发生。老挝政府估计,每年大约有2万人因此被炸伤,其中一半以上不治身亡。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则无人知晓。

《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由老牌亚洲记者巴里·韦恩(Barry Wain)写的文章,很不错。<sup>④</sup>韦恩报道了这个数字,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他说,这个数字可能高了,也可能低了,但绝不是天马行空的。这篇文章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版上,但他们从来不会把这样的文章刊登在美国版上。英国的媒体也对此做了报道,美国偶尔也有一些,我把所有能够找到的报道都收集了起来。所以这件事并不是无人知晓的。

第一个着手解决这件事的组织是门诺派人士\*。门诺派中央委员会(Mennonites Central Committee)自1977年开始就有志愿者在老挝工作,并一直都在做宣传,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向当地人提供铁锹等工具,但很难有什么高科技的装备。还有一个英国的地雷探测志愿小组,该小组由一些专家组成的,但却并不是英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些老挝人。英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人显然没有参与。

而且,根据右翼报纸《星期日电讯》的报道,英国的地雷清除小组称美国国防部甚至不愿向他们提供拆除炸弹的技术信息。<sup>④</sup> 这些信息可以确保在拆除过程中炸弹不爆炸,但是美国不愿提供。所以英国的地雷清除小组就处在危险之中。美国不仅不帮助清除这些炸弹,还不向那些辛苦工作的英国人提供如何安全操作的信息。现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美国开始训练一些老挝人掌握相关的技术。所有这一切正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个更近的例子。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特别是尼加拉瓜遭受“米奇飓风”的袭击时,泥石流把大约75 000颗地雷冲散了。在此之前,一直都在进行地雷的清除工作,但是现在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找到这些地雷,因为它们被冲到了其他的地方。这些地雷可不是从木星或是海王星上来的,那是我的家。我们都知道地雷是从哪里来的,

---

\* Mennonites, 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等。——译者

我们也知道谁没有参加清除地雷的工作。路透社有一篇报道说一个法国的地雷清除小组前去工作。但是据我所知,这篇报道只刊登在一家由贵格派(Quaker)人士主办的报纸上,<sup>⑤</sup>但也没有再做什么深入的报道。所以这也是个类似的例子。

老挝的情况则更为糟糕。那些并不是地雷。它们比地雷危险得多,而且更为密集。可能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像老挝这样有如此之多的未引爆炸弹了。在阿富汗也有许多的地雷。但苏联曾列出了埋地雷的详细地址,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但是美国的媒体对此却只字未提。

这是非常机密的信息。假设有人刚刚看到这个信息,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花费美国用于摧毁老挝的税收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清除所有未引爆的炸弹。所以第一步就需要做的就是——正像我们批评日本人没有做到的那样——承担责任。或许这将是开始。所以让我们克服这个奇怪的缺陷,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是美国民众有这个缺陷,而是美国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有此缺憾。他们能够发现这一点。如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不像学习量子物理学那么难,想要知道它根本不要花多少时间。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所处的位置让每个人都知道。

当《纽约时报》的编辑和其他的人都负起责任——他们谴责日本

不负责任——就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投入资源来阻止美国的暴行,停止屠杀老挝儿童。这不是什么大的举动,它不像轰炸,而且成本也比轰炸伊拉克或是苏丹要小得多,所以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自墨西哥经济崩溃后,更准确一点讲,自1997年7月泰铢急速下跌之后,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我们看到从泰国到俄罗斯到日本再到最近的巴西,市场都发生了动荡。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们必须先承认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或许是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现在称之为危机是因为它开始影响到那些富裕而且强大的国家的利益。所以在现在这就变成了一场危机。之前,它只是使一些人饿死,不是什么危机。但是现在即便是那些富有的投资者也受到了伤害,所以这是一场危机。

首要的一点是,没有人真正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常被称为“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年报。最近的一期年报声称:我们必须“低调”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sup>④</sup>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人们对于世界经济只有一个“模糊的了解”。<sup>⑤</sup>事实上,任何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只要他稍微诚实一点,他就会告诉你,我



们并不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有一些想法。所以关于此事的评论——当然是我说的——你可以添加许多东西,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

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清楚的,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发挥作用的那段时期——大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汇率比较固定,资金的流动也受到控制。所以没有什么大笔的资金流动。这种情况在70年代初被人为地改变了。资金可以自由流动,随后就出现了一些事件,可能是后果,也可能不是。低调的态度又出现了。随着资金的自由流动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等富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生产率大幅度降低。

福利国家也遭到了袭击。不公平的现象急剧上升。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近的调查数据表明,1月份,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出现停滞或是下降,而工作时间却有了相当程度的延长。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要保持实际收入不变,必须比二十年前多工作一年零一个月。在富裕国家中,美国的工作时间最长,贫穷人数最多,贫困儿童的人数最多,饥饿和其他一些问题也最严重。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富国,所以这些都是社会政策导致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

在贫穷国家,这一直是个灾难。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导致了十年的负增长。你会发现拉美国家的债务相当于整个资金流量,也就是说失去了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富裕的巴西人都把钱存在了纽约和瑞士的银行。这本身就是一场危机,但是因为富裕国家的人民

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没有人说这是危机。

在东南亚,短期的投机资金数额十分巨大,并在麻烦出现的第一时间撤出了东南亚。这是金融市场非常典型的现象。国际经济学论著普遍谈到,金融市场是恐慌的、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它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也根本无法预测。没有人知道它将如何运作。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金融市场便得到了快速发展。

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共识上来,人们普遍认为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是造成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韩国经济突然崩溃的主要原因。所以并非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失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背离了这个模式才招致了危机。这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论断,他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以这或许是正确的。

巴西的情况也差不多。巴西现在的问题是它们无法制止资本的外逃。资本疯狂地向国外流动,巴西政府不停地提高利率,试图阻止资本外逃。但投机商们打赌,政府根本不能把利率提得过高,也很难阻止资本的外逃。不错,是有某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资本流动不像水的流动,也不像潮汐。它是人为控制的。但是你必须决定阻止它。巴西自己是没有办法单独决定的。资本的控制必须是双方面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而资本流动仍受到双方面的控制。所以接受资本的国家都同意要阻止资本外逃。如果少数像美国这样的富国不想这么做,那么游戏就结束了。但是这些社会政策都是受到潜在的控制的。

二十五年来,一直有人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例如征收托宾税(Tobin tax)等,旨在减缓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但是商业界却表示反对。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想接受,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特别是金融资本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利润。所以他们看到经济发展的步伐放缓很高兴。他们当然欢迎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它使大量的财富流入富国。他们还不认为这是危机,因为他们仍然从中获益,而不是受损。现在是一场危机了。现在第一次人们普遍在谈论建立新的金融机制。人们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谈到要对完全非理性的金融市场进行某种形式的管制。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的信奉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在他的著作中,一直在提醒我们应如何理解要素经济学。他说,自由贸易对制造业有利,但对金融业是场灾难。金融市场并不像商品市场。你有很充足的理由相信他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等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做过研究。这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理论,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也似乎验证了这一点。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坚持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想要保护福利国家。他们知道如果你放开了资本的流动,它会成为控制社会消费的强大武器,这已经几乎成为一条真理。如果一个国家动用资金改善教育或卫生体制,或是从事其他一些在投资者看来是非理性行为的时候,它马上会受到资金外逃的惩罚。我们已经看到了,凯恩斯和其他人的理论是正确的。东亚和东南亚危机至少有部分背景、或许有一大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东亚和东南亚不同。俄罗斯走的虽是同样的路，但原因却不尽相同。在俄罗斯，我们必须问自己冷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俄罗斯正回到冷战前的状态，这就是所发生的事。美国胜利了，就像它在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危地马拉也获得胜利一样。只不过美俄之间的争斗更为激烈而已。现在俄罗斯已经基本回到 1917 年以前的状态，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三世界殖民地。这一切是在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事实上是热切的合作下促成的。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做第三世界的首领，要比孤身奋战好得多。所以他们壮大了自己。这就是市场经济。

人们都说这太可怕了，俄罗斯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它同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在落后的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他们就会成为这个样子。一方面是人口灾难、饥饿、巨大的财富、犯罪团伙遍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高高在上地、快乐地进行着监管，你还想要什么呢？

当然俄罗斯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而俄罗斯执行了这些政策。这对富人来说没有什么。他们的情况仍然良好，仍有许多人在开着豪华的劳斯莱斯和梅塞德斯轿车。

巴西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美国在 1998 年末安排了一个 410 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计划。美国是不是担心巴西的危机可能越过其南部边境蔓延到整个拉美，或许还会引起一场移民风暴？

我不认为巴西的移民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来的移民就是了。

是的。但是我依然不认为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想,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因为巴西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削减利润。国际经济体系是用透明胶带粘贴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做过一个研究,我不敢保证能记住所有的细节,但是自1980年到1995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大约180个成员国中有四分之一存在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时候,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金融危机。<sup>48</sup>这是很严重的现象。

对此有过一番争论。好像自实行自由化以来,金融市场就动荡不安、无法预测、毫不理性、并且很容易就发生危机。没有人知道市场什么时候就会崩溃。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我们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仿佛我们正处于经济萧条之中。<sup>49</sup>或许人们七拼八凑地也能看出个大概来,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也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

克鲁格曼排除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资本管制。他这么做是出于理论的原因。他说资本管制导致资源的无效率使用,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这在某种抽象的经济模式中的确如此,比如新古典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和真正的世界有什么关系我们暂且不说。现在有证据

表明他的做法不正确。当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时，经济就会有较大的增长。而取消资本管制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缓慢和我们所说的危机。或许这只是巧合，但或许并不是。

人们还会问，“有效使用资源”是什么意思？听起来这是个很妙的技术词汇，但是它不是。当你拆开来看时，它只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词汇。所以如果有效使用资源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会伤害所有人。如果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标准来考量的话，它是有效的，但是从其他的标准看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公共利益集团一、两年前曾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试图估计消费下降对维护高速公路的影响。<sup>⑤</sup>自里根时期以来，消费就大幅下降。由于不修缮高速公路就省下来一大笔钱。他们试图估计这个成本。我忘记了具体的数字，但是所耗费的成本是比省下来的钱要高得多。但是，这个成本只是对个人的成本。如果你的车撞到坑里，这是你的损失。而对于经济总体而言，这是个收益。它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因为如果你的车撞到坑里，你就会去修车厂找人来修，或者你会买辆新车，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东西被生产出来。

所以它从两个方面使经济效率得到了提高。每个人都知道政府拖垮了经济，所以你削减了政府机构就提高了经济效率。同时，你也增加了利润，促进了就业，提高了生产。当然对于你个人来说，这是个损失。但是根据衡量效率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对于经济的整体来说，这是个收益。这只是个很小的例子，但却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



所以当你听到“效率”这个词时,或许先不要急着去拿你的手枪,而至少要动一下脑筋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意识形态化的衡量标准。

巴西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Dom Helder Camara)曾说,“当我向穷人提供食物时,他们称我是圣人。当我问为什么他们这么贫穷时,他们说我是共产主义者。”<sup>⑤</sup>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但是两年前,我碰巧在累西腓(Recife,巴西东部沿海城市)遇见他,那是他的根基所在。他是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主要领袖。他改变了巴西和世界,特别是累西腓。教堂传统上是富人的教堂,而他把它变成了穷人的教堂。他派出牧师和修女到贫穷的地方工作,把教堂的修建工作交给教育和卫生机构来做。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累西腓曾经是解放神学的中心之一,后来却被暴力以及梵蒂冈的教皇摧毁了。

梵蒂冈强烈反对卡马拉。梵蒂冈没有枪炮,却有自己的力量。教皇有能力破坏解放神学,除掉进步的主教,替换上非常反动的人。结果累西腓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剩下。除了我这个年纪的一些人外,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解放神学被连根拔起。

---

\* 解放神学,一种基督教的神学运动。认为上帝的任务是把人类从社会和政治压迫下解救出来。——译者

过去几星期关于教皇对墨西哥的访问有许多评论。我也收集了这些报道。标准的报道是说解放神学已经绝迹了。现在出现了他们所说的“后解放神学”(post-liberation theology)。人们会问为什么解放神学绝迹了呢？因为解放神学是恐怖和压迫政权产生的原因。它蔓延到整个美洲大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恐怖主义，而这通常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那是段可怕的日子，对拉丁美洲来说是真正的梦魇。梵蒂冈发挥了它的作用。

它的象征意义就在于，萨尔瓦多新的大主教是右翼西班牙牧师，同时也是萨尔瓦多军队的准将。就是这支军队除了犯下其他罪行外，还杀害了大主教罗梅罗和耶稣会的几名知识分子。这是象征性的，他们都知道。新的“后解放神学”对精英们来说勉强可以接受。一些无关痛痒的报道会说，“后解放神学”请求富人对穷人好一点。这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新的看法是，你向富人传播福音，让他们有了社会良知，这样他们就会更多地帮助穷人。他们将会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神秘消失的解放神学的坏的一面就在于，它呼吁牧师们仿效卡马拉，组织穷人社区，这样他们就有可能组织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根据传统的道德观念，这是不对的。你至少是应该先请求统治者变成一个善人的。

如果你想要另一个例子，就看看今天《纽约时报》上关于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文章。它谈到为什么富人必须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sup>⑤</sup>这不是说穷人就应该组织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也不是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让人们可以组织起来，自己掌权来

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这些富人确实应该更仁慈一点。无产者可能会摆脱富人的控制。这就是“后解放神学”的观点，或者至少媒体是这样来描述的。

事实上，如果你看了教皇的声明，你就会发现一切并非如此。像往常一样，教皇在1月1日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关于此事的。但媒体对此却鲜有报道。《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报道，但没有对演讲的内容做出评论。《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只有最后一句暗示了一下演讲的内容。<sup>③</sup>但是教皇的演讲十分有趣。他描述了今天人们犯下的主要罪行，如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物质主义的消费观也是一项大罪。他不仅请求富人要更加仁慈，而且还说国家和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但最后这一点后来却悄然消失了。然而这正是解放神学所主张的观点，也是梵蒂冈竭力试图扼杀的观点，而美国则真正扼杀了上述这些观点。卡马拉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被杀死，但是他所追求的事业却被扼杀了。

教皇还说，“人类正面临着新型的奴隶制，它比以前的奴隶制更隐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藻。”您在南非开普顿大学也曾说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sup>④</sup>

我同意教皇的看法。但对于我来说，1月1日演讲的重要部分是我以前引用过的一句话，就是国家和人民正在丧失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他们正在丧失真正的解放神学试图创造的东西。教皇也

谈到了这一点，因为市场机制，人们正在丧失这一切。这是真的。但是人们之所以丧失他们的权利，还因为暴力和梵蒂冈的干涉。这也是真的。而且主要是直接的暴力。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和教会作战的。这是中美洲暴行的主题。在巴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巴西，教会也并没有绝迹。对此我不想夸大其词。在我所参加的全国主教会议(National Bishops Conference)上，还有一些激进派的主教在发挥着影响。在巴西爆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群众运动——据我所知，这些运动的意义在全球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例如“无土地工人运动”(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这是非常重要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它受到了教会的支持，就像原住民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所以教会并没有被消灭。但是如果你去了累西腓，看到了卡马拉的遗产，你就会觉得很伤心。

我注意到您公众演讲的技巧中至少有一条发生了变化。在我刚才提到的您在剑桥的演讲中，听众中有人让您参加到“摧毁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在过去，您通常都会做一个详细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但是这次，您的处理方法却有所不同。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很有建设性，也很热闹。参加会议的人被分成了小组。但仍然有一些宗派主义的左翼人士，他们多年来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坏群众运动。有人说，我必须站起来组织工人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其他的方法都没有效果了。我想，当时我说了类似于下面

的话：我同意。我认为让工人阶级来摧毁资本主义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显然演讲的会场可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你应该去最近的工厂——我很愿意帮你支付路费。这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战略，而是已经被提出来很长时间了。

用幽默来驳斥这样的言论，有时会很有效。

这不是故意的，而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

但那个家伙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或许这样确实有用。



# 第三章

## 因为国家的缘故

1999年2月2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在您的文章中，您很少谈到文学方面的东西。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在《必要的幻象》(*Necessary Illusions*)一书中，您援引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法庭的庭长”这一章节。<sup>①</sup>陀斯妥耶夫斯基著作中的哪些内容引起了您的注意呢？

那一章节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所谈论的是如何制造共识。这一章生动而准确地表现了神秘感、宗教礼仪、恐惧，甚至快乐是如何被操纵的，以致让人感到他们必须服从于他人。它谴责了上帝，因为上帝试图使人们摆脱这些限制而获得自由。上帝不知道那恰恰是人们所需要的，他们需要服从于神秘感、魔法和统治。所以上帝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这就是这一章节所要阐明的主题。



正如过去所发生的一样，教会必须纠正上帝的错误行为。您认为国家也是如此。

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而言，这只是意味着权力。请不要忘记，他是在俄罗斯完成这部作品的。因此，它是教会和沙皇两种权力的结合，而这两者之间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您在文章中说，“宗教法庭庭长的诡辩水平几乎无人能及。”

宗教法庭庭长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那就是自由是危险的，人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希望）顺从、神秘感、权威等等。那就是制造共识的诡辩说法。

我偶然读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句话，也许与制造共识不无联系。他说，“当马戏团驯兽师挥动鞭子时，狗就会跳起来，但是真正训练有素的狗不需要鞭子就会翻筋斗的。”<sup>②</sup>

我怀疑他说的是知识分子。一般认为，知识分子阶层因受到良好培养和教化而无需鞭子的驱赶。他们只是本能地为外在的权势利益服务，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他们正在诚实地、忘我地工作。他们才是真正训练有素的狗。我可以肯定，如果你回过头去再仔细阅读一下奥威尔的作品，他所说的应该大致是这个意思。

在您的作品中,是否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方面的例子?

是有一些,有一个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伊尼亚齐奥·西洛内\*的小说《方特马拉》(*Fontamara*)中的一段文字。<sup>③</sup>处于世界最顶端的是当地的地主,接下来就是他家的狗,狗下面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再接下来还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最底层的就是农民。我最早读到的是意大利文的原版,当我后来读到英译本的时候,却发现被错译,因此我就只好自己动手翻译了。

让我们谈谈战争罪和战犯吧。就从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开始说起。您认为他是否应因战争罪而被移送某种形式的国际法庭或是被送交西班牙法庭接受审判?

他应该接受审判。但在智利却是不可能的,尽管审判本应在那里举行,因为在智利军事力量仍然牢牢掌控着一切。你只要踏上智利的国土就会立刻感受到这一点。“人权观察”组织曾描述过在智利存在的那种纸糊的民主,它徒有民主的外表,却没有言论的自由。<sup>④</sup>所以,在智利审判皮诺切特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其他地方才有可能。作为国际法庭,西班牙法庭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染指之下,相当多的拉丁美

---

\* Ignazio Silone,意大利作家——译者

洲国家,包括部分左翼拉美国家,都出现了倒退。比如,他们所追随的是皮诺切特,而不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事实上,如果你追随的是基辛格,智利的罪恶就会变成最小的了。关键在于,尽管具有完备的司法体系,从而使弱者以及那些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顺从于这种体系,但它对强者却并无制约作用。当然,对于不平等的司法体系,我们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说不要司法,而是要使之变得更为平等。

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战争罪审判是怎样的呢?

就在数周以前,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接受了以战争罪审判红色高棉的建议,但是直至1977年,他本人也一直具有红色高棉背景。既然这是对以往罪恶的审判,那也就意味着他本人也将面临着这一审判。从时间跨度上讲,就是从1969年开始直至红色高棉垮台,也就是说,有整整十年之久。有一份名为《柬埔寨:种族屠杀的十年》(*Kampuchea: Decade of Genocide*)——如果你想使用种族屠杀这个字眼的话——的政府独立调查报告,便将从1969至1979年的十年时间称为“种族屠杀的十年”。<sup>⑤</sup>(但是)前六年的种族屠杀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的,这并非空穴来风的玩笑。

就在不久以前,一位在金边的朋友送给我一份柬埔寨新闻界关于弗朗索瓦·蓬绍德(Francois Ponchaud)的报道。这位法国牧师曾在柬埔寨传教多年,并写了一本反映红色高棉所犯暴行的书,这也是最早反映这种暴行的几本著作之一。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以战争罪审

判红色高棉时,他认为这对红色高棉来说是罪有应得,但是对于战争罪的追查也应该包括美国人。<sup>⑥</sup>所以,是的,公正的审判应该追究那些犯过罪行的人。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曾对柬埔寨广袤的、毫无防卫能力的农村地区进行过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而当初直接指挥这一轰炸行动的人也理应受到追查。

我们对这一事件知之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一百余万难民被赶进了金边,但是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景象如何却很少被报道。其原因在于,媒体根本就不会去采访那些难民。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埃德·赫尔曼和我仔细查阅了美军轰炸高峰期间《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sup>⑦</sup>悉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曾定期对柬埔寨问题进行过报道,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也对此有过不定期的报道。后来有人曾在泰国边境地区做过大量的采访,从这些报道中你就能发现红色高棉的罪恶。到泰国边境走走,在丛林中随意漫游,随后写出关于红色高棉所犯罪行的报告,这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你不得不从你下榻的酒店出发,穿过街区去寻找美国所犯罪行的罪证时,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存在。电影《杀戮场》(*Killing Fields*)便是以美军对一个山村的轰炸拉开序幕的,随后电影讲述了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恐怖事件。媒体也曾对这一事件有所报道。这被视为是美军发生误炸的偶发事件。所以,你可以将其界定为一种失误。但是,他们还轰炸了大量“正确”的村庄,造成了无人知晓的伤亡(也许是数十人,也许是成千上万),导致了人数多达上百万的难民潮,这又如何解释

呢？所以说，那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是柬埔寨少数几个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经指出波尔布特强行将居民撤出金边是一大暴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与此同时，他却认为通过猛烈轰炸又将那些人赶回金边不能被称作暴行。<sup>⑧</sup>这着实引人深思。

1999年1月份的《纽约时报》曾对此做过较多的报道。在两名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自首后，塞斯·迈登斯(Seth Mydans)围绕柬埔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他的这些报道中，迈登斯显然漏掉了一些重要信息。<sup>⑨</sup>

你得提示我一下。他们总是漏掉一些相同的信息，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也不会例外。

报道截止于1979年。

也许是从1975年开始的。1975年以前就曾发生了一些事情，1979年之后也是一样。1975年之前，事实上自1969年初，美国就轰炸了柬埔寨，并支持一场持续到1975年4月的残酷战争。我们也许对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那段时期还有印象。根据当时在金边的西方医务人员估计，在这场战争中，单是这座城市每年的死亡人数就达到十万人。这只是在金边，而那些乡村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根本无人

知晓。

一位美国高层官员(也许是基辛格,尽管这个人是谁一直未能得到确认)估计,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就轰炸的效果而言,应有一百万人死亡。到了1979年,美国和英国实际上又重新支持被越南人赶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公开支持。

1982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一位国务院官员被问及为什么美国支持所谓的“民主柬埔寨”,也就是红色高棉,而不是抵抗组织“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他的回答似乎是:毫无疑问,“民主柬埔寨”,也就是波尔布特集团(Pol Pot group)更能代表柬埔寨人民,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却不能代表东帝汶人民。他同时也提到与波尔布特政权关系的“连续性”问题,<sup>⑩</sup>因此我们也应该继续支持“民主柬埔寨”。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正在支持非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但这一理由如此牵强,以至于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新闻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特意搜集了许多信息,特别是英国对红色高棉的直接支持。<sup>⑪</sup>美国对他们的支持是通过中国和泰国,以外交手段来进行的。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些在1979年后被遗漏的信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红色高棉自泰国的基地和柬埔寨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而这正是柬埔寨至今依然面临的大部分问题的主要诱因。

肯·西尔弗斯坦(Ken Silverstein)和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在他们的新闻通讯——《反击》(*Counter Punch*)中写道,美



泰两国曾在柬泰边境组织发起一个名为“80 特遣队”(Task Force 80)的联合行动。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武装被击溃的红色高棉”并唤醒他们对前途的期望。<sup>⑫</sup>

确有此事,尽管我并不知道此次行动名为“80 特遣队”。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 1979 年以来,通过提供粮食援助、难民援助(据说如此)、军事训练以及外交支持等手段,美国一直在致力于实现上述目的。他们坚决支持红色高棉在联合国继续持有合法席位。上述许多行为都曾被公开曝光过。在这方面,皮尔格也许比其他任何人做的都要多。

让我们谈谈以色列及其被《时代》杂志称之为“内部冲突”的事件。这是一个关于谁是真正犹太人的问题。它产生的根源也许是因为正统派拉比们垄断了宗教和其他诸如婚丧嫁娶的社会礼仪。今天出版的《时代》杂志报道,有一群美籍改革派拉比在哭墙前祈祷时,受到正统犹太高等学校学生的唏嘘和嘲弄,并要他们“滚回德国”,好被赶尽杀绝。<sup>⑬</sup>有一个学生后来证实了这件事情。以色列现在情况如何?

那是一个十分狂热且人数众多的原教旨主义者团体。现在的一切植根于以色列建国之初的一项协定。那时的领导阶层,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其他领导者,都是世俗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姑且不论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他们

与信奉犹太教的人们达成一项交易。那就是后者将被赋予一定的管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

这些犹太教信徒中的许多人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在弥赛亚\* 降临人世之前,人们不应该去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他们还是很乐意接受政府的馈赠,包括政府对正统派犹太教学校的进行高额投入、对许多社会生活事务的管理——例如婚丧嫁娶。而作为回报,他们将忠实地服务于这个国家(事实上,他们也并不十分忠实,例如他们通常不会从军服役),并获得优厚的报酬。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是正统派势力之所以能够控制大量社会生活事务的原因。这其中充满了苦难和愤怒,社会也因此而形成了现实而尖锐的分裂。有大量的出版物揭露了正统派势力是如何在保持对他人的控制的同时,为了一己之私而榨取钱财。他们现在是游离于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不确定的选票集团,任何一个党派——工党或利库德集团——都会给他们大量的好处以便吸引他们加盟,而他们却玩世不恭地游走在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数据,但有一种情况是,宗教学校的开支要远远高于世俗学校,他们还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多其他的收益。当然,他们也会尽其所能地敲竹杠,以谋取好处。

尽管犹太教拉比们的观点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些拉比的想法

---

\* Messiah, 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译者

却相当奇怪。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美籍犹太人——主要为犹太教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教徒——甚至比邪恶透顶的基督教徒还要坏。他们是叛徒,他们假装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奉正统派的教规,这比冥顽不化的基督教徒更可恶。如果你去了解一下东欧或北非地区的传统犹太文化,你就会明白,作为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他们是低犹太人一等的族群。比如,除非犹太人能得到好处,否则犹太医生就不会给非犹太人治病。迈蒙尼德\*之所以能成为国王苏丹的御用医生,就是因为犹太人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否则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这是一种教规还是一种文化传统?

犹太法典《哈拉卡》\*\*曾对此有所规定,同时这也是犹太教徒的传统。有很多东西就像这个样子,他们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又是种族主义者。当他们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便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

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您所称的那些大多数属于犹太教保守派和革新派的美籍犹太人有何反应呢?

---

\* Maimonides(1135 - 1204),西班牙裔犹太哲学家和医生。——译者

\*\* *Halakah*,犹太教中口述的不载于《圣经》的律法。——译者

当然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以色列很久以来一直位列其中,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是这样——你不能出版犹太祈祷书,也就是现在大多数犹太人所用的那些祈祷书;而属于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美籍犹太教徒们也不能结婚、离婚和进行宗教皈依。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但是反对的声浪还是非常大。反对者威胁说,除非以色列承认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群体所应拥有的权益,否则所谓的“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将会大打折扣。那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斗争,而现在它变得更加尖锐了,它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正统派教徒和保守派犹太人之间。今天有报道称,当妇女在哭墙前祈祷时,正统派教徒会认为那是件非常可恶的事情。<sup>⑭</sup>

在以色列的大城小镇,都设有宗教议事会。这些议事会由于掌管着民间事务而拥有许多的权力。在是否让妇女参加进来的这个问题上,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最近,有过一件也许是多件允许妇女与会的事例,但这是激烈斗争的结果。现在的正统派教徒的人数比较庞大。他们和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都要远高于世俗犹太人,而后者则像欧洲人一样,倾向于少生孩子。人口统计学的预测结果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巴勒斯坦人、正统派犹太人和原教旨主义正统派犹太人,将会拥有更高的人口比率,而这些犹太人却并不参加社会工作,他们受狂热的犹太教拉比控制,终生致力于研习《塔木德经》\*。

---

\* *Talmud*,关于犹太人宗教、生活、道德的口传律法集,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者

巴基斯坦人伊克巴·艾哈迈德(Eqbal Ahmad)曾指出,那些建立在宗教和种族基础之上,并把它作为故国家园的国家,如以色列和作为印度穆斯林故土的巴基斯坦,是很容易产生这类派系分裂的。<sup>⑮</sup>

如果是在1948年的话,我想你不会做出这种预言。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当时宗教因素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自从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北非的移民涌入之后,宗教因素才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新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那些被称为阿拉伯犹太人或东方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受到了非常恶劣的对待。我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参加那些从政权中分离出来的宗教团体的部分原因。他们因为痛苦而非常愤恨,这种愤恨在70年代后期终于公开地爆发了,他们选举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为以色列总理,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尽管贝京是波兰人,但他们宁愿把他看作是摩洛哥人,实在是非无原因的。

近似于封建社会的摩洛哥与贝京的出生地——东欧的波兰——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摩洛哥,也有一部分现代的西方化的犹太人,但他们大多数都去了法国。据许多摩洛哥犹太人声称,那些到法国的摩洛哥犹太人都从事诸如医生之类的职业,而那些到以色列的人却成了建筑工人,其中的辛酸苦难自不待言。

1999年1月中旬,美联社有一则报道。由于外界批评以色列安全部门在审讯巴勒斯坦人时滥施酷刑和暴力,作为回应,一位名叫耶

胡达·谢弗(Yehuda Schaeffer)的官方律师说道,“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的方面一样,我们依然是指引通往国家之路的明灯,”那是一个流行百年之久的乌托邦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口号。<sup>⑩</sup>

这在以色列国内都算得上是一个丑闻。事实上,依照国际标准,以色列人的确实实施了酷刑,为此他们也经常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而且他们屡屡如此行事。那些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却遭到拘押的阿拉伯犯人就经常受到严刑逼供。你可以从“人权观察”组织、“大赦国际”以及以色列的人权组织 B' T selem 所撰写的报告中了解到这些情况。

大约十年以前,这一问题被曝光。一个叫德鲁兹(Druze)的人被判有罪,而最后的结果却证明他是无辜的,他根本没有犯过那曾经证据确凿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的罪行。人们不禁马上要问,他怎么会供认的呢?事实证明是因为他受到了严刑拷打。多少年以来,巴勒斯坦的犯人声称,他们招供是因为受到了严刑拷打。对于此类指控,各级法院,一直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地予以驳回。它们只是把这当作子虚乌有的谎言驳回了事。

德鲁兹案件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至少这个案子的招供是严刑拷打的结果。他们随后就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在审讯过程中以色列安全部门经常使用酷刑。这被视为一个大丑闻,并不仅仅是他们使用了酷刑,而且是因为情报部门从没将这种事情通告给法院。这也算得上是一件类似于水门事件的丑闻了。不仅轰炸柬埔寨是一种犯罪,而不报告国会也同样是犯罪,而且是真正的犯罪。



这里也是一样，最高法院指责情报部门误导了他们，但这却是一种纯粹的笑话。除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其他任何人都知道那些招供全是严刑拷打的结果。作为最高法院法官之一的摩西·埃奇奥尼(Moshe Etzioni)，1977年前后曾在伦敦呆过。他在接受“大赦国际”的采访时，曾被问到以色列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招供率。每个人都知道这话里的意思，可他却说，阿拉伯人很容易招供的，“这是他们本性的一部分。”<sup>①7</sup>

毫无疑问，以色列滥用过酷刑。但是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不管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决意相信情报部门的结论。所以，他们声称自己被误导本身就是误导他人的一种说法。事实上，是他们宁愿选择被误导。

为此，以色列成立了“兰多委员会”(Landau Commission)。该委员会召开了一些秘密会议，针对酷刑的使用提出了半公开、半保密的建议。他们不把它叫做“酷刑”，而是称为“武力”或“压力”，或其他一些委婉的说法。这些建议指出：你不能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手法，但也存在着例外情况——它随后出台了一个秘密会议备忘录，规定了你能够使用哪些手段。没有人知道这份备忘录到底做出了什么规定。但从那些发生在犯人身上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那些手段具体指的是什么。

要对此进行研究有一些很好的方法。你可以从那些彼此并不相识，却曾在同一个地方呆过的犯人身上获取独立证词，看他们描述的事情是不是相同。人权组织运用这种方法已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

也许,对以色列使用酷刑的调查要比对其他国家的调查更为系统和仔细。其原因在于,在调查过程中,你不得不制定更高的标准。如果你在巴基斯坦讨论酷刑,你就不必如此。如果某个犯人告诉你他受到了刑讯逼供,那好,这马上就可以成为头条新闻。而如果在以色列做这种事情,你就不得不达到物理学上的标准才行。因此,当“瑞士人权联盟”(Swiss League of Human Rights)、“大赦国际”、或《星期日报》的伦敦调查小组(London Insight team)在以色列进行酷刑调查时,他们就得极度小心谨慎。但是,他们至今仍不能在美国报道他们的调查结果。

这一事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也许可以顺便提一下,我记得有一些像这样的事情,媒体上报道了以色列共和国否认某事的声明,但却找不到有关的原始报道。正是由于那种原因,在近乎荒谬的高标准要求下,他们的调查工作就要特别小心仔细了。自“兰多委员会”通过特殊的方式提出上述报告之后,严刑逼供还是经常发生并从未间断过。人权团体也基本上都承认酷刑依然普遍存在,而且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也对此做过相关报道。

你谈到的这桩后来闹到最高法院的审讯案子,后来不得不作为有关酷刑问题的案子来处理。最高法院可以查看“兰多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备忘录,并不得不对其中所规定的逼供手段的合法性做出裁决。这就是各方争论的焦点所在。在此情势下,那位官方律师才说出了你刚才所引用的那番话,而应该指出的是,这在以色列也被认为是一种丑闻。

当您对以色列及其使用酷刑和滥用暴力提出批评时，往往会有人反问：好呀，那叙利亚又如何呢？您为何不谈谈利比亚和伊拉克呢？那里的情况难道不更糟吗？您对此有何看法？

当然，我刚才就提到过巴基斯坦。那些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对此我并无异议。我并不是真正地要提出批评，我只是在引用国际人权组织和“大赦国际”的话，他们的这些评论都是相当保守的。我与他们所持观点相同，那就是我们应继续阐明美国的法律，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向有组织地使用酷刑的国家提供援助。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向伊拉克提供援助。实际上，当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这样做时，我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向叙利亚和以色列提供援助。

当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上，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你看看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象名单——正如我过去屡屡指出的，也正如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组织所说的那样——所有排在前几名的受援国都有组织地滥用酷刑，如以色列、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那些援助都是非法的。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仅仅支持国外使用酷刑，即使在美国内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对我们而言，其意义就更加非同小可了。例如，不久前“大赦国际”曾专门就此发表过一份长篇报告。<sup>⑮</sup>

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人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基于以往经验的猜测。那就是某个巴勒斯坦政治实体不久将成立一个国家，这将是

一种简化的“班图斯坦式”的国家(Bantustan-like State)。那么,对该地区的长远和平与稳定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

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将怎样发展变化? 这是些很难预料的事情。美以计划,也就是以色列工党,我指的是鸽派,是要确立一种南非式的解决方案。对此我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详细的论述。<sup>⑨</sup>自1971年以来,作为基辛格为人类福祉所做出的“贡献”之一,美国因反对两件事而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即以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和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权利。

海湾战争的成就之一就是美国能够强行通过自己的反对计划,首先是在马德里会议上,随后是在奥斯陆协议中。因为它是由美国在幕后推动的,所以这在美国就被称为“和平进程”,和平进程就是这样出笼的。它基于两项基本原则——自70年代以来美国便坚持这两项原则并使自己事实上处于国际孤立状态——第一个原则是以色列不会撤回到1967年6月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巴以边界。美国和以色列决定,撤军只是部分地进行。这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对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理解都背道而驰,而事实上,在1971年基辛格接管巴以和解计划之前,美国本身也认为以色列应当完全撤离被占领土;而第二个原则是不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权利。

直到最近,以色列的鸽派领导人,如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依然坚决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那是非常愚蠢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以色列没有理由效仿奉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当局建

立“(巴勒斯坦)定居区”,尽管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些南非的“黑人定居区”,也就是“班图斯坦”建立后,它们被称为国家。特兰斯凯(Transkei)就是其中第一个国家。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但它依然是一个国家,南非甚至为那些班图斯坦提供了财政补贴。

我最近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曾在占领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讲,当时我引用了南非标准历史教科书上一段有关班图斯坦的话。<sup>②</sup>对此,你没有必要去发表更多的评论,大凡睁着眼睛的人都能把事情看得明明白白。很多人,包括大多数鸽派人物,却不愿意去看。但如果你留意一下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会知道教科书的记载是属实的。因此,对以色列而言,接受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种族主义是很可笑的,但我认为他们迟早会把那些东西称为国家。

利库德集团信息部长大卫·巴-伊兰(David Bar-Illan)曾写道: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便将之称做什么,甚至称之为“炸鸡”也可以。或者他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国家。对此我们并不在意。<sup>③</sup>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不管他们将之称为炸鸡也好,还是国家也好,只要我们能够占有资源、可利用的土地和水源,并确保那些零散的地区是由我们所控制的残暴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治理,叫什么名称都无所谓。实际上,中央情报局现在也公开插手控制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这样倒好,只要乐意,他们就能称自己为炸鸡或是国家了。那都是有可能的,甚至西蒙·佩雷斯也转变了立场。这位主张实现阿以和平的政治家最后终于决定,他们可以把它称为国家了。

长远的可能性是什么呢？这取决于很多因素。特兰斯凯的长远可能性又如何呢？如果美国首倡建立班图斯坦保留地，并对此予以坚决支持的话，那么对于班图斯坦的存在而言，其远景会是一片光明。当然，对于大多数保留地居民而言却并非如此。而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倡导建立班图斯坦。美国确实接受了它们的存在，但却并没有给予强力的支持。南非的抵抗运动组织基本上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它们。看看抵抗运动的历史，的确有人曾提到过它们，但并不会认真地去讨论它们。他们希望解放南非的黑人，而并不是为了替特兰斯凯争取更多一点的补贴。两者相比，后者的确算不上是个问题。

但是在巴以问题上，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班图斯坦保留地是由美国倡导的，它是二十五年来美国孤立主义立场的产物。如果美国对此表示支持，那么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会支持它。美国在世界上是个大男孩，在这个地区尤其如此，而对巴勒斯坦国而言自然更是如此了。如果它的建立是受以色列严格控制并由其内部的足够强有力的人物治理的话，美国不仅会支持它，还有可能会给予其直接援助和帮助，欧洲国家也会如此。这样也许能控制住巴勒斯坦人民。但对此我们无法预知，毕竟世事难料嘛。

随着(奥斯陆)协议被付诸实施，在巴勒斯坦确实出现了很多反对的迹象。

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一份由以色列某团体进行的关于巴勒斯坦



人态度的民意测验。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关于是否支持以暴力反对以色列。这一项的支持率升高了,最新民意测验表明,它超过了50%,而且还在稳步升高。这就是事情的结果。

自《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实施以来,那些地区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质量更是大幅下滑。而且,已具有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特征。在加沙,大部分人的饮食问题都遇到了困难。更糟糕的是,他们却能眼睁睁地看到巴勒斯坦当局那帮恶棍建造的、可饱览海景的豪华别墅群。

最后签订的《怀伊协议》(*Wye accords*)非同一般。在国际条约史中,它也许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号召人们侵犯人权。该协议中有一个条款规定:为确保协议的顺利实施,巴勒斯坦当局可以对人民的反抗行为予以压制。这实在是太露骨了。

没有人会去质疑这种压制到底指的是什么。实际上,它非常残酷:其中包括酷刑、谋杀和未经审判的监禁等等。那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顾问的监督之下,巴勒斯坦当局要做的事情。当然,《怀伊协议》中并没有出现这些字眼,但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他们需要的就是那种统治。以色列现在声称巴勒斯坦没有切实履行它的义务,并以此作为其推迟谈判的借口。

没人知道《怀伊协议》到底能否发挥作用?需要再次提到的是,只要以色列当局略有头脑,它就的确应该接受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行为模式。南非当局对班图斯坦给予资助,但以色列却不会,以色列几乎从未向被占领土提供任何支持。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占领下,还

存在着一个丑闻,那就是以色列乐于让欧洲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巨额资金,而这些资金大多都进了阿拉法特及其朋友的腰包,并被存放在以色列银行里。他们乐得这样,而随后他们又以此为依据来指责巴勒斯坦当局的腐败和野蛮,但是他们却从来都不愿为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多年来,甚至在《奥斯陆协议》达成之前,以色列实业家们就指出上述行为极为愚蠢。以色列应该建立一些企业,其性质类似于墨西哥那样的来料加工厂,或类似于南非在班图斯坦周边所设立的那种工厂。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你就可以得到能在恶劣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超级廉价劳动力,而且不用担心作业标准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这样,巴勒斯坦人就不必到以色列干苦活了,那种活他们在当地就可以做,而我们同样会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通过建立类似于来料加工的企业,我们还能够控制出口。这样做就有意义多了。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当局的种族主义观念如此强烈,以至于根本无法接受上述建议。但是,如果他们转向标准的殖民地模式——就像美国在中美洲或南非在班图斯坦那样——如果他们将自己提升到那种程度的话,他们就会允许那些地区的这种依附式发展,就像海地、墨西哥北部或萨尔瓦多那样。

对于那个古老的复国主义梦想,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以两个民族并存的联邦制国家,您是否发现了一些端倪?当然,我知道您是赞同后者的。

最后又绕回到了过去,这的确很有意思。当我三十年前写到建立那种联邦制国家时,我几乎被文明世界给开除了。当时,以色列最鸽派的左翼杂志《新瞭望》上刊登了我对此看法的谈话。<sup>22</sup>但我的观点受到了辛辣的攻击。怎么会有人胆敢提出这样的主张?一些以色列的知识分子代表,也就是那些知名的鸽派人物,纷纷到我的住处对我进行公开指责。

在美国,你甚至更不能谈到它。现在倒是能听到一点这方面的声音。梅伦·本维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在以色列人的圈子中口碑不错,他在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了类似的建议。<sup>23</sup>他对此的态度有多认真我无从知晓,但他确实是谈到了类似提议,在以色列的一些学术杂志上你也可以看到有关的内容。的确有人提出了此类建议。在此我要再重申一遍,没有人知道提出这些观点的人的态度是否十分认真。支持者依然为数甚少。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要远为热烈。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是以色列的一位阿拉伯裔哲学家,现为以色列国会议员,他就曾公开发表或谈论过这一问题。<sup>24</sup>比沙拉的文章刊登在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上——该报在以色列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尽管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毕竟还是得到了刊载。他的基本观点为——我认为他是对的——根本没有必要去为建立两个国家而争斗。那种想法早已是日薄西山,陈旧过时了。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以色列自身内部的人民生活和人权问题——因为在许多主要方面,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并不存在这些问题——然后是解

决在整个地区内存在的上述问题。其最终结局就是：建立起一个某种形态的世俗的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个双民族国家，抑或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就在最近，《纽约时报杂志》甚至发表了爱德华·赛伊德(Edward Said)就此问题撰写的专题文章。<sup>⑤</sup>

让我们转而谈谈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1935年，为了应付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之一，也就是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它曾经是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政府计划之一。然而时至今日，媒体认为该体系已然破产。我们不得不对之进行修补。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谈到过克林顿的“拯救社会保障”的计划。皮特·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世界新闻》节目中也讨论过总统那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sup>⑥</sup>总之，这个体系破产了吗？它需要进行修补吗？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首先要问的是：人们是怎么想到要谈论这个问题的呢？就在几年以前，它还被称为美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rail)。你不能谈论这个话题。该计划深受民众欢迎，而且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尽管其自身存在着许多缺陷，但即便是那些试图取消一切社会保障计划的里根主义者(Reaganites)都不敢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最近几年来，意识形态体系倒是允许人们可以提出参考性意见了。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拯救它？这是

媒体宣传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认为该计划的确处境危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但是争论的焦点则在于:既然它已破产,你又当如何予以修补呢?在短短几年之中,人们对该计划的看法发生了如此根本的转变,这的确是媒体宣传的一个辉煌胜利。我们不应低估宣传的作用,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事实就是存在着—批社会保障基金的受托管理人,并由他们来提出设计规划。而这些规划的适用时效为七十五年。首先,这实在是十分荒谬可笑。当经济学家们预测下一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时,他们就像在向圆靶上投飞镖—样。《华尔街日报》每年都要采访—些资深财经分析专家,让他们预测—年的经济走势,然后做—些猜测,但这就像是向圆靶投飞镖—样具有随机性,而通常这些专家都会预测未来经济走势将比较良好。这并不是说华尔街的这些经济专家太愚笨,而是因为许多事情的确很难预测。预测从现在开始两年后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要预测四十年后的情况,那简直是在开玩笑。

但是,有些事情本身已是相当明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者已做了预测,而现在他们的预测已经被当作既定事实而接受,就像预测太阳每天何时会升起—样(他们有一些预测的确与事实相符):即2013年将会发生某某灾祸,财政盈余也将不复存在,而在2032年他们将只能支付工人应得保障金的75%。

这些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依据是管理者们预测这个时期的经济将会以1.7%的速度增长。尽管这听上去—定的可信度,但

除去 20 世纪 30 年代或其他偶发性的经济萧条之外,这一增长率却低于有史以来的所有其他时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便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要低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增长水平——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 1.7%。因此,他们预测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甚至不如 70 年代至 90 年代低增长时期。这尽管听起来比较可信,但却并不存在做出这一预测的实际依据。

同时,他们声称我们只好把钱投入股市,因为股市现在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在这一点上,这不仅是一个荒谬的预测问题,更是不折不扣的自相矛盾。股票市场不可能脱离宏观经济的总体走势而长期维持良好的上涨势头。在短期内股市也许会表现良好,但长期来看,它多多少少要追随总体经济发展的轨迹。这是股市的必然规律。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的确会发生空前的经济衰退的话,股票市场也必将随之急剧下滑。这两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这并非是一种十分偏激的批评。你可以在《商业周刊》中读到相同的看法,很多学者也曾一次又一次地指出这一点。首先,你很难以长时段的数据变量为基础做出令人信服的预测,而上述的预测则是建立在一些非常奇怪的假设基础上,这是相当可笑的。实际上,如果你把那些假设稍做改变,并预测经济滑坡的幅度将略有减弱,那么所有的规划方案也将随之改变。

因此,那种认为危机即将来临的看法是极其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纯属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你就不会接受



其他观念了，这倒很像是将一大笔存款投到股票市场中去一样。

几年以前，有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至少这是一个更为敏锐的观点。弗兰克·阿克曼(Frank Ackerman)是一位激进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社会保障问题出现之前，他就在《我们财富的危险》(*Hazardous to Our Wealth*)一书中——该书由绍森德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指出：所有这些看法都是荒谬的。<sup>⑦</sup>问题的根源据说是由于婴儿潮所导致的人口的大量增长，而到了2012年，他们都要面临退休。届时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阿克曼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他指出：是的，2012年后退休工人的数量的确会增多，但是经济的发展已足以应付这个问题。当这些人还是儿童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得到照顾。当你6岁大的时候，你并没有工作，也没有薪金报酬。如果经济发展能应付这些人的儿童时期的生活问题的话，那也就应该能够应付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

实际上，尽管经济增长率异常低缓，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总量却十分富足。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目前的经济状况要远为富足。到了2012年，即便你相信(社会保障体系)受托管理者那荒谬的预测，美国的经济还将变得更为富足。因此，如果经济上能够应付这些人在婴儿期时的生活，也就一定能应付他们退休时的生活。

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权威人士声称社会保障体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口统计数据一直显示,我们将面临一种被称作“赡养比率”(dependency ratio)的危机。这个比率指的是年龄在20岁以上的就业劳动者占20岁以上总人口的比例。的确,这一比例将会下降。这也就意味着:2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退休人口越多,赡养比率的问题就会变得越严峻。

然而,如果你看看另一组数据——“总赡养比率”(total dependency ratio),也就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实并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无论做何种预测,它都要比1960至1975年间的情况要好。你尽可以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进行预测,比如说到21世纪中叶吧,总赡养比率也要比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情况要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要知道那段时间可是生育的高峰期。所以,如果以现实的态度来进行人口统计预测的话,就不会显示说危机即将来临。

当然,这里有一个如何计算的问题。也就是你该如何把抚养孩子的资金转换成赡养老人的资金呢?但这只是一个如何进行计算的问题,而经济本身的发展状况则不存在问题。阿克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你需要花钱去抚养;当他们年老之后,你则需要花钱去赡养。经济学家理查德·杜·波夫在他的专业论文中和其他地方都非常有力地指出:1960年至1975年间,用于教育的支出得到了急剧增长。<sup>⑧</sup>

当然,这还仅仅是抚养孩子所需支出的一个方面而已。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支出因被归入家庭支出中而未被计算在内。一个家庭为了抚养孩子需要有多少支出?你也许能计算出一些具体的数字,但这

并不属于政府开支。但如果你只是关注一下这些数字,你就会发现生育高峰期内用于教育和抚养孩子所需的费用得到了急剧增加。即便你做出最为悲观的估计,认为用于支付老人退休金的开支会大幅增加,但它也决不会超过用于抚养孩子所需的支出。而我们的经济却应付过去了,即便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挺过来了——尽管那时政府的钱袋与现在相比要干瘪许多。在此,我又要再次指出:所谓的危机不过是人为的凭空捏造。

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本身就曾在同一些报告中指出,也正如杜·波夫曾强调的那样,该体系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在于:为了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需要对工资收入征收税款,但是可资征税的工资收入的总体比例却在下降。其原因在于,政府设定了 72 600 美元的征税最高限额。由于过去工资收入的再分配极不均衡,大多数财富集中到更为富有的人手中。而由于最高限额的存在,他们不必为超出的那部分收入支付社会保障税。因此,贫困人口所承受的负担就相对增加了。

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调高上限或干脆取消最高限额。为什么比尔·盖茨(Bill Gates)只需为其收入中的第一个 72 600 美元支付税款,然后便万事大吉了呢?因此,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么调高上限,要么取消最高限额。这样你就能克服这个问题,正如受托管理者们指出的那样,它是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更为先进的税收制度。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来,即社会保障体系会崩溃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它只能是基于极端荒谬的假设之上。只要抱着现实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运作情况还是良好的。

华尔街的一些人建议,要想取得更多的社会保障收入,最好是把信托基金投入到股票市场中去。

那你就真的需要好好想想了。如果这些基金投到股票市场的话,你可以确信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它将会成为华尔街的财富之源。问问你自己,是谁在资助这种宣传,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最后你就会惊奇地发现,那是金融资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溢。至于其他的后果,你会听到许多关于股市的收益远比政府证券(government securities)丰厚的说法。有时的确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完全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是个完全不懂经济学规律的门外汉了,更不要说是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的经济学家的虚伪说词了。

这些不是经济学判断,而是道德判断。如果你把钱投入到富有风险的股票市场,你也许的确会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你要面临着风险。对于这种风险你怎样去评估它?你没有办法评估。这是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个人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要那样做,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来讲,你可以选择股票市场,这都无关紧要。如果你亏了本,那就自认倒霉好了。但对于那些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来讲,那就非同小

可了。

如何去评估这一风险呢？你不能指望靠经济学教材去找出评估风险的办法。社会保障就是一种社会保险，它把风险分摊到所有人头上，尽管融资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却一直在不断发展。因为有最高限额的限制和按同一水平征收，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对穷人来讲，其负担要比富人更重。但保障金的分配对穷人来讲则是有利的，相较于他们的收入比例而言，穷人得到的比富人的要多。

纯粹的数量多少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它把风险分摊到所有人头上，重要的是社会团结。《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规定：我们要去关心社会保障，就像关心公共教育那样。你会说，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关心别人的孩子是否能接受教育，我们关心其他的老人是否会忍饥挨饿，我们不希望会发生那样的事情。那种把社会保障基金投入到股票市场的想法，尽管是长篇累牍，百般游说，其后果却是将毁掉社会团结意识——人们心里总是想：你关心的只有自己。如果街上那家伙 70 岁的时候饿死了，那也与你无关，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都怪他自己投资不善，或是运气不佳。对富人来讲这的确很不错，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则完全取决于你是如何对风险进行评估的。我希望社会能够关心老年人阶层，实际上，过去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一个庞大的反贫穷计划。

这是规模最为庞大的反贫困计划。老年人面临饥饿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正如杜·波夫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社会保障体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退休人员,还包括那些需要依靠他人生活的人、残疾工人,以及贫穷的夫妻等等。那是个大摊子。社会保障制度也将继续维持下去。但是这并不保险,除非你购买价格昂贵的保单,但那并不是穷人买得起的。

人们也应该好好审视一下其他的解决方案。多年来,供职于“开端中心”(Preamble Center)的马克·韦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曾写过不少相关的文章。<sup>⑨</sup>比如,有一个正在着手实施的方案是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限制由65岁以上调高到69岁以上。让我们来看一看生存几率(survival rates)。我们这里有些人口统计信息,如果你看看预期生存几率,就会发现它与不同的生活群体紧密相联。总体而言,你生活条件越好,你生存的时间就越久。而如果你是一名产业工人,你的生活就要艰苦一些,你摄入的营养也许就要少一些。而如果你是一名黑人产业工人的话,情况就要更糟一些了。这就意味着,你退休之后(无论你何时退休)的生存时间就要比富裕白人短了,这也意味着穷人领取的退休金要比富人更少。就总体的退休金总额而言,你领取退休金的年限越长,你从穷人手里拿到的钱就越多——因为穷人的寿命要短。而你付给富人的退休金则越多,因为他们的寿命更为长久。

另外一个被提到的方案是增加付酬劳动的时间,以作为社会保障金支付的依据。那么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实际上会损害妇女



和那些没有将其大部分时间花在全职劳动上的人的利益。他们将保障金支付的基础扩展到他们不工作时的时间段上,那么对于这个不工作的时间段来讲,他们将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金。

前面的每种方案都不可行。它要么是劫贫济富,要么是鼓吹风险自负。这对有钱人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对一般民众和贫困者来说,却是对那种休戚与共、互相扶助理念的沉重打击。

综合这些情况,我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已是很清楚的了。尽管你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但整个事情的概貌是很清楚的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富豪和权贵们兜售这一理念的方法。兜售者包括所有你提到的人和他们供职的机构。他们想方设法地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强行通过这些方案,要把高度令人置疑的预测变成既存事实,将那些实际上自相矛盾的假设强加于人,并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

从商业媒体上,你就可以直接对此事有部分的了解。有几个主流的职业经济学家,当然不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曾指出过事情的真相。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谎言淹没了。除非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否则这个行之有效的体系就将毁于一旦。社会保障体系是有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融资金额的不减少,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改善的。而真正的问题却是那些并未被讨论过的东西。

艾伦·格林斯潘对克林顿投资股票市场的计划持批评态度。他说他担心那些资产将有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sup>⑩</sup>

我认为克林顿的计划并非是个好东西,但格林斯潘则希望将该(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更糟。克林顿的计划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它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但它至少让资产的风险分散开了。而格林斯潘则不然,他希望使该体系实现私有化。如果整个体系被彻底私有化,它就会成为华尔街的财富泉源了,这当然会让富人们喜形于色。因为即便是事情变糟了,他们怎么着都是能捞到好处的。尽管他不会直言不讳地这么说,但他的道德判断则是:即便大批民众有可能会在70岁时被冻饿而死,但是现在让他们去冒些风险也是对的。他会说,没有关系的,他们能冒那个险。但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评判问题。

在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部分退休金投资投入到了东京股票市场。后来股市崩盘,结果导致救济金被大幅削减以及税额的提高。

如果你把退休问题与股市挂钩,你将面临的一切将取决于你退休的时间。因为股票市场总是在起伏变动的。它也许在一定时间里会不断上涨,但不论股市繁荣期有多长,即便是一百年,而你恰恰是在它跌落的时候退休,那么这一切对你都无济于事。在日本,那是一次非常迅速的崩溃,但在美国这种情形却不止一次。我手头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一项耗时达二十年的研究发现仅20世纪就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些想要从股市收益中获取退休金的人会被现实击得粉碎。而这些正是人们所面对的真正问题。

我们再次面临如何处理那种风险的问题。我想再一次强调的是，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解决那个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如何评估你个人发生不幸风险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基于别的而不是经济基础的判断。经济学家能给你一些数字，他们会说，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是多少，那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是多少。但是选择如何评估某人及其残疾配偶或孤苦者会不会挨饿却不属于经济学理论的范畴。

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公共教育。在这一领域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媒体意识形态运动(media ideological campaign)呢？

很多很多。这种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摧毁公共教育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准则是：关心那些你并不认识的孩子是否能够接受教育。对于这个公共教育体系，连同一切事关社会团结的人文生活、观点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有人都想要除之而后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资金投入。而如果你真的让公立学校变得极为糟糕，人们还是希望有一种功能类似的替代物来代替它。

任何一种公益事业，如果要把它私有化，首先要做的就是使它机能失常。这样人们就会说，我们不想再要这东西了，它已无法发挥作用，那就让它见鬼去吧。因此，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一体系功能失常，然后你就能将其交给企业部门，并且得到广泛的支持。

因此,公共教育就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教师工资给付不足,教育资源匮乏。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的投资普遍严重短缺,这种情况在卡特和里根执政后期便已出现,而学校系统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公众对学校问题的关注正在持续升高。

对这一问题也有过天花乱坠的宣传。在里根执政期间,1984年前后,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宣称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教育危机。我们的学校不能运转了,我们也不再具有竞争力了。<sup>③</sup>经过专家们的审慎分析之后,很快证明这种说法过于草率,它所指称的绝大部分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其目的则是要让人们担心教育危机即将来临。第二件事是通过限制学校建设和付给教师低薪酬等手段让学校资金投入不足,以促成危机的发生。然后就推销那些一开始听起来还相当不错的替代物: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磁力学校(magnet school)、教育券(vouchers)。这样一来,谁还能提出不同的反对意见呢?你可以这样慢慢地除掉公共教育体系,先是慢慢地降低其学校功能,使其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低,然后大肆宣传它是多么糟糕,随后便推出那些开始规模较小,但最终为大投资公司所垂青的那些大型替代学校。

几年前,“哈佛工会计划”(Harvard Trade Union Program)的伊莱恩·伯纳德(Elaine Bernard)送给我一本莱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分发给客户的小册子。其中谈到未来的投资机会是多么地好,你如何应该在现在这个有利的时机加盟进来。我们将帮你加盟EMO,也就是“教育维护组织”(Educational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一种与“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相类似的组织。我们不仅接收了卫生系统,我们也在将监狱和社会福利系统进行私有化经营,我们可以经营任何系统。有钱人依靠别人的劳动赚钱,我们也将效仿这种方式。我们下一个大的公共资金投资目标就是教育系统。所以我们将接收“教育维护组织”,公共资金也会投入进来。你只要进行投资,就能赚到大钱。

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人试图将部分教育系统私有化。那就意味着你招收一些天资聪明的孩子,然后将他们暴露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因为那正是财富的泉源)、设计规划面前。随后成立一家私人公司,也就是那种“教育维护机构”来经营那些私有化的学校。在几年前,他们就想让他们的王牌投资伙伴加盟这个远景看好的行当,而我认为那也正是金融资本想要投资的方向。

美国有3900万老人和残疾人在医疗保险机构登记注册。最近,联邦咨询委员会建议应让私人人寿保险公司在经营医疗保险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说,这预示着将要实现医疗保险业的私有化。

这和上述(发生在教育领域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私有化一旦发生,它就和私有部门的其他事情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私立机构只有一个目标:利润最大化,同时使人力条件最小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除此之外他们不会追求任何其他东西。即使系统的竞争性极低,他们还是要那样去做。这

就是私有制的本性。

当然,这里会有规则的约束,但这些私立机构和拿走退休金的投资公司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无疑,肯定会有规则存在,但却有着许多种变通方法,特别是当你有钱有权还有一大帮律师的话,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规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它就像那些为保证工人安全而制定的规则一样,非常容易变通。

肯尼迪是正确的。这是试图使系统功能失常的部分努力,以便形成实行私有化的压力。一旦实现了私有化,它无疑就会力图使成本最小化。这就是所谓私有化的真正含义。这就意味着你要保障的就是那些风险最小而不会让你花费太多的病人,而其他的人则被拒之门外。这样一来,那种80与20的规则又出现了,正如他们在商学院教授的那样:80%的消费者都不值得去劳神费力,所以就不必多管了。只须为那些20%的富有消费者提供服务就行了,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获得利润。这就是私有经济的本质。当然,你还会得到政府补助,纳税人那数额不菲的资金会输入进来,成为你赚钱的踏板。

去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4300万以上,占总人口的16%,而其中儿童则占到了四分之一。“国民健康计划医生”(Physicians for a National Health Program)斯特菲·伍尔汉德勒(Steffie Woolhandler)说道,“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种增长的规模是令人震惊的”。<sup>⑩</sup>



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经济繁荣而已。总的一点很明确,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它都是一种耻辱。当经济发展平稳正常,而并非处于衰退之中,出现这种状况就更是一种耻辱。

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富有的国家,人们不必参加医疗保险。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如此令人愤慨,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讨论这一问题了。这里并非一个参加与不参加的问题。和那些在卫生保健系统工作的人聊聊,或者干脆你碰巧生病住院了,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医疗服务的水平正在不断下降。

护士们的工作非常可怕,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超负荷工作着,这种情况甚至在那些最好最贵的医院里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护理工作交给基层的护理人员去做。以我个人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即使在世界上资金最为雄厚的私人医院也是如此,那些专业医护人员也可以告诉你这一切。护士们提出了抗议,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工作量严重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负荷。那些专业技能与训练有限的人都干着本不属于他们干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的卫生保健成本仍然高得异乎寻常。就其经济规模而言,它的成本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的工业化国家。

在和人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他们对保健组织(HMO)极为不满。特别是医疗保健的选择和限制问题,你只能到特定的地方找特定的医生。

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孕妇来说,她常常不得不到 20 英里以外的一家医院去,而不是到离家只有两英里的那家医院。保健组织进行的是商业性运营,它们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在工厂里,通过标准化、制定规程和采用通用零部件,你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它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它们当然也会这样行事,它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机器中的通用零部件一样。

同时,保健组织有着相当高的经营成本,这是自然的。他们是私营企业,很多花费都用到诸如广告宣传、经常费用和一级又一级的企业微观管理这类事情上了。你得管理医生,如果一个医生想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首先要得到领导的同意,而对那些领导们最恰当的称呼莫过于“尖头官僚”(pointy-headed bureaucrats)了,虽然这个名词通常只用来形容政府官员。尽管他们既不知道病人病情如何,也见不到患者本人,但医生们还是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行。

同样,还有一些未被考虑到的附加成本。许多成本都被转移到公众头上,而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计算这部分成本。比如,如果一个医生每周必须额外花 20 个小时用于书面工作,这不会被称作成本;如果病人不得不在候诊室里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不叫做成本;如果患者不得不费时费力地穿越整个城镇去就诊,那也不是成本。所有成本都被转嫁到了公众头上,如果考虑到顾客的人数规模,总的成本就非常高了。

对整个经济体而言,情况也是一样。比如说你打电话去订机票。空中服务热线是自动操控的,这节省了他们不少的钱,经济学家们会告诉你它是很有经济效益的。另一方面,当你打电话的时候,它可就

要让你破费了。因为你得坐上半小时去听语音信息：欢迎来电垂询，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我们将热心为您服务，请不要挂机，下一个客服栏目是……然后便是音乐的声音。这整个时间都是你付出的成本。但这种成本有多少却没有人会去算一算。

如果将上述成本乘以顾客的人数，其数额就相当可观了。你算出每个人的成本，乘以使用那项服务的人数，再与那自动化服务热线的效益相比，你也许就能完全明白那种自动操控对整个经济而言，它带来的却完全是一种损失。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来说，道理也是一样。成本都转移到医生、护士、病人头上和其他并没算做成本的方面了。

社会保险、公共教育、医疗保险制度、卫生保健等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是如此息息相关，它们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孟加拉国或阿富汗的抽象事物。如果要说说它们共同之处的话，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催生和引发群众运动的避雷针了。

但对组织者来讲，它却是致富的泉源。有许多事情本来便应如此如此。我记得在纪念《独立宣言》签署两百周年之际，进行过一些有关民众看法的民意测验。其中一个民意测验很有意思，他们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语句，然后请他们说出这些是否属于宪法的内容。没有人知道宪法有哪些内容。你也许在八年级公民科课本中学到过，但是你忘记了。所以，当他们被问到一些语句是否在宪法里表述过时，他们的说法让人印象十分深刻：它一定是宪法里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

吗？有一条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大约有一半的人认为那是宪法里的文字。<sup>③</sup>对于工会组织者而言，这简直就像是天堂之音。如果这些观点没有得到发展和应用，那他们简直是太失败了。

我们谈谈从印刷品到网络空间的革命性转变吧。它对将来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来形式的档案将会是什么样子？

没人能预知未来。部分原因就在于没有人知道现在使用的储存方法会有多长的应用时间。曾有一些图书馆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召开过技术会议，专门探讨电子储存手段会持续多久的问题。你可以确信17世纪的书是经久耐用的，因为它们用的都是最好的纸张。请翻阅一下那时出版的书籍，我就经常这样翻阅，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它们的样子的确不错，读起来也总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而我们再看看一本20世纪的书，它们看上去无法进行长久保存。这些书籍所用的纸张要便宜得多，很容易破损朽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纷纷改用电子储存方式，但这种情况还不很多。至于将来的档案会是什么样子，这倒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将会有有一个新老手段并用的过程。从总体上讲，这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技术资料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地进行交流。如果明天我要讲课，需要举一个发生在瑞典的事例，我就可以给一个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发封电子邮件：你可以告诉我这件发生在瑞典的事吗？如果我知道某人写了一份关于某某

问题的文章,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翻印。

在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信息过量的问题。在科学研究和其他领域,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信息短缺,而是能否对信息进行敏锐分析。如果你的信息过量,它就会使你进行敏锐分析的几率大打折扣。仅仅通过电子邮件所传输的信息量便极为惊人,而且其数量还在日甚一日地扩大。对于商务往来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曾有人对商界人士每天每个人花多少时间用来回复电子邮件进行过研究。实际上,这个时间量增长得非常快,足以导致生产率为之下降。

多年来,有一件事在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那就是尽管用于计算机的资金投入十分巨大,但生产率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有些人说,这要等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也许需要再等二十年。但这里却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实际已经有所争论,那就是它对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它具有两面性。由于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原因,从技术层面上讲,它甚至在提高效率这一点上都不可能不会有什么贡献。成本只不过是转移了。但在处理信息流问题上,却具有其消极的一面。

依我的看法,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实在是太容易了。任何人如果头脑发热,有了能管得上三秒钟的草率想法就可大发议论。然后在突然之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能看到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力量。收到它的人,也就是那世界上半的人,都得为它做点什么。从我收到的那些东西,你就能知道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信息。

同时,人们还容易上瘾。有些人就是沉溺于网络世界,将大量的

时间都耗费在网络上。他们不关心法国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却在网上阅读来自西藏的最新报纸。像这样沉溺于网络世界是十分有害的。

那么,它对人们像原子一样独立的生活有没有贡献呢?

在许多方面,比如在组织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互联网对促进人们的相互交往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也有负面作用。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家十几岁的孩子们一吃完晚饭就钻进屋子里开始社交活动了。他们和那些虚拟的人物、网友以及假冒身份而实际可能正呆在其他某个国家的人进行交往。这就是他们的社交圈子。网上的朋友佯称如此如此,他们也装作这般这般。这将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什么样影响,我实在不愿多想了。

对我们人类社会而言,面对面的交往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他某个国家的60岁老头子也许会装作14岁的小姑娘,你最好不要和这种人交往。实际上,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它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实在很难说清楚。

但这只是些小问题。真正的问题与这完全不同。仅仅是最近几年,一些公司发现,在家庭营销服务这一领域,互联网这项公共创造是可以广泛运用的赚钱工具。营销一词不仅仅意味香水交易,而且包括人们的态度、信仰、拜金思想等等。他们要控制它。尽管能否在技术上实现这一点还不确定,但他们正在力图这么做。

就控制这点来说,看上去最容易的就是控制用户对互联网的访



问。任何人,只要他们想找点事,就可以建立一个网页。你要访问网络,这就意味着你得通过超级企业控制的访问路径。问题是,他们能指出正确的访问路径吗?如果他们的确是要那么做或设计出访问路径,这倒也没有什么。但实际上作为专用用户,你往往被他们引向他们想要你去访问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没有人能知道,但我们对他们所作所为却很少提出质疑。他们还想减少利用系统服务于有积极意义的事情的机会,像组织起来反对《多边投资协定》。那些商家最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建立一个可以把加拿大人和法国人协调起来共同支持《多边投资协定》的系统。

互联网被有效利用的一个事例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印尼的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并组织起来推翻了苏哈托的独裁政权。印尼的独裁政权不喜欢互联网,而他们的支持者——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公司——也不喜欢互联网被如此应用。苏哈托独裁政权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他们对于利用互联网发动民主革命则并无兴趣。所以 they 要减小互联网的那种用途。这是否能发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的,它的确会发挥作用,除非受到强烈的反对。

将来会不会出现专门讨论某一问题的乔姆斯基电子邮件收藏库呢?

这你得去问《Z杂志》的迈克·阿尔伯特(Mike Albert)了。我把许多邮件都删掉了,但他可能保留了不少。

您谈到过您时间上的需求问题,比如,您需要花在阅读电子邮件上的时间。您是怎么安排你的时间的?面对不断增加的时间需求,您是如何应对的呢?

很糟糕,没有其他的办法,这里也有一个身体条件限制的问题。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你干了这件事,就干不了那件事。

但如果您要花几个小时回复电子邮件的话,您就不能写一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或不能为《Z杂志》写上一篇政论文章。

四十年前我就做出了决定。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这一点你不可能克服。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有时你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则可能是正确的。没有一种运算法则或程序可以让你有一个完全正确的解决办法。

您有没有一个您特别喜欢的工作时间段?比如早晨或者是深夜?

事实上,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我们上一次会面是在5月份,当时是在波尔德。<sup>④</sup>我曾问及您的健康问题,因为您那时刚做完前列腺癌手术。您当时开玩笑说您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事实上到现在已将近9个月了。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那是个相当不错的预言。去年秋天我又开始捡起那些以前推迟了的演讲。日程相当紧,许多事都一拖再拖。真是一团糟,感觉什么都该做。在最后几个月里日程尤其繁忙,我也的确非常忙,经常要到国外去。不过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我猜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呢。



# 第四章

## 处于崩溃边缘的东帝汶

1999年9月8日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 KGNU 电台

东帝汶的局势每况愈下。您已在 *MoJo Wir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美国为什么应关注东帝汶问题。<sup>①</sup>

首先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介入东帝汶局势，美国在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其次是那里的情况已非常严峻，比我几星期前写那篇文章时更糟糕。东帝汶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卡特执政时期直至今日，美国在支持印尼对东帝汶的入侵中发挥了直接且关键的作用——武装并运送了印尼军队，有力地支持了他们干下种种恶行。

但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美国仍应有所作为。因为美国在东帝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阻止局势的恶化。但如果美国袖手旁观，那不

夸张地说东帝汶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卢旺达。

您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一点上，克林顿总统不需要任何指点。”然后您又提到 1997 年末和 1998 年春的一些事件。您究竟指的是什么？

苏哈托将军自 1965 年上台以来就成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亲密朋友。可他的权力是靠着屠杀无数生命得来的。中央情报局将他同希特勒等人并称为 20 世纪的几大刽子手，可他的屠杀行为还受到了美国的热情赞扬。他镇压了印尼的左翼党派和惟一受公众支持的政治运动，屠杀了数十万农民，向无异于掠夺的西方投资开放了国门，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很受投资国欢迎。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暴行，包括入侵东帝汶。美国对这次入侵给予的坚决支持一直持续到 1997 年。

1997 年苏哈托犯了他的第一个错误，国家在他手里开始失控。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一个与他们友好的独裁者无法控制他的国家，那么他就变得没有多大用处了。另一方面，他又在一个事件中出人意料地暴露了自己的软肋。为惩治极少数印尼权贵的强盗行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美国的指令）制定了一个损害大多数印尼人民利益的严厉制裁措施。也许是由于害怕引起国内骚乱，苏哈托没有立即执行这个措施。

然后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接踵而来，尽管美国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并不多，但却在印尼公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1998 年 2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迈克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飞至雅加达,责令苏哈托在该组织的规则上签字,并保证遵守有关规则。不久就有一张照片在印尼和澳大利亚广为传播,照片上的苏哈托恭顺地握着一杆笔坐在桌前,而康德苏则神色傲慢地抱着手臂站在他身前,照片边的标题写着:《十足的殖民者嘴脸》。在随后不久的1998年5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美国已决定在印尼开始“民主过渡”(a democratic transition),换句话说苏哈托该下台了。<sup>②</sup>四小时以后,苏哈托执政生涯宣告结束。照片事件并不是苏哈托下台的惟一原因,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它也不是导火索,但它确实象征着苏哈托与西方关系的性质。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克林顿政府当初向印尼军方明确表示游戏已经结束,那它就会结束。可我十分怀疑他们会不会那么做,尽管有人曾讨论过武力干涉,但美国却拒绝承诺使用武力;也曾有人讨论过实施经济制裁,美国也没有积极响应。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为普通却有效的措施,如威胁以战争罪起诉印尼的将军们。这一招十分有效,因为那意味着被起诉的将军们会被长期困在自己的国家里。

一名印尼将军已有此遭遇。这个东帝汶帝力(Dili)大屠杀的策划者被起诉后不得不逃离美国,这正是他不愿意的。可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没多大必要。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5月采取了更为简捷的策略,即措辞强硬地向苏哈托表明反对立场。但我怀疑政府的这个举措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早在2月或3月政府就该如此了,最晚也不应超过4月,因为那时已有很多人被屠杀了。当时发生了多起骇人



听闻的事件,例如躲藏在利基卡(Liquica)一所教堂里的60个人被印尼军队发现并全部杀害。

那次屠杀发生在4月。

还不止这些,有一起更令人发指的行径。可克林顿政府甚至再次阻碍了没有武装的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印尼。他们最后终于让几百名观察员参加了联合国东帝汶援助团(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East Timor, UNAMET)。然而这个援助团的残部在几个小时前已被印尼军队和民兵包围圈困住,现在食品和水都快耗尽了。

援助团中有一名叫艾伦·奈恩(Allan Nairn)的新闻记者逃离了东帝汶的首都帝力。按照城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说法,这座城市已经被毁灭,许多部分都被烧毁了,大部分居民都已逃难了。奈恩想留下继续观察城里的事态,可还是被印尼士兵抓获。他设法让联合国援助团得知自己的处境,总算保住了性命。这就是东帝汶刚刚进行全民公决后发生的事情。东帝汶人民在公投中显示了巨大的勇气,结果是拥护东帝汶独立的一方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占领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的同时敢于投票选择独立,这的确值得钦佩。

几乎99%的有选举权的东帝汶公民都参加了投票,其中80%选择了独立。

当时有数万人从他们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投票,然后再回去躲起来。随后不久,席卷全国的暴行开始了。今天早上,联合国发布的一条消息称东帝汶的难民人数已达20万人。根据帝力的教会组织提供的十分可靠的消息来源称:今年上半年已有3000到5000人被害,最近几天的被害者甚至更多。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sup>③</sup>

东帝汶暴乱的死亡人数几乎是科索沃遭到北约轰炸前一年里死亡人数的两倍。在科索沃,许多人都死于波及全国40%领土的游击战争;而在东帝汶这个面积只有科索沃一半的国家里发生的就是赤裸裸的屠杀。由此可见,东帝汶屠杀的范围十分惊人,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我们也无法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因为印尼军队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观察人员都赶出了东帝汶。新闻记者都已被迫逃亡,只有奈恩和几个澳大利亚人留了下来。

联合国也不得不撤出所有工作人员。我想如果联合国能把那些被围困在帝力的援助团人员解救出来的话,它早就这样做了。也就是说东帝汶发生的暴行会在无人目睹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至于东帝汶乡村发生了什么就更是无人知情。电话被切断了,大学被烧毁了,主教贝洛(Belo)的住宅也被付之一炬,他本人在逃亡途中被澳大利亚军队营救。澳大利亚记者和外交官们描述的东帝汶十分恐怖。用一些联合国官员的话说,人人皆知的帝力城已被彻底“清洗”。抢劫和掠夺随处可见,印尼人似乎准备夷平那座城市。

印尼为入侵东帝汶找的借口是:如果听任东帝汶独立,还会有其

他地区效仿,如西巴布亚岛(West Papua)和亚齐(Aceh)。

我们必须记住:东帝汶并不是印尼的领土。印尼对东帝汶的侵占从未得到过联合国的认可,甚至都没有得到过美国的承认。长期以来,它只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承认。直到最近,美国媒体中还有报道称:“印尼的帝力(Dili, Indonesia)。”但它绝不是印尼的领土,就像二战中被占领的法国绝不是德国的领土一样。

为《纽约时报》撰稿的塞斯·迈登斯把东帝汶独立运动倡导者称为“分裂主义者”(separatists)。他这种说法恰当吗?<sup>④</sup>

按他的说法,在纳粹统治下法国抵抗者就是“分裂主义者”。早在1975年联合国安理会就命令印尼立即撤出东帝汶。当时美国尽管阻碍了该决议的执行,可并没有投反对票。国际法院早已宣布居民有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澳大利亚尽管已从法律上承认东帝汶是印尼的一部分,可它实际已经收回了该立场。印尼根本无权继续留在东帝汶,它的存在纯粹是依仗武力和美国的支持,否则早就该离开东帝汶了。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非常形象而清楚地描绘了当时美国的所作所为,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时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几年之后,他客观真实地在回忆录中再现了那段历史。他说,国务院想让事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发展,于是让

他负责使联合国的一切措施都“毫无效果”，而“我没有成功地执行这项任务”。<sup>⑤</sup>接着，他还叙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东帝汶有6万人被害，与二战中德国兵杀害俄罗斯人的比例相当。这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然后他转向了其他话题。他的叙述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这一切现在仍然在继续。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昨天向联合国呈递了他的国书。媒体报道该事件时还提及了他在代顿时的外交成绩，但没有人注意他外交生涯中的另一页，即与各媒体正在热炒的东帝汶有联系的那一页。他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时负责亚洲事务，当时他是印尼入侵东帝汶的主要拥护者。

美国军方与威兰托将军(General Wiranto)和印尼军队有何关联？印尼军队与东帝汶民兵协同作战得到了允许吗？

印尼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一支由美国人操控的军队。他们的军官在美国接受训练，他们与美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美国的武器装备。现在，我认为情况有所改变，澳大利亚较多地参与了训练和军事演习。然而就在最近，美军又同印尼军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印尼军队的特种部队“考帕萨斯”(Kopassus)，这支部队按照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有着可怕的记录，东帝汶发生的大部分屠杀都与它有关。

英国曾经是印尼的主要武器来源。美国国会禁止政府向印尼出

口大部分的武器及提供直接的训练,可克林顿政府避开了这些禁令,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向印尼提供援助。

美国是否仍在帮助印尼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人关注此事。这种内幕通常要在几年之后才会大白于天下。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军和白宫都能向印尼施加很大影响,因为印尼人十分关心美国对其举动的立场和态度。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印尼人无需完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首先,印尼是美国公司忠实而富有的主顾,在其境内有大量的美国公司投资,因而它不用担心美国会在东帝汶问题上抛开它。此外还有一个不太公开的原因使美国不愿放手印尼,那就是中国的影响。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泰国时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讲话,谴责美国的“炮舰外交”和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sup>⑥</sup>这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广泛关注。江泽民还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的构想。根据东南亚国家有限的报道,泰国高层十分欢迎中国的这一表态,因为他们希望出现一股力量同他们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很畏惧的美国相抗衡。很明显中国是在提议建立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安全体系,这同时还意味着中国与东南亚或其中一部分国家可能会结成一个经济集团,最终还可能把日本和北亚拉进来,那样美国的地位就难免下降,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个地区之外。

然而,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该地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这种担心驱使美国重新武装了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挑起了中印战争,还有在1958年采取秘密行动试图分裂当

时的中立国印尼。在这个地区美国并不在意俄罗斯,因为这里不是冷战的争夺范围。可美国担心该地区的国家会迎合中国,因为在某些国家的内部文件中已经写明要建立一个亚洲国家集团,以抵消美国对亚洲的特权和控制。印尼军方都在考虑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以对抗美国造成的哪怕是轻微的压力。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决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关注东帝汶的人们能采取什么行动?

印尼人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将东帝汶人民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可时间已所剩无几,可能只有数天了。美国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而公开的举措(可能已经有些晚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来自公众的强大压力督促美国政府马上行动。因为东帝汶被印尼蹂躏二十五年后可能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 第五章

## 西雅图事件的意义

2000年2月23日于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 KGNU 电台

让我们谈谈11月底12月初在西雅图举行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时所发生的事情。您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那是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力。它反映了多年来在世界很多地区变得越来越强烈的一种情绪，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经济。它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危及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和民主权利，因而招致了广泛抵制。

西雅图事件中有几点值得回味。首先，事前经过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大批的人群不是自发地出现在街头的。其次，参与者的大范围和多样性。以往互不联系的地区的居民走到了

一起,而且是一次真正的国际性聚会:来自第三世界和美国本土的抗议者、农民、劳工领袖及其他人士,还有美国各地有着不同利益却殊途同归的各团体也参加了进来,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工会等。

这一点在以往类似的活动中的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发生在前一年的反抗《多边投资协定》(MAI)的活动和针对其他一些所谓协议的抗议活动,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世贸组织协定,其实它们不能叫做协定,它们缺乏应有的群众基础,因为参加国的大部分人民都反对签订它们。上述反抗活动已经相当激烈,相信它们会以更富建设性的方式继续下去。

我们能从西雅图事件中学习到什么?

首先,事先进行长期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十分重要。其次,大部分关注该问题的人都参与了进来,有国内人士也有国际人士,有不安于经济全球化的人,也有强烈的反对者。人们反对经济全球化是因为它破坏了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及决策自由,使一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和地位凌驾于他人之上,且只顾及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世界的平等状况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已在曼谷召开。安德鲁·西姆斯(Andrew Simms)在刊登于《前卫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会如果得到了相应的权力与资源将有助于改

革国际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弊端”，还说他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表示乐观。<sup>①</sup>

这有些夸大其词了。首先，联合国贸发会议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没有任何执行权力。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也正是它受排斥的原因。举例来说，在美国除了一些商业媒体偶尔能见到关于它的报道之外，它的名字一般很少出现。正是由于有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所以尽管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确反映了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它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

举个例子，联合国贸发会议三十年前曾提出要稳定农产品价格以维持贫苦农民的生计。尽管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应付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而饥饿的农民却不能让他们的孩子等到下一年再吃饭。虽然这项提议与富国的国内政策相符，却遭到了它们的阻挠，理由是“貌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sound liberal economists)认为这样会干扰市场的自由。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言，一项提议只有在迎合了富国的利润与权力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纳，否则就会被扔在一边不被理睬。<sup>②</sup>

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策之一是放弃种植所谓“合法作物”(legitimate crops)如咖啡，转而生产其他不易遭受价格波动影响的作物如古柯、大麻和鸦片。美国的反应是对国内外的贫苦农民进行更严厉的处罚。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为类似的原因遭到了打压。所以诸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充满信心”的说法确有些

言过其实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言论,比方说,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它的一份重要刊物《第三世界经济》(*Third World Economics*)最近有几篇文章强烈批评联合国贸发会议迎合强国的议程。<sup>③</sup>与工业化国家操纵的世界贸易组织相比,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确相对更为独立,并更多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我们也决不能过度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别。

正如您刚才所说,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全世界也是如此。即使是《金融时报》最近也有一篇评论反映这个问题:“在19世纪初,世界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率为3:1,到19世纪末这个比率变成了10:1,而到20世纪末已升至60:1。”<sup>④</sup>

这种观点极易误导读者,也大大低估了事实真相,因为真正严重的贫富差距不能用国家之间的差别来衡量,而应放在全世界的人口中进行比较。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正在飞速增长,从十年前到现在已从大约80比1增至120比1,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但我相信那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现在占全球人口1%的富豪与占总人口数60%的近30亿穷人收入相当。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度安排和有意扩大贫富差距的经济计划。按照经济学的某些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收入会达到均衡,可它们只能适用于一些抽象的经济模型,与现实生活完全两样。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把西雅图的示威者们称作“扁平地球论者的诺亚方舟”(Noah's ark of flat-earth advocates)。<sup>⑤</sup>

从他的角度来看可能的确如此,这就如同用奴隶主的眼睛去看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一样。如果你想了解一些相关的数据,我这儿正好有一些,很能说明问题。道格·亨伍德主办的珍贵刊物《左翼商业观察家》最新一期中登载了反映全球贫富差距状况的吉尼指数(Gini index),并指出该指数已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sup>⑥</sup>可能会有人认为只要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加,那么即使增长不平均也无关紧要。这种观点很可怕,可我们不必理睬这种没有正确依据的论点。

让我们再来看看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论点,是的,对于他所代表的全球百分之一的富翁来说,那些抗议者的确是扁平地球论者。

能否说西雅图街头的抗议行为加上警方的催泪瓦斯是对民主的一种践踏?

我认为就是这样。有效的民主不应在街头实现,而应体现在决策的过程中。西雅图的抗议行为反映了美国民主的退步及公众作出的反抗。它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运动,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已经奋斗了数个世纪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许多次胜利就是用人们在西雅图街头的方式争得的,而不是靠上天赐予的。如果公众

对西雅图事件的反应是有组织的、建设性的,那么结果将是那些暗中炮制的极不民主的国际经济安排会受到制约甚至扭转。

很自然,人们会把正在发生的事件视作对国家主权的破坏,但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状况比这要差得多。全世界超过半数的人口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由于所谓的债务危机,他们的经济政策被华盛顿的官员们操纵着,而背后影响这一切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原因。因此可以说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缺乏最起码的主权。

为什么说债务危机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有一条原则,就是如果我向你借了钱,那么我有还钱的义务;如果我还不出钱,那么你得承担失去债款的风险。可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原则熟视无睹。那是资本主义的原则,但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假设我们遵守这条原则,看看会发生什么。以印尼为例,由于印尼的国债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0%,它的经济即将崩溃。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债务人其实就是我们所支持的那个印尼军事独裁者身边的一两百个人及其亲信。贷方是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许多这样的债务公有化了。这就意味着那些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资的纳税人最终要为这样的债务承担风险。

那些借出的资金情况如何呢?通过资本输出及投资,这些资金在



那些债务人手中越滚越大,可他们并不需要还钱,还账的是印尼人民,他们必须在极其艰苦、贫困的生活中艰难度日。事实上不从其他地方再借入资金,他们是无法还清债务的。

那么债权人呢?他们是没有风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那些从事风险贷款的投资者提供零风险的项目。由于贷款的高风险性,他们会获得高额利润,可风险并不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因为贷款已经社会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等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将债权转移给发达国家的纳税人。在上面这一套体系中,债务人的责任被转移给了本国的穷苦大众,而债权人得以免担风险。这反映的不是经济原则,而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事实上,情况远不止于此。一百多年前的1898年,美国为了防止古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独立,派兵“解放”古巴,从而征服了这个国家。当时美国就创立了一套国际法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套原则下,美国接管了古巴,却没有承认古巴欠下西班牙的债务,它的原因很充分:这些债务是西班牙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因此是无效的。这条原则即法律里的“恶债原则”(odious debts),<sup>⑦</sup>后来在美国的倡导下,该原则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即以武力强加的债权是无效的。

第三世界国家欠下的债务大都是所谓的恶债,甚至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卡林·利萨克斯(Karin Lissakers)都承认这一点。这位国际经济学家在几年前就指出,如果引用恶债原则,那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债务就得一笔勾销。<sup>⑧</sup>那些债务是意识形态的体现而并

非经济事实,因为按照经济原则是谁借款谁还债,然而看看现在是谁在还钱,又是谁在承担风险,可见第三世界的债务是强权的结果,而不是经济规则的体现。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西雅图事件,11月13日的《新闻周刊》在封面上把该事件称作“西雅图人的战争”,还用了一些版面来报道此事。一篇文章的边缘有这样一个评注:“新无政府主义”(The New Anarchism)。<sup>⑨</sup>文章提到这种新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一部分是对机器工业的愤恨,我想您不会知道它指的是谁吧。

我还没关注到这一点。

《新闻周刊》将作家约翰·泽赞(John Zerzan)、臭名昭著的邮包炸弹恐怖分子西奥多·卡津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同您列在了一起,您对此有何看法?周刊与您联系过吗?

当然,我们恳谈了很久。(笑)我能大概推测出《新闻周刊》编辑部里发生了什么,当然你的猜想也八九不离十。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在精英圈子里常带有一种不寻常的含义。比如说,《波士顿环球报》上曾刊登过一篇小文章,写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组织了那些抗议行为。<sup>⑩</sup>谁是无政府主义者?它指的就是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公民组织”(Public Citizen)、劳工组织及其他人士。

还有人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论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在精英人士看来,这不过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行为。这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扁平地球论者”(flat-earthers)十分相似。

纽约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妇女人权组织”(Madre)成员维维安·斯特龙伯格(Vivian Stromberg)说美国有许多民主活动(motions),但没有真正的民主运动(movement)。<sup>①</sup>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比如说,西雅图事件就堪称民主运动。几天前就有学生因为抗议大学没有听取学生组织的建议,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那些工资微薄的血汗工厂(sweatshop)而被捕。还有许多此类事件在我的眼里正是民主运动。和西雅图事件相比,几星期前发生在蒙特利尔的事则更富戏剧性。

当时正在召开《生物安全议定书》协商会议,讨论签订《生物安全议定书》(Biosafety Protocol)的时候。

这件事在美国谈论得不多,因为大部分抗议者都是欧洲人。问题显而易见而且关系重大。会议达成了一项模糊的妥协,而抗议那次会议的队伍十分庞大。《纽约时报》对此事作了相当详尽的报道。<sup>②</sup>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美国单方面要求达成妥协。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国家也加入了美国的阵营,因为它们也能从生物科技出口中

获利。

美国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相对立,那就是它不赞同“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美国否认人们有权拒绝成为生物试验的对象。就个人而言,这一点毋庸置疑。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大学生物系的家伙跑到你的办公室里对你说,你是我的试验品,我要把电极插进你的脑子里测量这个测量那个,那么你就有权说,对不起,我不想成为试验品。那个家伙就不能再要求你拿出科学证据证明试验不会危害到你。美国却坚持他有权这么做,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在蒙特利尔的谈判中,作为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中心的美国要求在WTO规则框架内处理这个问题。而WTO规则要求试验对象必须拿出依据证明自己会受到损害,否则就得服从那些企业的利益任它们摆布。这被埃德·赫尔曼称为“生产者主权(producer sovereignty)”。<sup>⑬</sup>

欧洲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坚持预防原则,即认为人们有权拒绝成为试验品,哪怕他们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自己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很清楚,人们的基本权利正受到威胁:连拒绝成为试验品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就更不要说对本国资源的支配,对外国投资的控制或不让本国的经济命脉落入外国公司及银行之手了。

正是为着某种政府—公司网络联盟的利益,以及使他们手中的

---

\* 该原则要求,即使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也要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损害。——译者

权力更为集中,那些公众权利正受到侵害。祸首就是某些与国家相勾结的超级大公司及迎合它们利益的国家。蒙特利尔事件在这一点上比西雅图事件更为明显,反映的问题也更为尖锐。

食品安全、放射性物质和基因工程等问题似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这种共识跨越了传统的左右分野及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界限。比如说,相当保守的法国农民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持相同的立场。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人们对此事一直谈论和关注得较少。而在欧洲、印度、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抗议,法国农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许多人都担心成为食品新品种的试验对象,无论这种结果不明的试验是在生产阶段还是在消费阶段。也不知道这种影响是怎样跨过大西洋进入了美国,美国公众也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去年秋季,这种不安情绪波及到了我们这里,还导致了某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孟山都公司(Monsanto)专门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和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当时它的股票大幅度下跌,以至不得不公开道歉,至少是口头上,并在事实上宣布取消了某些极端的研究项目,如终结基因——令作物的种子无法发芽的基因,研究它的目的是迫使印度的贫农不断向这家公司购买种子和肥料。不论它的承诺是口头上的还是被实际执行了,一家公司被迫采取这样的举措是很少见的。管中窥豹,我们

可以想象在国外,主要是欧洲的抗议行动影响之大,已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阶级因素。因为富人们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倾向于购买较昂贵的有机食品以避免成为试验对象。

您认为左派能通过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吗?

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偏左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左派关注的问题恰恰是公众所关心的。左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利益和权利,因而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应属于左派。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已经从幕后转移到了前台,这些问题以前只出现在穷国,现在美国人民也不得不面对了。

我们以药品价格为例。美国的药品价格十分高昂,比加拿大贵25%,大约是意大利的两倍。究其原因是垄断行为得到了美国政府乃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支持。有了所谓“知识产权”这样高度保护性的措施,一些大型集团公司的垄断利润得到了保证。为了以垄断价格长期销售昂贵的药物,它们把那些比较便宜的普通药物逐出了市场。这种行径在非洲、泰国和其他地方受到了强烈抵制。

在非洲,艾滋病的传播非常迅速,可能会给整个非洲社会造成健康危机。克林顿和戈尔发表演说强调非洲人民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无可厚非,可问题是我们却允许那些制药商们,主要



是美国的制药商以无人问津的高价在非洲兜售他们的药物。

根据最新报道,现在每年有 60 万婴儿从他们的母亲那儿感染上艾滋病毒,他们可能会因此患上艾滋病。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来加以控制,且一天只需要两美元。但那些制药公司不会允许这些药品得到强制性销售许可,也就是不让那些国家以比垄断价格低得多的成本生产这些药物并以低价出售它们。很快,仅在非洲就会有 4 000 万儿童因为艾滋病成为孤儿。

泰国的境况与非洲相似。它在本土和非洲一些地区都有自己的制药厂,可以生产比垄断价格低得多的药物。他们正在为获得生产权利而抗争。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健康危机。

人类在其他一些疾病面前也处于同样的尴尬境地,如疟疾和肺结核。这些疾病的传播是可以控制的,但却因为药品价格过于昂贵,导致许多人因为无力购买而大批死去。富国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富国的问题是如何让制药公司允许医院为那些老人开出药方。而在穷国,例如非洲和南亚地区,甚至于在泰国这样不太穷的地方,我们却看到几年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生命。

为什么制药公司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垄断利润?它们声称这是对研发费用的必要补偿,那多半是谎言。相当一部分研发费用是由社会承担的。20 世纪早期,社会承担了 50% 的研发费用,而现在大概是 40%。此外,还有一部分公共费用被忽视了,那就是制药所必需的基础生物学研究,而这些研究费用则几乎完全是由社会承担的。

迪安·贝克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研究了这个问题后提出

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假如由公众来支付所有的研发费用，亦即将现有的公共开支再增加一倍，然后要求药品以合理的价格上市，结果会如何？他预计这样做会为社会节省一笔巨大的医疗福利开支。<sup>⑭</sup>我们谈论的可不是抽象问题，而是未来几年里数千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美国，谈谈学生对血汗工厂的抗议活动，它和您所熟知的其他民主运动有相似之处吗？

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它与反种族隔离运动相似，实质上它反抗的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剥削行为。在这次抗议中，不同选区的人民又一次联合了起来。纽约“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的查理·克纳汉（Charlie Kernaghan）和其他一些从事劳工运动的组织发起了这次运动。

目前，血汗工厂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是令人关注的学生问题。举行抗议的学生组织非常之多，美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了一项法规来治理该问题，并将劳工和学生领袖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由政府发起的联盟。可该联盟遭到了许多学生组织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根本于事无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冲突十分激烈。最近我听说在威斯康星爆发了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具体细节我不了解，但有学生在这起事件中被捕。

学生们没有要求资本家对他们慷慨一些吗？

实际上没有人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尽管它也许是应该被埋葬的。抗议者们要求的只是拥有一点理论上的劳工权利。看一下“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有关公约，就能够发现学生们所反抗的几乎都是被该组织的公约所禁止的行为。

美国不肯遵守上述公约的规定。据我所知，美国几乎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任何公约。我想除了像立陶宛和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外，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其他国家倒不一定都严格遵守了有关的规定，可它们至少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表示愿意接受公约的约束。而美国根本就没有接受这些公约。

非洲裔美国人的一句谚语也许能说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主人的工具绝不会被用来拆毁他自己的房子。”

如果这意味着我们无须努力改善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条件，那么对此我不能苟同。政府或公司里的集权现象的确不会主动消失，可我们仍要努力消灭它。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为受苦的人民造福。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人去做这件事。

但如果人们认识到当他们联合起来时所拥有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他们能看到自己在武力干涉下能走多远，那么上面那句谚语的确蕴含着宝贵的哲理。而如果不选择抗争，那剩下能做的就是呆在学堂

里讨论现行制度是多么的糟糕了。

请告诉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里有抗议血汗工厂的学生运动吗?

是的,而且不仅是为了这个问题。大学生常常为了社会正义组织活动,比过去几年要更为活跃。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走上西雅图街头的人们同那些学生怀有同样的认识和感触。美国并没有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问题。拉美国家经过了二十年的所谓改革仍没有什么起色。世界银行行长最近指出:拉美各国的经济仍在原地踏步。我不喜欢发展中国家这个词,可南部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里的经济增长比它们 70 年代的还要低。它们在人民福利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状况。

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大不如前,近二十五年的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资本投入的发展速度比前二十五年更为缓慢,许多经济学家分别称之为“沉闷时期”(leaden age)和“黄金时期”(golden age)。当然这二十五年来美国经济仍有增长,可增速下降了,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到了增长的利益,对于大部分不属于管理阶层的工人,他们的名

义工资下降了10%或更多,实际工资的减幅就更大了。

这段时期的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没有为大部分人造福。美国人目前的中等收入水平(按人口来算)仅仅与十年前相当,比二十到二十五年前要低得多。这还是在在一个经济发展势头相当好的时期,用经济学家们的话说是好得出奇。可只有近两三年的经济发展能与50年代或60年代相比,然而,即使在那个历史性的繁荣时期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分享着利益蛋糕。

国际经济安排,即那些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是用来维持不平等现状的,它们巩固了一个“弹性劳动力市场”(flexible labor market),也取消了劳动者所有的安全保障。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提到这种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时指出,它是这个童话经济时代的特色之一。那些冠名为自由贸易协定的东西使人们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在这个所谓的弹性劳动力市场里,人们都害怕失去工作,所以无法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工资待遇。

世界银行明确支持弹性劳动力市场。世界银行认识到,所谓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只不过是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寻找到了一个婉转的代名词,因此这一说法被广为诟病。而这正是其真正的意涵所在,因此它变得恶名远扬也纯属应当。但是世界银行的一份发展报告却称它放之四海皆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改革<sup>⑤</sup>。该报告还呼吁取消对工作流动和工资浮动的限制。

弹性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什么呢?它并不意味着工人们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比如墨西哥的工人能去纽约工作。它意味着工人随时可能

会被雇主踢到一边，它取消了对资方随意开除工人的限制。

人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高消费和巨额债务也许能掩盖部分事实，可有一件事是掩盖不了的，即人们比二十五年前工作时间更长了，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马萨诸塞的那些州立大学和学院的情况如何？那里发生了什么？

那里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举行抗议的学生多半出身于贫民或工人家庭，许多人是外来移民或少数民族等等。尽管他们大部分人都属于白人工人阶层，还有机会通过当护士或警察等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不像那些贵族学校的学生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我认为不仅是他们的行为，甚至他们的思想都受到了管束。当然他们的学校面对的压力也很大。

怎样的压力？

我认为某些官方机构正设法削弱那些给穷人和工人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州立大学。这些学校的录取标准被提高了，同时那些 K-12 级的公立学校的水平却没有得到提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符合条件的考生减少，从而导致州立大学的生源越来越少。



事实上,近一两年来州立大学录取的新生大幅度减少。如此下去只能再由州议会和商人来经营这些大学,他们则会要求削减教职员,如此一来,又将减少学生到州立大学学习的机会。这样一来弹性劳动力市场机制就被引入了院校,使得大学教师们也失去了工作的稳定性,学校招生率就会进一步下降。

因此按未来的趋势,美国的州立大学将会减少甚至可能消失。到那时,穷人或工人子弟要么一年交上3万美元的学费上私立大学,要么干脆放弃上大学。

现在正是选举季节。投票及其预期结果会如何,请再谈谈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如果非要总结出一条规律,那例外情况也将非常多。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低位的决策(decision of low-order significance)。第二条原则也许就是:在代议制政体中,在低层施加影响的意义较大。因此,投票选举一位众议员就比投票选一位总统意义大得多,因为来自公众的压力通常在低层的作用比较大,当然来自个人的压力也是如此,这里面复杂的因素较多。

拉尔夫·纳德宣布他已加入绿党(Green Party)的候选人名单,成为总统候选人,您对此事有兴趣吗?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要回答它就必须考虑处于低层的极难以预测的因素。支持拉尔夫·纳德的选票必然是表达抗议的,这一点谁都知道。那么选他和投票选一个获胜几率更大的候选人哪一种更为有利呢?新党(New Party)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即推出联合候选人(fusion candidates)。选民可以选纳德,选新党或是劳工党(Labor Party),让你的选票算在你所支持的真正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头上,比如说一名民主党人。然而新党在最高法院这一层被击败了,不幸使选民失去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选举对象。

纳德说他帮助选民们在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之间作出更好的选择。这么说恰当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恰当的,除非他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他不会赢得竞选。选择投他一票就等于放弃了其他的候选人。如果人们本来不打算投任何人的票时,因为被打动而投了他一票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可如果有选民在他的说词的影响下转而投他的票,那结果是好是坏就很难说。因为仅凭演说或宣传稍微动听一点就作出选择,其结果未必正确,而事实上也往往是错误的。

在墨西哥新一轮的国会竞选中,绿党的候选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结果右翼共和党赢得了竞选。

这样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假如根本就没有右翼共和党,国家的政治格局将会怎样?有时候答案很明显,但有时候就很难说。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68年的总统竞选是在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展开的。我找不出理由来支持汉弗莱,可我也没投尼克松的票。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感觉也许是正确的,在平息印度支那战争方面,尼克松当选总统也许比汉弗莱要好一些,因为换成民主党执政的话战争可能会拖得更久,尽管他在印度支那也采取了十分可怕的措施。不可否认尼克松在国内做了些很糟糕的事,可他毕竟是最后一位真正开明的总统。

您的这些观点常令许多人吃惊。让我们谈谈互联网以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许多互联网用户都不知道,商家正在网上调查人们的偏好和兴趣。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影响颇令人担忧,但我看另有一个问题比这要更为严重,那就是互联网的导向问题。媒体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兼并,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威胁:大型网络集团公司将有能力将互联网的浏览者们导向某些特定的网站,以实现它们的利益,从而将一个信息与交流的媒介变成购物服务的世界。

传媒批评家诺曼·所罗门(Norman Solomon)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互联网还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当时被称

作“信息高速公路”。<sup>⑩</sup>而到了 20 世纪末,当它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被赠送给私营企业后,就变成了“电子商务”(e-commerce)。

公司合并后形成的企业集团,如美国在线(AOL)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能够通过技术手段使你登录到它们想让你看的网站,而不是你所想看的网站。这种现象很危险,互联网是用于传递信息,进行沟通、组织和联系的强大工具。很显然商业机构在得到这个工具后正试图改变它的性质。果真如此,那么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这与人们所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两码事吧?

尽管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彼此却互不相干。

您曾经将互联网形容为“致命的武器”。有人曾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网上,还把您的名字也带上了。

的确有那回事,后来那篇文章还被摘下来印成了文字。什么丑陋的事都可能发生。

难道这不会导致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监管吗?

的确如此。但让我们着眼长远来看看这一问题吧。如果《纽约时

报》的一名专栏作家想写一篇愚蠢而粗俗的文章来抨击我，那谁也阻止不了他，因为报社的编辑不会给我丝毫回击的机会。<sup>①7</sup>

然而这些事如果和我们谈论的其他问题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它们只涉及个人恩怨。尽管这样的事情不应发生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但实事求是地说，同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相比，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本周六，您将在位于阿尔伯克基（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译者）的一个能容纳 2 300 人的大礼堂发表演说。入场券已经抢购一空，可最近几天仍有全国各地的听众给我打电话要求买票。

我知道你是我的代理人，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气有这么大。（笑）

您为“半球间资源中心”（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做了件好事。它们自己没有做多少推广工作。而事实上，只需在当地“食品合作社时事通讯”上提一下，就足以将它们《会议中心》（*Convention Center*）一书售空。

进行推广就应当用这样的方法。该中心有着很好的出版发行记录，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最近它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全球焦点》（*Global Focus*）的书，里面有许多我们讨论的问题。<sup>①8</sup> 比起为

某次讲话做宣传,这种积极的行动更值得为之投入精力。

如果您能把跳投练好的话,我们就能做一档完整的节目了。

我孙子正在练习这个。





# 第六章

## 冲破禁锢，解放思想

2000年4月10日于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市

今天早晨在来列克星敦的路上，我看到了许多独立战争时的民兵雕像，而更令我注意的是各种街道的名称，如亚当斯(Adams)、朝圣者(Pilgrim)及汉考克(Hancock\*)。诺姆·乔姆斯基，一名深谙美国文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也居住在这里。

一星期后，这里将为爱国者日(Patriots Day)的到来举行一次持续数天的大型纪念活动。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在这里回顾列克星敦战役，届时人们会穿上民兵的服装模仿当时的情形，从康科德(Concord)撤退到波士顿。当年，民兵们奋力击退英国士兵，有四人在

---

\*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译者

其中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个壮观的场面就来看看。

无疑将由您来主持那场典礼。

我们每年4月19日早上6点就去了。许多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活动。

很多人不知道您的教名其实是阿夫拉姆(Avram),那是什么时候改的?

在我记事之前就改了。我父母说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决定给我换个名字,因为他们不喜欢别人都叫我艾比(Abie)。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名放到姓的位置上了。

艾比是诺姆的昵称吗?

不,是阿夫拉姆的昵称。阿夫拉姆就是亚伯拉罕。

阿夫拉姆在希伯来语中是写成 No-am 的吗?

是的,不过不要告诉别人——它的意思是“和蔼可亲”(pleasantness)。

显然您父母发现了这个名字的可笑之处。您曾告诉我您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以为您是女的。

有一次为某个原因我必须出示我的出生证明，于是我写信给费城市政厅索要，并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可在出生证明上我的名字被铅笔划去了。有些职员不相信那是我的名字，于是就自作主张地把诺姆改成了诺米(Naomi)，对此我表示理解。他们还把阿夫拉姆改成了阿夫拉恩(Avrane)，我估计可能他们觉得女孩的名字怎么取都行，可男孩就得叫约翰或是汤姆之类。还好他们没把我的性别改掉，我还是男性。

我常怀疑那会不会是我一直都没有被征召入伍的原因，尽管我的测试成绩十分优秀。我推迟了几周才拿到哲学博士学位，本来我是不想拿的，可当时这是我推迟几周上朝鲜战场的最后机会了。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征兵令，可能又有人在看我的出生证明时把我当成女生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您应该是22岁左右吧。

那是1955年的事。

自从您被改名为诺米后，就不断有人弄错你的性别。

很多发给我的垃圾邮件都是发给诺米的。人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谈谈您的父亲威廉吧,他是一个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您对语言及语言学最初的兴趣是否源自于他?

我很小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大约十多岁时,我读了他的博士论文的校样。这篇论文诞生的时间比较晚,因为父亲是从别国移民美国的,他开始在一个血汗工厂工作,后来通过奋斗上了大学。那篇论文研究的是中世纪希伯来语语法学家戴维·金希(David Kimhi)的理论。我还读了他的其他一些文章,研究的对象包括闪米特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历史。

您也教过希伯来语,是吗?

首先,那曾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得吃早餐一样。在我进大学之前,我们就以此为生。当时卡罗尔(Carol)和我都在家里生活和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教希伯来语,组织希伯来语团体和青年组织,但却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做这个。结婚之前我们一直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从没考虑过经费问题。

你们结婚后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吗?

结婚后我们住在离家很近的一间小公寓里。

是在费城吗？

是的，那间公寓真是无法形容。我记得它的前门无法合拢，因为地板是倾斜的，门的一头贴着地，另一头则离地有6英寸高。屋子里的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是这样。

现在您有好几个孙子了。您有没有留意过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现象证明甚或推翻了您的语言习得理论（language acquisition）？

你怎敢认为我的理论会被推翻？（笑）我的一些孙子的成长历程很有趣。他们有两个生活在尼加拉瓜。小孩子总是倾向于模仿他们同伴的语言，而不是父母的语言。比如说，我的英语不带有我父亲的俄语腔和我母亲的纽约口音，而是费城东北某区的口音，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的那些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孙子们说的也不是他们父母的语言，他们说的是一种街头语言，这是正常现象。那些生活在尼加拉瓜的孙辈们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了，那个稍大的一个生活在有两名北美女性的家庭里，她们俩相互说英语。孩子的父亲当时不在家里，而我的女儿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尼加拉瓜西班牙语，打电话时常被人误

认为是尼加拉瓜人。家里的另一个女子收养了一个尼加拉瓜流浪儿,这个小孩当然只说西班牙语。自从1990年这个国家恢复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后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流浪儿。

我孙子把这个被收养的小女孩看作他的姐姐,于是学她和其他街头流浪儿说西班牙语。我女儿希望他学习英语,就同他说英语,可他却用西班牙语回答。结果他曾一度听不懂我们的语言,还努力教我怎么说西班牙语,告诉我如何正确发音。现在他终于能流利地说英语了,可说出的是带着西班牙口音的书面英语。

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妹妹,他和他的妹妹同我女儿说话时都用英语,和我女婿说话都用西班牙语,相互间用英语交流。他们所处的语言环境,当然主要是学校,使用的则是西班牙语。我的小孙女能说英语,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双语者,能自如地将两种语言相互对译。她还会用英语问她母亲如何用西班牙语说一段话,她好去对她父亲这么说。这个小女孩现在已均衡地掌握了两种语言。

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很正常的,但是其过程却十分复杂。小孩子并不从他们父母那里学习怎样说话,当然父母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些现象是否证实了您的一种观点,即大脑有特定的区域和结构负责语言习得?

你可以这么说,但这些只是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相比之



下,已有真正的科学实验证实了我的观点。

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即传授与灌输的问题。作为一个教师,您是如何使您的学生会独立思考的?能传授一下您的办法吗?

我认为人们是通过实践进行学习的。我信奉哲学家杜威的观点,即人从童年开始就通过体验和阅读进行学习,通过观察其他人怎么做学会做事。例如,优秀的木匠和物理学家都是这样学习的,没有人能训练你如何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课堂上也没法讲方法论。所以典型的研究生科研小组应当是一起工作的几名科研人员,同几个工匠在一起打造一件工艺品并没有太大不同。

正确的做法不是告诉别人你是正确的,而是启发他们通过独立思考找出答案。在但凡与人有关的事务中没有什么是能下定论的,甚至在自然科学里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研究人类问题、国际问题、家庭关系等等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列举事实,然后以某个方式加以分析。撇开某些人的做法不谈,正确的教育方法就是鼓励人们按照上述方法去思考。

特别是,要设法让人们看到那些世上公认的东西同它们背后的事实及人们的质疑之间的差异。我得到的一个通常的反应是,我不能相信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它完全同我所学到的和始终认为的相冲突,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查看所有那些注解。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理?

我会告诉学生们他们的反应是对的,不去轻信也不必去费时验证别人的话是否正确,拒绝任何人的灌输,要自己去寻找真理。

我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观点是:我又不是乔姆斯基,我没有他那样的资质。我得朝九晚五地到洛根机场工作,我得还贷款,我没法拥有他那样的本事和机会。那么要拥有您所说的能力需要特别的天赋吗?

不需要特别的脑子,但需要特别的条件。那些人说得对,他们不具备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缺少必要的资源、培训、时间以及选择生活的自主权。我一周工作一百个小时,可那是我的选择,也是一件难得的奢侈,很少人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更别谈培训和资源了。所以要完全靠自己做到这些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夸大这种困难,许多做得很出色的人也并不具备那些条件。首先他们具有某些优势,即没有经历过正规教育,也就是没有被灌输过大量的观念,因而他们的思想可以不受禁锢。所以说,置身于条件优越的体系之外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但我们还是得承认,这些为了养家糊口一周工作五十个小时的人的确没有我们享受的奢侈。

这正是人们走到一起的原因。为了促进工人的教育,各种团体成立了起来。在这些社团里,人们相互激励,相互学习,共同了解世界,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像文学、历史、科学、数学等等。为人民群众写

的一些伟大著作出自一些左翼专家之手,这些著作在工人的教育中受到了广泛欢迎。

一些个人难以做到的事可以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完成。事实上最为尖端的科学领域都是如此。绝大多数项目都要靠团队协作,不可能靠单枪匹马。团队成员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和质疑彼此的想法,而且学生通常可以起到积极和关键的作用。对于工人社团同样如此。

统治集团里常有些人有意阻止人们走到一起来,目的是扼杀交流和学习。我最喜爱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位歌手唱道:“我们不能去和邻居讨论”。<sup>①</sup>只要我们不能与邻居讨论,我们就会相信我们的生活很快乐。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千万不能让人们去找他们的邻居交流讨论,这一点十分重要。

那位歌手是谁?

他就是 T-Bone Slim。

您以前爱听他的歌?

我读过他的歌词,但我不怎么喜欢听歌。

让我们来具体谈谈如何从那些正统观点,比如人道主义干预的禁锢里解放自己的思想。

人道主义干预是一种正统思想,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人道的,因为领袖们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人道主义干预的历史来审视这种观点,结果你会发现所有的武力干预都被冠上了“人道主义”的名号。

近期对人道主义干预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由肖恩·墨菲(Sean Murphy)——《美国国际法杂志》的编辑——做出的。<sup>②</sup>墨菲指出在二战爆发前的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就否定了战争的合法性。从那以后至1945年签署联合国宪章期间共发生过三次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的战争,它们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华北、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它们都被冠以高尚的人道主义目标,而且是些往往听起来并不一定错的借口。即使是最无耻的行为也常常含有真理的元素,它们的借口可以同其他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一样动听。

有趣的是美国对这些人道主义干预的反应。这一部分来自于公开的信息,另一些则源于部分解密的内部资料。总的来说美国采取的是绥靖政策,但这么说多少有点误导,因为听起来美国似乎只是向那些暴君屈服而已。而事实上美国给予的更多是支持。每当关键时刻,美国国内的批评往往基于非常狭隘的理由。

所以,对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三十年前我曾针对这些事件写过评论文章,因为这都有公开的记录——美国官方的态度是不支持,但只要美国在华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得到了保护就无所谓。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是罗斯福政府的重量级人物约瑟夫·

克鲁(Joseph Crew),他对“中国沦落在日本的铁蹄下”这种说法嗤之以鼻。那时候日本在中国犯下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克鲁却说问题在于日本没有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否则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同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还说,只要日本保护美国的在华商业利益,那么美日就能达成暂时的妥协。那样的话,即便日本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人也不要紧。<sup>③</sup>

美国对意大利的行为也抱有同样态度。国务院热烈赞美墨索里尼在提高意大利民众素质方面的惊人成就,及其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赫赫战功。这一切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而当时距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已有数年。罗斯福本人也曾称赞墨索里尼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意大利绅士”。他还在1939年称赞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革命,说要不是希特勒玷污了法西斯主义,它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sup>④</sup>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批判罗斯福,因为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在1938年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后,美国又做出了什么反应呢?罗斯福的一个主要顾问A·伯利(A. A. Berle)声称美国不必为之感到紧张,大不了让奥地利帝国在德国的统治下换换血。而国务院私下里甚至支持希特勒,原因十分有趣:他们认为希特勒是纳粹党温和派的代表,既不偏左也不偏右。1937年,国务院欧洲司认为法西斯“必须胜利”,否则“像俄国革命里那些对生活不满的公众”和“觉醒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激进派”,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sup>⑤</sup>

请注意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没有人会担心遭到俄国的侵略。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对独裁者的评价:他们立场比较温和,不属

于激进派,所以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否则结果会极为糟糕。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助手、自由派历史学家阿瑟·史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叙述,肯尼迪也是这样评价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他说,我们不喜欢特鲁希略,因为他是一个暴君,一个杀人狂,可只要卡斯特罗还在我们就得支持他。⑥

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不会有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物存在。让我们来看看当年美国人是怎样评价卡斯特的。已解密的数据显示,肯尼迪曾打算把战略重点放在拉丁美洲。所以他派人对拉美进行了一番调研,其中就包括史莱辛格。史莱辛格向肯尼迪汇报了调研结果,谈到古巴时他说,古巴的问题就在于“卡斯特罗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念传遍到整个拉美”。⑦他后来解释道,由古巴革命产生的独立信念对于那些与古巴人民境况相似的,同样生活在贫穷、苦难与压迫之中的拉美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就是古巴的威胁所在。

他还谈到了苏联的威胁,他认为:“苏联在我们的两翼徘徊,四处抛撒发展援助贷款,并炫耀它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成就。”⑧这些就是古巴与苏联带来的威胁。美国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国务院会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希特勒,以及所有其他类似支持的原因。这种威胁源于榜样的作用,或可称之为病毒效应(virus effect)。一个民族独立后会有其他国家群起效仿。事实上

---

\* 特鲁希略(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投靠美国,残暴屠杀本国同胞。1930年发动政变,任总统,有“加勒比狼狗”之称。——译者



越南战争也是这样爆发的。

有一篇关于尼加拉瓜萨莫查(Samoza)的评论,据说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撰写的。

萨莫查也许是一个混蛋,可他是美国的混蛋,那篇文章应该不是罗斯福写的。当然这种意识是正确的。<sup>⑨</sup>

谈到纳粹德国时,它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曾说道:“在充分了解宣传对象的心理的基础上,通过重复足够多的次数来使他们相信方的即是圆的并非不可能。可以通过改造语言来掩盖事实真相。”<sup>⑩</sup>

我们有必要记住他是从哪儿学到这一套的。我们再来看看人道主义的干涉,显然,我们不能因为轴心国的法西斯分子用它来掩盖自己的侵略行为,便全盘否定所有其他的人道主义干预。这里面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应该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戈培尔和希特勒都是受了民主国家的启发才想到这一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成功的宣传工作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中明白了德国失败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那些民主国家的宣传攻势面前,德国不是对手。

英国政府设有一个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这是奥威

尔式的称谓。按照英国领导人的说法,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控制整个世界的思想,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英国必须把美国拖入战争,否则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必须迎合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争取他们的支持,结果它做到了。

如果你知道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信徒们是如何向公众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么我将很遗憾地告诉你,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也有类似的现象。二者都充斥着自我吹捧、赞扬战争发动者的英明。杜威一伙热烈地支持威尔逊发动的战争,尽管民众的态度与他们并不相同。威尔逊是通过一项和平主义的纲领赢得竞选的。他的口号是“要和平不要胜利”。可结果正是他利用宣传手段,成功地使整个国家很快感染上了狂热的好战情绪。

然而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进步人士却在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杂志上,例如《新共和》(*New Republic*),公开表示他们为这场战争而倍感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信念而战,而不是为了征服和经济利益,这次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凑巧的是,我们在科索沃战争中也听到了同样的论调:这是第一场为了信念和价值观而进行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睿智的国家。我们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自吹自擂的言论,仿佛又回到了一战时期。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广泛流传着有关南斯拉夫人的种种暴行,如撕下比利时人婴儿的胳膊等。同大多数宣传行为一样,这里面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可大部分内容则是捏造出来的。

事实总是远不如人们说得那样好听,它与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并

不一致。但是却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抵制这些虚假的宣传,其中有一人名叫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伯恩曾经是杜威圈子里的一员,但他在圈子里却饱受排挤,原因就在于他说了真话,揭露了一战的真相和威尔逊的真实目的,而真话在这里是不被接受的。历史上人们在知识和道德上对那些所谓正统思想的保护一直都很相似。对于正在思考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人,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英国设立了信息部,相应地美国则拥有一个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亦即所谓的“鱼篓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其成员包括沃尔特·李普曼和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这些自由派人士。伯奈斯进而创立了公共关系产业。他们都对当年崇尚和平的人民迅速变成反德狂热者记忆犹新。宣传机器的确十分有效。

一些组织深受宣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进步知识分子团体,这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美国富有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背景。它们为美国现代政治学、公共关系和大众传媒奠定了基础。它们发现李普曼所说的“民主的艺术”就是愚民政策,正如伯奈斯所言,我们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军队能控制士兵的躯体一样”。<sup>①</sup>而且“我们应当这么做,因为我们是聪明人,不像那些愚民那么蠢笨。为了他们好,我们得控制他们。而且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

---

\* 伯奈斯,美国著名公共关系专家。他于1919年与其妻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公共关系咨询公司,开创了美国的公关业。——译者

我们有了了不起的宣传技巧”。而伯奈斯的大作就叫《宣传》(Propaganda)。<sup>⑫</sup>

企业界领袖与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宣传的影响。企业领袖们说的话同样赤裸裸：我们必须给人们灌输一种“浅薄的哲学”，让他们只关注“生活最表层的东西，如时尚消费”，让他们追逐那些“虚构的需求”，即我们为他们创造的需求。这样他们的精力就会被耗费在那些需要上面，也就不会有人来干扰我们了。如此下去不难想象几年后的情形。

上面所说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工业革命时代就有了，只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而已。国家拥有庞大的机构，专事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更令人惊讶的是，民主国家的这类机构更为强大，因为在民主国家不能用武力镇压民众，只能通过控制思想来统治人民。使用武力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使民众能够得到控制或是被边缘化，按李普曼的说法就是要使人民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就必须得依靠宣传机器。<sup>⑬</sup>这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很好理解，它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时候。

我没想到杜威是主战派。

杜威是死硬的主战派，经济利益是他主战的原因。他说战争是施展实用主义智慧的舞台，那正是我们的专长。他还说，我们是聪慧的

实干家,我们能控制社会,管理社会,而且我们应当这么做,因为我们更加优秀。他对所谓的和平主义极端蔑视,因为在他眼里那是不可理喻的。他认为,只要使用暴力能带来好结果,那么使用暴力就是好事。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可听起来却令人作呕,我根本不屑于同他辩论。

他所说的好结果就是实现英国宣传机构的目标,通过这些机构给他们戴高帽,向他们自己及其他人灌输荒唐的言论和歪曲的事实,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美国是否应该参加那场战争值得商榷,可那帮知识分子自吹的智慧无疑都是鬼话。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自我吹嘘的话也出现在刚刚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直至去年,这样的浮夸现象还十分盛行,尽管不如战争时期那么集中,而且我也不记得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记得也就是在去年,瓦卡拉夫·哈威尔(Vaclav Havel)对我们解释说:我们史无前例地为“原则与价值观”而战。那些在人权问题上保有良好声誉的一流法律专家也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声称,我们这个“明智的国家”必须创立新的、现代的正法法则并实施它们,抛弃那些陈旧的法规。<sup>⑭</sup>这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科索沃战争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持强硬的主战态度。

宣传机器主要的策划者与牺牲品都是知识分子,这直接关系到

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如果要弄清楚某国的某个行动究竟是否属于人道主义干预,那么首先要考察的就是该国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记录以及过去的所作所为,然后才是具体分析该行动。如果要确定轰炸南联盟是不是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就得弄清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人道主义,其结果是否符合人道主义。无论这个国家过去的人道主义记录如何,都要分析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行动是否合法,这正是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容易忽视的,他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完全是基于其自己的价值标准。

对战争的目的和动机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后,你就会发现事实与宣传者的说辞恰恰相反。轰炸南斯拉夫是为了向其施加暴行,而不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宣传机器却拼命地向公众传递相反的信息,但据我所知,它们拿不出任何可靠的根据,只是向人们灌输他们的教条,并要求人们相信。

对当时发生在东帝汶的重大暴行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历史在一些人手中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被改头换面了。从《美国国际法杂志》到左派人士圈子,到处都有人在用他们的那一套标准为战争正名。无论你多么反对科索沃战争,都会有人挖掘它的好处:至少那场战争为在东帝汶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开了先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也算不错,可问题是东帝汶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预。英美两国政府一直都在支持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行动,直到他们在那里犯下了滔天罪行。而克林顿宣布允许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已



经是在印尼军队全部撤出之后的事了。那还能被叫做人道主义干预吗？

您能详细讲讲那里发生的事吗？

简单地说是这样的。正当英美策划轰炸南斯拉夫时，以印尼特种部队“考帕萨斯”为首的印尼援军进入了东帝汶。印尼特种部队因他们在东帝汶的野蛮行径而臭名昭著。而且凑巧他们又是一支经美国训练的部队——克林顿的“钢铁平衡”计划(Iron Balance)恢复了美国对外军事训练。由于该计划触犯了国会颁布的法令，因此始终是秘密进行的。直到目前官方仍没有将它公开，可国际传媒已将这一事件在英国和加拿大曝光，但据我所知，目前它在美国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印尼军队于1998年11月进入东帝汶，之后不久屠杀就开始了。1999年2月前他们进行了所谓“清扫行动”(Operation Clean Sweep)，目的显然是恐吓东帝汶人民，以防他们在可能进行的全民公决中选择独立。这种企图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sup>⑮</sup>

为了防止东帝汶在全民公决中选择独立，1999年初，印尼军队不断升级在东帝汶的暴行，其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科索沃的种族仇杀。1999年1月，科索沃发生的拉卡克(Racak)事件屠杀了45人，而仅在东帝汶利基卡省(Liquica)的一座教堂里，便有60名或更多的避难者被杀害。目前已有西方国家的调查人员在现场报道此事。此外，据西方媒体透露，拉卡克屠杀是相当孤立的一个案例<sup>⑯</sup>，而利基卡教堂案

却只是发生在东帝汶一连串屠杀行动中一例而已。

由于现在许多文件都被公布了出来,我们可以详细了解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来源包括美国国务院、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以及科索沃局势核查组(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观察员等。当你读到这些文件时你肯定会感到吃惊,因为你会发现在轰炸南斯拉夫前的几个月里,发生在那里的暴力活动一直较弱,而且双方互有攻击行为,只有拉卡克事件是个例外。另根据这些文件的记载,塞族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相互袭击,肇始于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的科索沃解放军(Kosovo Liberation Army)杀害塞族警察及平民事件。而且科索沃解放军公开宣称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激起塞族方面的报复,从而引起广泛关注,为西方的军事干涉提供口实。

东帝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占领者是一支外国军队,对这片土地不享有丝毫的主权,只有英美在暗中予以支持。这支军队在英美外交与军事的支持下,屠杀了东帝汶三分之一的人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约仅根据自己的理由,坚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而并非包括英美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内的外国侵略与屠杀的牺牲品。

东帝汶发生的军事冲突十分有限,为数不多的抵抗力量被围困在山区,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印尼军队及其组织起来的民兵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东帝汶教会是当时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sup>①</sup>据教会介绍,在1999年的前7个月里,共有3 000至5 000名东帝汶人被杀害。而北约轰炸南联盟前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仇杀事件与此

性质完全不同,被害人数也少得多。

此外,在东帝汶有数万人被赶出了他们家园。印尼军队还露骨地宣称,如果8月30日的全民公决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将继续大规模的杀戮行为,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很难想象美国的情报机构会对此一无所知,连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都已掌握了这些情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媒体了解大量的有关细节。任何想了解事实的人都能轻易找到相关信息,要知道那些罪行的一部分主要责任应由我们来承担,如果我们仍然对所发生的事熟视无睹甚至还予以支持,那么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毕竟那些只是1999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事情。

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暴行还在继续。8月30日的公投结果令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惊讶不已。东帝汶人民面对印尼军队的恐吓、屠刀与种族清洗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投票,其中80%选择独立。几天后,印度尼西亚人兑现了他们的恐吓。据联合国消息,东帝汶85%的人口约75万人被逐出家园,其中近25万人被赶进了印尼和西帝汶的集中营,其余的人则逃亡到山区,在那里他们中大部分人眼看要饿死。几乎整个东帝汶都被破坏殆尽。

道·琼斯公司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不是属于左翼的那本杂志)过去十分关注苏哈托和印尼军队的动态。该杂志报道了东帝汶最弱势的群体:大批的老人和儿童正死于一些可预防的疾病,原因在于印尼军队将尸体和毒药投入水井之中,从而污染了水源。事实上,印尼军队已基本毁灭了这个国家。<sup>⑬</sup>

那么在此期间美国做了些什么呢？它所做的就是反复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即不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即便在9月8日它还是这么说，那时最严重的暴行已经在东帝汶发生了。而同时五角大楼宣布美国与印尼的联合军事演习已于8月25日结束，那是在东帝汶全民公投5天之前。演习旨在训练印尼军队维护人权和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能力。听起来这真是匪夷所思。

请注意我们所谈论的只是印尼军队在东帝汶所有暴行中的最后部分，早些时候他们曾在美国的帮助下屠杀了大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东帝汶人。美国政府却很文雅地表达了它的立场：“我们在东帝汶没有竞争对手。”然而到了9月10日，他们却不得不承认在那里有一个“很强大的对手”，那就是澳大利亚。<sup>①9</sup>

澳大利亚的确向东帝汶派出了军队。

澳大利亚民众对发生在东帝汶的暴行感到义愤填膺。他们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并号召美国也加入进来。克林顿委婉地回绝了澳大利亚的请求，只是一度中止了与印尼军队的军事交流，并停止向印度尼西亚派兵，而令人吃惊的是，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向印尼增兵。印尼方面的反应十分戏剧化，仅仅一天前，他们还声称东帝汶属于印度尼西亚领土，不许别人插足。时隔仅一天，印尼将军们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表示游戏结束了，他们也该撤走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幕后给他们撑腰。

直到印尼军方宣布撤出时,维和部队才获准进入东帝汶,这时所有的后果都已无法挽回。随后,美军在东帝汶所做的是坐看躲藏在山区中的50万平民饿死,只有澳大利亚向他们空投了食品。美国空军能够精确打击民用目标,能在反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中轰炸诺维萨德城,却不肯为那些拜美国所赐被赶入深山的东帝汶人空投一些食物。

有趣的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派人士提出为山区的东帝汶人空投食品。过去六个月里,他们一直陶醉于志得意满的飘飘然感觉之中。现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为什么不向那些山里的东帝汶人空投一些食品,他们是被我们赶到那里的。另外,还有数十万东帝汶人被关押在西帝汶的集中营里,那里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称,西帝汶集中营是世界上惟一不让他们自由进出的难民营。而当他们和红十字协会偶然有机会进去时,里面可怕的条件使他们感到震惊,许多人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美国发表了几个声明,但时至今日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20世纪末人类社会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之一,从1975年直至1999年9月,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都应负直接责任,也应当给予东帝汶人民以巨大补偿。

因此,在东帝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人道主义干预,只是澳大利亚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迫使其政府采取了行动,而美国和英国却从一开始到罪恶走向高潮,一直在支持印尼的暴行,还被它们那些负责的知识分子自称为开明的国度,而两国政府首脑就是这场暴行的

主犯。这件事让真正负责任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人道主义干预,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事原则与价值观。

美国在对东帝汶和科索沃事件的处理上有着显著的不同。

是的,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扩大。科索沃战争一结束,北约部队马上就违反和平协定进入了该地区。撇开这个不说,随后又有大约数千名刑侦专家立即到那里展开调查,企图挖出一些塞族人罪行的证据。这是一种可笑的逻辑,因为能证明的暴行越大,北约在那里犯下的罪恶就越深。

假设没有一个人被杀害,那轰炸的理由就能成立,因为它保护了百姓;而如果有一百万人丧生,那只能说是轰炸促使了这种暴行的发生,北约犯下了一宗巨大的罪行。然而由于宣传机构的渲染,这个逻辑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他们所声称的逻辑是:如果北约轰炸过后发生了暴行,且暴行明显是轰炸引起的,那说明轰炸是正确的。这种荒唐透顶的逻辑却差不多被普遍接受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主战者想要人们看到战争引起的大量暴行,相反主和派却希望人们看到战争导致的暴行最少。除非我们能接受引发罪恶的行动是正义的,否则谁能理解这样奇怪的现象。多么令人吃惊的宣传!

同科索沃境内警探云集的状况相比,东帝汶的联合国人员却疾呼需要刑侦专家,因为他们被滞留在了国内,只有极少数同澳大利亚



军队一同进入了东帝汶。那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不断地提醒世人，如果11月雨季过后还没有刑侦专家赶到，那么所有的证据都会消失。因为东帝汶地处热带，又是个穷国，雨季会把残留在那些小村庄里的罪证都冲刷干净，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刑侦专家被派往东帝汶。

据说刑侦专家是1月底进入东帝汶的，由于那里的新闻报道不畅通，我没有听到他们前往的确切消息。可即使他们去了也于事无补，因为一切为时已晚。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发生在东帝汶的罪行绝不能为人所知，因为只有这样，政府的逻辑才天衣无缝，如果证据被传扬开去，就会有人发现真正的罪人就在华盛顿和伦敦。

那么关于战争罪法庭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人提出将屠杀东帝汶人民的刽子手送上战争法庭审判？

这个问题相当有趣。在塞尔维亚，英美在战火还没有熄灭时就要求把他们的敌人送上法庭，所以1999年5月国际法院起诉了米洛舍维奇和其他一些战犯。无疑英美起诉的罪名是准确的，因为他们第一次将秘密情报都作为证据提供给了法庭。秘密情报通常是非常准确的，而如果在轰炸之前就将这些情报传扬出去，则会对北约军事行动造成损害，由此可见英美两国起诉战犯的迫切心情。而我确信它是准确的。

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读一下起诉书就会发现，南联盟官员被指控的罪行几乎都是在轰炸开始后发生的，只有少数例外情况。美国国

务院为这场战争正名的材料也是在战争开始后完成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如此。为了配合宣传攻势,英美两国不惜在战争结束前就将有关的高等级机密公诸于世,以使起诉能够成立。

东帝汶情况又如何呢?联合国使团要求在那里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印尼战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搁浅了,原因很简单,这属于印尼的权限,建立起来的也只能是一个印尼的法庭。

事实上确实有一个诚实的印尼检察官和一个印尼人权组织曾努力组成了一个法庭。与我们的媒体所报道的不尽相同,印尼法庭称它不仅关注东帝汶全民公投之后的战争罪行,还会调查在此前发生的事情,至少也会将它们公之于众。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就算有这样一个印尼法庭,它也不会去调查印尼军队在东帝汶公投前的所作所为的,也就是说,它不会触及今年早些时候的事,而那时科索沃战争还没有爆发。更不用说去调查二十五年前的陈年旧事了,而那段历史将会被永远尘封起来。即使有这样一个法庭和这样一名诚实公正的检察官也无济于事,不会存在任何深入的调查。

另外,东帝汶的首脑已经事先向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兰托(Wiranto)将军表示了谅解,所以即使他受到起诉,也早已受到宽恕。顺便说说,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受到可能的调查之前也得到了宽恕。这样一来,即使印尼战争法庭是由诚实的人来控制,他们想有所作为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调查将被局限在东帝汶公投之后,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个并非荒唐但却十分错误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没有时间来采取行动挽救东帝汶的局势。实际上在8月30

日之前,美国有的是时间,那时政府很清楚印尼军方的计划,可仍在支持他们。

这里想向大家介绍另一件事:就在两星期前,一位曾参与过东帝汶屠杀的印尼将军被国务院邀请来美国,可是他的喜庆日程却被美国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给打乱了。他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起诉他在东帝汶犯下的罪行,其法律依据是《外国人民事侵权索赔法》(*Alien Tort Claims Act*)。<sup>②</sup>这是一部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古老法律,现在为此事不得不再被重新起用。

对此事美国没有任何的相关报道,但印尼国内却对此进行了报道。国务院为这一次不体面的邀请四处道歉。我估计照惯例那家伙是溜了,否则他甚至可能会遭到指控和审讯,而且过去已经发生了几例这样的案子。不过这类事件并不适合炒作,因此报纸上鲜有报道。

战争法庭可能会出现,可它的审判对象和有关的新闻报道都将会是十分有限的,也不会触及到上层的主犯——英美,它们被审判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从二十五年前直至今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一直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在国内人们对此事的了解少得出奇。人们说得最多就是美国“忽视了那里”或是“做得不够”,没能有效阻止那场它自己积极参与的灾难。也许是我们已被越战的可怕经历弄得精疲力竭,或是“冷战”使我们无力插手此事。当然“冷战”这个理由适用于各类情况,不论多么不着边际的事都是屡试不爽的。

南斯拉夫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一种时髦做法是把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战乱都归咎于米洛舍维奇,美国人没有任何责任,也没有义务

去阻止或减轻那些战乱。这种观点对于任何严谨的学说理论或任何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都必须予以批判和鞭挞。

美国或北约是否采取了措施,收拾它们留在巴尔干半岛的烂摊子?那场战争除了造成直接伤亡外,还对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不论是在科索沃还是东帝汶,美国都拒绝承担任何重建义务,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如果对二者进行真实的调查研究,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总体特征截然不同,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

举例来说,在科索沃,美国拒绝清理广泛分布的未爆集束炸弹,这是一种战争罪行。塞族人因使用带有集束弹头的导弹而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北约却可以逍遥法外。美国更是无须负责清理,给予科索沃的帮助也少得可怜,把整个烂摊子留给了别人。我们只负责轰炸,却不肯提供任何帮助。

东帝汶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美国只向它们提供了极少的援助。克林顿还提出削减那里为数不多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尽管他们正在那儿收拾我们留下的残局。他的提议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被通过了。这就是美国以它的原则与价值观所开启的一个崭新的人道主义干预时代。青睐于人道主义干预的人们应该来好好看看。

我们来谈谈此刻正在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境内发生的事,土耳

其政府参与了对库尔德人的种族清洗。

今年4月1日,土耳其军队对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发起了新一轮扫荡,其中一个地区在克林顿时期就遭受过种族清洗和其他暴行,这些行动都有美国在后面给撑腰。土军扫荡了3500个库尔德村庄,使数百万库尔德人成为难民。土耳其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春季扫荡行动,土军目前正在进行的一次扫荡越过了土伊边界,杀死了伊拉克境内的许多库尔德人。

正值现在土军扫荡刚刚开始之际,国防部长科恩与美国土耳其人协会进行会谈,盛赞土耳其出动F-16战机(这些战机是美国送给土耳其或土美两国联合制造的)执行轰炸南斯拉夫的任务,从而阻止了那里的种族清洗。现场气氛十分欢快,掌声笑声不断响起。当然这些战机也被用在北约境内的其他种族清洗行动里(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因此轰炸没有超出北约范围)。赞扬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轰炸阻止了那里的种族清洗和恐怖活动<sup>②</sup>,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土耳其的行为的确是穷凶极恶,它在伊北部地区的所作所为效仿了有美国撑腰的以色列,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安理会的命令置之不理,侵占黎巴嫩南部地区达22年之久。在此期间,以色列屠杀了大约45000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还将数十万人赶出家园。

科恩还在会谈中第一次宣布:为了表彰土耳其在阻止种族屠杀和恐怖活动中的突出贡献,美国决定让土耳其参与一个耗资数千亿美元的研发项目——由美土二国在土耳其境内共同研制一种先进的

战斗轰炸机。然而,尽管新闻界肯定知晓此事,却未发现有任何的相关报道。显然这是在研究人道主义干预时的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据您所知,人道主义干预有正面的例子吗?

如果你坦诚地面对历史记录,极难找到真正为了人道主义原因而使用武力的例子。事实上人类历史中这样的记录很可能为零。

如果你到庞大的国际法案例选辑中找一找答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里的确有一些案例,可它们的说服力有问题。比如1860年法国为保护黎凡特(Levant,即今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免遭穆斯林残害,向该地区派遣军队。可仔细分析一下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那其实只是奥斯曼帝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争斗罢了,目的就是争夺黎凡特地区。基督徒被杀害并不是导致军事干涉的真正原因。

据我所知,任何人道主义干预的例子都是虚假的,国家并不是道德的代言人,不会真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使用武力去维护人道主义。可能的确有些例子体现了人道主义,那只不过是因为武力有时在客观上能起到维护人道主义的作用,而它的初衷却并非如此。二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并不是人道主义干预,因为美国是在德国首先向其宣战,并受到德军攻击后才参战的。那场战争捍卫了人道主义,是我从儿时起就支持的。

战后我所知道的这类例子有两个: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印度入侵孟加拉国,前者除掉了柬埔寨暴君波尔布特,后者停止了孟加拉国国



内的暴行。可二者的目的都不是人道主义，只是客观上保护了人道主义，所以不能称为人道主义干预。在此，需要提请那些对美国的价值观及人道主义干预感兴趣的人注意的是美国对这两次行动的反应。

在战后，这是我惟一所知的两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对这两起事件感到震怒。越南为推翻波尔布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来自美国的极其严厉的制裁和中国的入侵（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同时，美国还给予波尔布特以外交上的支持。

印度受到了同样的待遇。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并以战争相威胁。为了惩罚印度，美国又一次想到了中国。国务卿基辛格计划秘密访华以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并打算取道巴基斯坦。那似乎是美国对印度的行动采取强烈反应的原因所在。

请注意这两桩事都与中国有关联，而在这两件事之间则发生了印尼入侵东帝汶事件。据说，美国必须支持印尼的原因就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看起来冷战借口运用得越来越灵活了。

此外还有一些类似事件，也起到了维护人道主义的效果，只是效果太不明显了。例如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并推翻了伊迪·阿明（Idi Amin）的暴政，可问题是继任的密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比起阿明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所以很难看出这样的行动有何人道主义价值。不巧的是，阿明曾获得过西方的支持，当然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想回头谈谈个人应如何行事，才能克服正统观念。史蒂夫·比

科(Steve Biko)是一名南非黑人领袖,他在狱中被实行种族隔离的白人当局杀害,他曾说过:“压迫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统治被压迫者的思想。”<sup>②</sup>

他说得很对,大多数压迫是通过使人们接受它的合法性来达到目的的。从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比方说奴隶制,如果你作为一名奴隶,在奴隶制下觉醒并奋起反抗是很难的。但如果你回顾一下奴隶制的历史,就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一制度及其演变历程。所以如果让我们身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就会比别人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

再比如说妇女权利,多年以来对妇女的压迫已被她们自己平静地接受了,在她们的观念里成为合情合理的行为。从历史到今天,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再看看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为资本家工作与做牛做马的奴隶没有多大不同。当时共和党的口号和广大投身南北战争的北方工人的口号,就是反对为资本家当奴隶,要做一个不必向别人出售自己的自由人,如果一定要向他人出卖自己,那也应该是暂时的,是最终成为“自由人”的一种手段。当你不必再听命于他人时你就是自由人了,这是一种启蒙主义时代的理想。

这种思想并非来自于欧洲的激进主义者,当时那些工人就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Lowell),离我们这里也只有几英里之遥。在《纽约时报》上常常能读到这样的文章。资本家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让

人们相信出卖自身是合理的,不幸的是现在这种观念已被普遍接受。这是一种内化了的压迫(internalizing oppression)。认为出售自己合情合理也就是认同了这种压迫,然而在 150 年前,这种观点在那些作坊工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所以说这就是内化的压迫,也是资本家在过去 150 年中所取得的一大成就。

正如比科所说,压迫者们将自己的思想逐渐灌输给被压迫者们,使他们惯于通过这种思想去看待整个世界,这是压迫者的一大成就。这个过程有时是通过公共关系部门等有意识地去完成的,有时则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吸收。将自己从这些思想中解放出来就是朝着推翻压迫迈出了一大步。

我们来讨论一下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中的作用。关于公众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得很多,您对他们怎么看?

这是老生常谈的事了。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应当是代表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和原则的人。可正是这些人将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他们却以此为骄傲。

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并不是公众知识分子,他因批评威尔逊政府而被投入监狱。睚眦必报的伍德罗·威尔逊在给予圣诞节特赦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他。为什么他不是公众知识分子呢?因为他站在了穷人和工人阶级那一边。他还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尽管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相容,尽管他身处

狱中,却依然赢得了大量选票。尤金被投入监狱的真正原因是他道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情。

尤金说的话相当精辟和准确,所以他被判了刑。公众知识分子不像他那样不识时务,他们会融入主流思想,并时刻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有时候他们做的事看起来并不错,甚至还相当好。然而那些有思想的人,那些不接受人道主义干预的人,不管他们多么有影响力也不够资格当公众知识分子。

以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例。用任何标准评判他都不愧是20世纪第一流的思想家,他也是极少数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之一。然而他遭到了诽谤,最后在狱中了却残生,同他在德国的同仁们遭遇一样。1950年后,罗素遭到激烈的谴责和声讨,特别是在美国,他被骂作一个反美的老疯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仅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还将他的信念付诸行动。

可与他持同样立场的爱因斯坦却受到了广泛的崇敬。爱因斯坦和他都认为核武器会毁灭一切,他们都签署了内容相似的宣言,甚至还联合签署了同一项宣言,但爱因斯坦行事比他要低调。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后,爱因斯坦回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继续他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罗素却走上街头,参加反核武器游行示威。在此之前,在尚未出现群众性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便积极反对卷入越南战争。他还曾试图组织示威和组建法庭,这些就是他受到残酷打击的原因。

与他截然不同,持同样立场的爱因斯坦的头顶上,却被笼罩

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其原因就在于爱因斯坦没有像他那样四处张扬。罗素在20世纪60年代四处受到恶毒的攻击,《纽约时报》、美国国务卿以及许多人对他纷纷口诛笔伐。他没有被称作公众知识分子,而只是得到了一个老疯子的称号。从《伯特兰·罗素的美国》(*Bertrand Russell's America*)一书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这段历史。<sup>②</sup>

很早以前,您就参加了全国各地的许多组织。那为什么其他的学者或名流不这么做,不愿过多参与政治活动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许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是正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支持暴政和特权的人也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说服自己这么做是非常容易的。

建立自己是非观的方法一般是做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然后以它们的标准形成一套价值体系。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然而人非圣贤,谁都会做错事,而且犯错伴随着人的一生,从你7岁偷弟弟的玩具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我们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做的。有时候我们是对的,可有时候我们做的并不对,只是对自己有利罢了,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欺骗自己说那是对的,这不足为奇。

特别是当传统文化及媒体对此大加赞赏的情况下……

是的,如果你的确相信了外界,或只是不负责任地照官方的意思去做,那会对你自己有很多好处。但如果你胆敢违背官方的游戏规则,去走罗素的老路,那你就成为攻击对象。在某些国家如美国的附庸国,你甚至可能会性命不保。

奥斯卡·罗梅罗是萨尔瓦多一名保守派大教主,二十年前,他因发起“为民请命”(voice for the voiceless)的活动而在美国的指使下被暗杀。他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刚刚过去,可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此却没有任何报道。《洛杉矶时报》是惟一报道此事的媒体<sup>④</sup>,原因是洛杉矶有着全美最大的萨尔瓦多社区,在那里奥斯卡·罗梅罗被视为圣人,因此《洛杉矶时报》才为此刊登了一篇报道。而主流媒体则基本完全对此不予理会。

几个月前,也就是去年的11月,是拉美的六名耶稣会知识分子遇刺十周年。十年前他们六人在萨尔瓦多被美国训练并武装的歹徒杀害,当时还有许多人被屠杀,可武装分子杀害他们六人的手段特别残忍。

要是十年前瓦卡拉夫·哈威尔(Vaclav Havel)及其他几名捷克知识分子在前苏联的指使下被暗杀的话,十年后他们的名字肯定会通过盛大的纪念活动传遍各地。然而,被害的那几名拉美民主人士却没有一家媒体理会,也就没有受到任何人关心。

除此之外,那六名耶稣会会员的管家和她15岁的女儿也被谋杀了。



还有数以百计不知名的萨尔瓦多知识分子被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如果去问问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知识分子,或者你的朋友知不知道那些在美国指使下被杀害的人的姓名,你会发现很少有人知晓。

而且这些被问到的人并不是等闲之辈,其中之一还是一所一流大学的校长。只有一些参与过中美洲国家团结活动的人才知道他们。然而大家却都知道那些遭受前苏联压迫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读过他们的书,并称赞他们的事迹。可自从斯大林下台后,西方就很少再听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遭遇如何了。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事实还不止这些,就在他们刚遇害不久后的1990年,瓦卡拉夫·哈威尔来到华盛顿,向国会两院作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说,把杀害萨尔瓦多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赞扬为“自由的卫士”。<sup>⑤</sup>他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甚至问道,为什么美国就没有这么出色的知识分子,将我们称颂为自由的卫士?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时代。”<sup>⑥</sup>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在我们的国土上,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你会如何?答案是,在英美这样富裕的国家,如果你不是黑人领袖,你就不会遭到暗杀,特别是在你有一定特权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国家里你是不大会遭到暴力镇压的。另一方面,有一些行为在这里会招致许多人的反感,这时唯一的对策就是不去管它。所以,如果你看不惯主流的知识分子圈子,只要不去理会就不会有问题。

可如果你想被主流所接受,譬如想让自己的成果受到肯定,希望给自己的著作找个人写书评以得到一些夸赞,或者你想得到显赫的职位,那最好别去当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美国的氛围比较宽松,可持不同政见者想融入进来还是不容易的。我们都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言论和著作过于诚实直白,就被封杀在圈子之外。虽然不至于被杀或被关进监狱折磨至死,但被孤立的滋味也并不好受。

有一名学者及活动家叫伊克巴·艾哈迈德,您也认识。他于1999年5月死于巴基斯坦。在汉普希尔学院的纪念会上您曾发表过缅怀他的演说。他曾告诉我在他出狱后,您专门到芝加哥去看望过他。您还记得这些吗?

可能是吧,这样的事我做得太多了,很多都记不清了。

可这对他却震动很大,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他还不太了解您。

芝加哥我的确去过几趟,有一次记得比较清楚,那是去参加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的葬礼。他在黑人社区里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个本应成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人物,但却被联邦调查局以盖世太保的方式谋杀了,这个事实不容置疑,看看法庭上的审讯就清

楚了。

但又有多少人记得弗雷德·汉普顿呢？其实杀害他的是尼克松政府，可他只是个黑人领袖，他的死不会成为水门事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你是个有一些特权的人物，你就不会遭到镇压，但如果你不是，那可就不一定了。

伊克巴·艾哈迈德也曾告诉过我他的遭遇。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工作丢了，最后还是位于阿默斯特的小小的汉普希尔学院在1982年接纳了他。这是他为自己的战斗精神而得到的残酷结果。

他的学术成就相当出众。他的经历很具典型性，还有一些人比他的遭遇更惨。

谈谈您心目中的艾哈迈德。

首先，在生活中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待人诚恳，态度积极，采取的是中庸的生活哲学。他在学术界中拥有重要地位，对国际事务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的分析。同时他还关注着从北美、中东到印度支那以至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他研究革命和帝国主义，且有一些严肃和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还在许多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尽管不是很多，但也时而有之。

我们来谈谈南亚的局势。那里也是艾哈迈德非常关注的地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因为那时他再次到巴基斯坦定居。克林顿3月中旬曾访问过那里,他称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sup>②</sup>

那里是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不知道。但那儿的确很危险。印巴两国相继进行核试验,从而使核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由来已久,并因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两国都是由西方国家武装的,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克林顿这么说显得有些伪善。印度发展核武器的部分原因是对抗美国的威慑,这是主流思想所接受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南亚核问题的文章<sup>③</sup>。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波斯湾和巴尔干半岛发动战争,是印度迫切希望发展核武器的部分原因。现在,世界各国已然普遍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欧美的公众知识分子却无人谈及此事。

您是说,印巴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又进行了核试验。

它们已研制出核武器,并正在进行核试验,这个动作很大,可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它们感到需要一种力量来制约美国这样的流氓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以色列这样的附庸国,都对美国轰炸南

联盟做出了激烈反应。一些权威的军事分析家指出,巴尔干战争让各国觉得有必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保护自己并对抗美国这个世界公敌。他们还认为如果塞尔维亚拥有了核生化武器,北约就不会这么快打击它,这一点不证自明。这正是印度及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

克林顿谴责印度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规定,可美国自己也经常违反。另外美国国会(不是克林顿)还拒绝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核不扩散条约》要求有核国家切实采取行动,以削减核武器数量(美国及其他有核国家没有让该条约包含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内容),而美国和其他有核国家却没有这样做,却只是要求那些无核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在这些有核国家面前,条约里削减核武器的要求只是一纸空文。

更糟的是,美国甚至逆潮流而动。就在几天前,美国宣布将新增六千件核武器,并修复老化的核武器,这超过了“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所允许的限度。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也就是轻量级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Lite),被全世界及美国自己大部分军事分析家都视作增加核战威胁的因素,结果导致批评之声四起,像最近一期《原子科学家简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就有很多这样的评论。<sup>⑨</sup>

印度及其他一些国家都认为这是针对它们而建立的武器系统。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武器系统,它的假想之

敌是那些拥有一定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它针对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或印度。它抵消了这些国家的核威慑力,因而迫使它们不得不升级自己的核打击能力。几天前我刚看到一名印度将军写的相关文章。可以预计,如果中国单方面采取升级核武器的行动,那么印度将不得不跟进,从而与中国形成制衡,然后就是巴基斯坦、以色列等等。接下来的事没有任何悬念,人类离核战争的威胁又近了一步。

进一步看,这个脆弱的防御系统同样也威胁到了核大国的安全,如俄罗斯,因为它能被很快升级。导弹防御系统起不起作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意味着使用的可能,这就必然促使各国竞相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加强威慑力。

人们知道一旦局势发展到一定地步,再脆弱的武器系统也能迅速得到加强,从而对军事强国造成威胁。据预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如同轰炸南斯拉夫一样,可能会导致核扩散。这些是我们在听克林顿论述印度核试验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国际背景。在今天或任何时期,核试验都是一种犯罪。

我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一次国宴上,印度总统 K·R·纳拉亚南(K. R. Narayanan)对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进行了批评。

我了解此事。纳拉亚南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还代表着一个令人厌恶的政党,但这与印度对美国侵略行为的态度无关。在印度国内围绕是否应进行核试验展开辩论时,支持试验的一方将科索沃战争作



为他们的一条论据。不仅印度对科索沃战争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而且除了欧洲和英语国家外的所有国家,都把这场战争视为美国的炮舰外交行为,帝国主义国家又一次用武力教训了那些不驯服的国家。

今天的巴基斯坦在世界的眼中是一个贫困腐败的国家。今年10月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政权,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将军取而代之,登上了巴基斯坦政治舞台。冷战时期,巴基斯坦在美国的中东及南亚地缘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名退休的巴基斯坦将军对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说,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进入阿富汗时需要用的避孕套。”<sup>⑩</sup>

的确如此,而且塔里克·阿里还指出,塔利班是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里被训练成狂热分子的。在巴基斯坦军队的支持下,他们占领了阿富汗,并把那里变成了一个白色恐怖地带,他们可能还盘算着在巴基斯坦做同样的事情。伊克巴·艾哈迈德晚年一直都在与之斗争。

巴基斯坦同阿富汗一样,都是美国控制中东的一种工具。沙特阿拉伯王室卫队只能保护其王室成员免受本国人民的伤害,而不能保证其他人不伤害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包括一些外围的国家也是这样,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等等。这些石油生产国的武装部队只负责保护它们的君主不受本国人民的侵害。

巴基斯坦曾经也是这样,可现在却没有这么顺从了,对此美国感

到十分不快。克林顿对巴基斯坦的主要宿敌——印度——作了长时间的访问后,才短暂造访了巴基斯坦,相当明确地表示了美国的不快。

他花了五天时间访问印度,却只在巴基斯坦待了五个小时。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号,谁都明白。其实他当时正试图重建美印关系。目前印度正在进行一场所谓的改革,正在努力进入由美国主导的体系,这场空前的改革对印度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影响。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印度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并不全是假话。

印度在1990和1991年开始实施它的“改革”,转而实行自由经济,并向国外投资敞开了大门,这使它融入了以公司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也自然就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尽管有人批评印度的经济改革步伐缓慢,可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印度不像韩国,它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开放金融部门,因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它和中国一样都没有受到多大冲击,韩国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目前已有大量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涌入印度,并收购了其大量的国有资产,而且按照通常的情况推算,今后这种收购还会继续下去。

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定期统计社会经济数据,印度也是如此,定期公布社会统计数据。印度中央统计局每年进行抽样统计,每五年进行一次综合统计。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村人口出现什么变化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印度的统计内容包括

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人均产值和贫困状况。统计结果显示,印度农村人口的贫困状况在1990年改革前大为改善,人均消费和人均产值包括非农业产值都在上升,原因是印度在非农业生产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可从1990年开始,这个趋势倒转了过来,农村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1991年印度农村的消费与生产都陷入停顿或开始下降。发生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的后果。由于印度向有政府补贴的国外农产品开放了市场,迫使本国贫穷农民的农产品削价出售。由于改革减少了政府支出,也导致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下降。这就是印度改革的另一面,不看印度本国的报道是无法了解这些事实的,这也是各国改革的通病。

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不同,没有设立统计社会数据的政府部门,但美国有相关的非政府机构,其中一个主要机构设于纽约的一所教会学校——福德姆大学。福德姆大学有专门机构公布年度社会统计指标,反映的问题包括儿童受虐待情况、温饱问题、文盲以及平均收入等问题,此外还有综合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结果十分有趣。它的统计数据没有反映经济健康状况的内容。不久前他们刚刚发布了最新一期统计数据。<sup>③</sup>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各种社会指标有所改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上升。在这里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综合数据,它并不能反映出经济的健康问题,但可以衡量出某些指标。

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上升,社会指

标却表现不佳,开始下滑,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 90 年代末才开始略微有所改善。现在的社会指标又回到了 1959 年刚开始统计时的水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开始了改革,类似于穷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调整的结果也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南北两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走了同一条路,用福德姆大学的调查专家的话说,这是美国“社会的倒退”。当我们正为步入一个神奇的新时代而欢呼时却忽视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我们还有另一个为经济学家所熟知,但却很少被媒体报道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个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改革后下降了。由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牵头的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在大约五年前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sup>③</sup>该报告分析了 70 年代早期的改革——当时正值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给全球及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半。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增长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之多。这是极为严重的倒退。

而这只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投资减少、生产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利率的大幅度提升使经济增长减慢。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特别明显的是,美国过去几十年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这在经济史上是很罕见的现象。一般说来,工资随经济一起增长。近几年来上述问题开始有了起色,但总的局面并未改观。另外,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也被大幅延长,现已列所有工业

化国家之首。总而言之,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那么非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又如何呢?也处于衰退之中吗?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刚刚发表了它的年度世界贸易与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即在过去二十年中,自“改革”实施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出现恶化。<sup>③</sup>

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指出,拉丁美洲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其在70年代时的状况基本相同。他说,尽管进行了改革,拉美的经济仍然原地踏步了二十年。<sup>④</sup>他认为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毫无帮助,这个结论并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上的依据,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至少应该可以理解并有所体认。

整个世界的状况就是如此,当然,如果你进一步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特别是对于一些遵循了不同发展道路的亚洲国家来说,它们的发展状况总的来说比较良好。那只是宏观经济统计,如果抛开经济数据,看看那些反映人民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我们会发现许多国家与美国及印度的情况大体相同。尽管有些人的确从缓慢增长的经济中获得了较大利益,如硅谷的百万富翁,那些撰文吹捧这个神话般经济时代的写手,还有我本人,但是大部分人仍然在为了养家糊口而日夜工作。印度如此,美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

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与改革紧密伴生的现象。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一流国际经济学家的认同,如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已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大卫·费利克斯(David Felix)。这两个现象尤其与改革中的金融自由化息息相关,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中包括沃尔克领导的布雷顿森林委员会。<sup>⑤</sup>

这两个现象一个是总体经济健康状况下降。并非是绝对下降,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放缓,社会进步放慢。经济状况应当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也应该继续增长。但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健康的主要估计数在下滑,同时还有两极分化的情况;另一个现象是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下降,包括分属发达国家阵营和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两大民主国家——美国与印度。这就是到处都有人抗议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全世界都应该予以关注的。

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要通过研究找出这其中的原因并非易事。在上述经济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使印度农民和美国大部分民众的境况越来越差? 二者情况是不同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但那是需要条件的。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形势。我们知道印度民众强烈抵制全球化,这是什么原因? 它与圣雄甘地的精神有关吗?

首先,印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18世纪时它曾是全球的工商



业中心,19 世纪初的时候,孟加拉\* 人均图书出版量可能比英国还多。可是印度在英国占领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工业化进程停止,又回到了贫穷的农业社会,尽管这个国度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抗争精神。

甘地的精神仍然存留在印度人的心中,但要知道,将英国人赶出印度的是全国性的革命,其中有国大党参与。这一切仍存在于今天的印度社会,那里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

英国被赶走,印度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停滞重新开始发展,但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问题重重,发展的方式极不平衡。重工业和高科技在发展,同时贫困问题也是全球最严重的,与中非不相上下。我们从一些反映人均生活质量(印度的人口非常多)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的统计数据显示,就大部分的经济指标而言,南亚是世界最差的地区之一。<sup>⑧</sup>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此做了一些有趣的研究,其中中国与印度经济比较研究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sup>⑨</sup>他的研究十分有趣,可我注意到在他获奖的时候这个题目没有被提到。森指出,中国与印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同,那时外国殖民时期刚刚结束。然而从那以后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道路,它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可那是名不副实的。而中国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直到 1979 年才开始

---

\* 历史上曾是印度的一个省。——译者

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改革”。

森所做的一个比较十分有名,近几周来《纽约时报》和其他各大媒体都在报道。那是他的一本著作,名为《共产主义黑皮书》。<sup>⑧</sup>该书揭露了过去被人忽视的共产主义罪行,尽管它稍有一点夸张,但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面对那些过去的罪恶。这本著作统计了全球为共产主义活动付出的生命代价,它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亿人。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先来看看其中描述的最黑暗的部分,即1958到1960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纽约时报书评》新千年的第一期就专文论述了此事,另一本杂志在几周后也有相关文章。<sup>⑨</sup>那场饥荒饿死了大约3000万人。森指出尽管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也常发生饥荒,可在它独立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严重的饥荒,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印度就没有发生过导致大批人饿死的饥荒。森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即印度在独立后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了发展。

森同时阐述的另一个事实却被忽视了,那是他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作的另一个比较。他说,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推进农村的医疗和教育事业,以及其他一些改善广大人民生活的项目。而印度却效仿发达国家,没有推进这些项目。结果中国农村的死亡率在1950到1979年间大幅下降。但到了1979年改革开始的时候,死亡率停止了下降,又有所回升。

在1950到1979年间,印度人口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却比中国缓慢得多。森的统计显示,由于印度没有实行中国那样的政策,它每年要

多付出 400 万人生命的代价,算下来印度为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化牺牲了一亿人。不知道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人们会如何来看待所谓的改革,去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你会如何去称呼所谓的改革。

这是森与琼·德雷兹(Jean Dreze)共同完成的工作吗?

那本书是他们俩合写的。<sup>④</sup>这并不是什么大秘密。这本书也是主流读物之一。由于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被发表在了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出版的期刊上。你很容易就能找到该书的内容。

如果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统计,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在那些由西方列强控制的地区进行这样的统计,那得出的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他们不会容忍有这样的统计,也不会出现一本《资本主义黑皮书》,就像没人能将苏联可怕的人权记录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工业发展的科学方法试点区域”,也就是受西方列强控制的国家(如巴西)相比较一样。如果比较是通过严肃而值得信赖的学术工作进行的,其得出的必将是大部分人都难以接受的结果。<sup>⑤</sup>

所以,我们认识到了另一个印度,它一方面走了一条建设性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其根源部分在其意识形态、政治及社会制度之中。

如果再看看另外一个事实,这一点就更清楚了。经德雷兹及其同事调查,印度喀拉拉邦是其最贫穷的邦之一,可它与古巴十分类似,人

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都相对较高,比印度其他地区好得多,在某些方面甚至能与发达国家媲美。原因在于,它在医疗、扫盲、妇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资源分配采取了共产党的治理方式,而且由于这种制度受到了广泛欢迎,其他政府也一直在沿用。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因素,值得认真研究和理解。可正如森和德雷兹所指出的,其整体状况的黑暗是很惊人的。但我们应当去了解事物的全貌,而不能仅仅了解对西方强国及其统治阶层的形象有利的一面。

这些都是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内容。

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森获得诺贝尔奖后,我与一位印度经济学家交谈过。他问我对森的研究有何看法,我提到森的一部分作品神秘地消失了,他对此很清楚,但表示并不打算发表关于此事的文章,可他后来还是这么做了,他在印度写的一篇文章里附带了这件事。这是我见过的在主流媒体上公开相关内幕的惟一的一个例子,我估计实际不止这一例。在诺贝尔奖的宣传信息里也有这件事,尽管我未在《黑皮书》上找到相关信息。

人们评论《黑皮书》时当然会谴责共产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救药的邪恶制度,导致了中国大饥荒,人们还幼稚地认为这是第一本揭露共产主义罪恶的书。我们这样“文明”的国人当然无法理解那样的制度,因为我们只会带着惊恐的眼神去看他们,对

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罪行却毫无认识。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好的,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许对于其他地方的暴行反应不够快,仅此而已。

这与我们前面所谈的东帝汶及南斯拉夫法庭的事情如出一辙<sup>②</sup>。如果有最起码的道德感,我们的反应就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因为我们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做些事情,以减轻美国的罪行。可我要是对大家说了这样的实话,结果不是引起公愤,就是令人不解。

印度有一个“纳尔默达反水坝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其宗旨是阻止一些大型水坝工程的建设,挽救纳尔默达河。有许多知名人士都参与了这个组织,如范达纳·希瓦(Vandana Shiva)、阿伦德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梅达·帕特卡(Mehda Patkar)等等。有趣的是她们都是女性。

印度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人很富有而且朝气蓬勃。你提到的都是国际知名人士。罗伊是著名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作品包括小说《小生命的上帝》和许多优秀的散文例如《生活的代价》等等。她们发起了保护纳尔默达河运动和许多其他的重要运动<sup>③</sup>。这些运动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世界银行的发展计划,矛头直指经济强国和投资者创造的“全球化”和那些保护资本家投资权利的所谓“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人民为此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使印

度国会几乎不能通过与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事实上,世贸组织协议是强加给印度人民的。

印度发生的事很有意思,但由于没人专门去调查过,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大致可做以下推测:印度制药业不会为加入世贸组织而抱怨,相反它们很欢迎印度的新专利制度,因为这使它们不必再生产廉价的药物。

为什么会这样?我根据自己所知的有限事实猜想,是由于印度的制药公司加强了联合,许多小公司合并成了几家大集团。公司管理层意识到了其中的好处。因为印度的劳动力非常廉价,就像印度软件业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才一样,制药公司拥有十分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服务于决策层的高层次教育机构里受过培训,而他们的工资非常低。所以他们就能开发出富有赢利性的新产品。虽然那些产品不像默克公司开发的那些高端药物,但拥有它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依然可以赚取巨额利润。可这样一来,印度的广大民众就再也买不到廉价的药物了。当然,制药公司不会去理会这些问题。

根据您的说法,在1947至196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的经济并非单纯的资本主义,比如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便是国立的。印度经济的国有成分是否更多一些?

要看比哪儿更多。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就以我为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那是一所私立大学而不是国家机构,那么它的经费来源



于何处呢？以前我正好在系学生会工作过，1969年学生发起抗议运动时期，我对大学的经费有所了解。我已不记得具体的数目了，但我记得大约学校预算的一半都被投入到了两个秘密的军事实验室里，其中一个研究导弹的制导系统，另一个则负责研制军用电器。学术上的预算远少于这两个实验室的经费。我认为当时的学校预算有90%来自五角大楼，而当时我也是在为国防部工作。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捐赠在学校预算中的比例扩大了。这样看来麻省理工学院基本上是属于政府机构。

现在学院又有了公司资助，可这种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学院是有害的。有时它是用于真正的学术研究，但更多情况下它们资助的项目内容都是秘密的。为国防部搞研究工作没有什么限制，可制药厂的项目是为了能尽快赢利，而不是为了让它的竞争对手技术进步，也不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项目的内容是秘密的。这样的保密要求不能公开提出，但私下里它会让你明白，如果你不能保守秘密那它就不会向你提供经费。去年，《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件事，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在考试时拒绝回答问题，他说他知道答案，可与他合作的教授要求他保密，以便将成果推向市场。<sup>④</sup>这是一桩大丑闻，是接受公司资助的后果。

但总的来说，麻省理工学院是公共机构，国家的研发系统(R&D system)也是如此，特别是在那些富有开创性、风险极高且没有短期回报的研究领域。当然印度与美国、美国与日本以及每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都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彼此差别还很大。但所有这些国家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成本和风险的社会化方面。

刚才您提到您曾为国防部工作,您指的是直接为它工作吗?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实验室的全部经费都来自三个军事部门,此外音乐系实际上也是国防部资助的。原因是如果电子工程系的资金不够,那么校方就不会开办音乐系,音乐系是靠前者的多余资金运转的,所以我们得承认它也是国防部资助的。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资助”这种说法会误导他人,实际上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只是纳税人对他们的钱的去向一无所知罢了。国防部之所以不像公司资助者那样在乎你如何使用那些经费,是因为它不受国会监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防部是我们最好的资助者。军队的首长们很清楚这只是将风险及成本社会化的一种手段罢了,而其中的收益却被私有化了,这就是资本主义。五角大楼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一环,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谈谈阿马蒂亚·森笔下 1943 年孟加拉那场震惊世界的饥荒,当时孟加拉是一个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sup>④</sup>

事实上,在饥荒极其严重的国家也可能有大量的食物,这十分常见,因为饥荒常与粮食过剩有关。饥荒的另一个根源是社会经济制

度,美国就是如此。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尽管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初步估计美国约有3 0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儿童挨饿的比例更高。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食物,相反由于去年美国粮食过多,政府出资240亿美元左右的农业补贴以保持农产品的价格。

我们谈谈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阿尔伯克基市的“半球间资源中心”(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日前发表了一份声明,名为“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正陷入越战的沼泽。”您认为这种类比合适吗?《纽约时报》一篇名为“对哥伦比亚的危险计划”的社论认为美国对哥援助“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代价高昂的反暴乱战争中。”<sup>④</sup>

无论是对越南还是对哥伦比亚,我都不喜欢“越战沼泽”这种说法。我们能说当年俄军陷入了阿富汗的沼泽吗?它们一开始就不该去侵略别国。美国在越南也是如此。美国在哥伦比亚的计划的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跟所谓的越战沼泽没有关系。当年是美国侵略了南越并毁灭了它以及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余大片领土。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这种说法。

有趣的是,国际红十字会(IRC)在哥伦比亚局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那儿的工作卓有成效,但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主要问题不

是它会不会被卷入一场战争。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切的根源。今天的《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不过我不能肯定它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其中的联系。《时代周刊》还报道了玻利维亚农民大规模游行抗议的事件。<sup>④7</sup>原因之一是有些农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种植古柯(coca),而美国采取行动毁灭了他们的作物,并镇压了农民暴动,致使一些农民面临饥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抗议队伍,尽管抗议还有其他直接原因。

玻利维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consensus)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计划要求它开放农产品市场,让那些受补贴的西方农产品自由进口,还要求那儿的农民理性地生产能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农作物,并尽力使利润最大化。按照这些要求,玻利维亚的农民只有去种植古柯,可那些西方国家却又来强行毁坏农民的作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好上街去抗议,这就是在玻利维亚发生的事情真相。

《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不错的报道,作者是驻哥伦比亚某地区的记者。美国正策划毁坏该地区农民的作物。<sup>④8</sup>那实际上是美国为消灭当地游击队找的一个借口,因为那些地区长期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是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吗?

哥伦比亚的主要反抗组织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此外还有

一支游击队名叫“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ELN)。上述区域是美国新一轮军事行动计划的目标。另外,哥伦比亚的准军事组织及武装部队的走私活动丝毫不亚于哥伦比亚游击队。但美国行动的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游击队。事实上同那些正规部队一样,哥伦比亚游击队广泛征税,包括从种植古柯上抽税,这也是他们与古柯的惟一关联。也许他们与古柯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但征税是主要关系。

《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哥伦比亚的局势。由于哥伦比亚境内谣传美国将对那里的农作物使用生化武器,如同它在玻利维亚的所作所为一样。哥伦比亚的农民十分担心,因为这样一来,美国不仅会摧毁哥境内的古柯,可能还会毁坏其他作物。

美国以摧毁古柯为名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试验它的生化武器,可谁也不知道这会对哥伦比亚的生态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美军在进行这项试验时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只是摧毁了那里的雨林,那么试验失败,咱们下次再换一个配方。而哥伦比亚农民却十分害怕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遭到破坏,所以即使他们并不知道玻利维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像玻利维亚农民一样起来反抗,就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

巧合的是,《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均隶属于“《纽约时报》集团”,它们报道了同一个美国政策的不同层面及其对穷人的影响。

我们在此谈论的是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什么“泥潭”效应。美国是亲自出兵执行这项肮脏的任务,还是指使哥伦比亚军队代劳,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让哥伦比亚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在美国的指导、资

助和驱使下完成这次任务,比美国自己亲自出马去干好不了多少。尽管哥政府不太愿意听从美国的命令去毁坏自己国家的作物,而且对美国一味坚持镇压和摧毁,却不肯出资帮助哥伦比亚发展替代农作物也十分不满,但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淫威。其实美国并不反对出资帮助哥伦比亚发展替代农作物,只是顾及到了第三方也许是欧洲的利益才未付诸实施。

美国这么做将扶植哥伦比亚政府军,并间接帮助其准军事组织。他们都是国内暴行的元凶,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不存在任何争议。可那些暴行大部分都被算在了准军事组织的头上,而且这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人权观察”组织曾报道了军方当局高层与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sup>⑨</sup>将军队的暴行推到准军事组织的头上是惯常的做法。塞尔维亚在科索沃以及印尼在东帝汶都曾有这样的记录。

这与中美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是吗?

在许多方面相差不多。但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情况。美国对付尼加拉瓜不得不利用美国自己操纵的准军事组织,因为不存在通常的压制力量,即军队,而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公众不会允许美军直接介入,正如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对南越的袭击一样。但在萨尔瓦多美军则是直接介入。

还有附属于美军的敢死队。



那也是一种准军事的武装组织,通常由军官组成,美国在哥伦比亚利用这种武装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肯尼迪时期。哥伦比亚的历史和现实都充斥着暴行和动乱。1962年,肯尼迪政府向哥伦比亚派出了一支由特种部队将军威廉·亚伯勒(William Yarborough)率领的队伍。威廉向哥伦比亚的军方提出了关于平息其国内动乱的方法的建议,哥军队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还通过两军联合演习加以实施。这条建议就是训练安全部队,“作为必要的准军事组织,对已知的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实行破坏和恐怖活动。”<sup>⑤</sup>这意味着工会领袖、农民代表、牧师、教师和人权活动者都是安全部队打击的目标。肯尼迪政府的建议实际上是使用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在平民中制造恐怖,这改变了暴力的方式。哥伦比亚的人权活动家认为这使国家的局势更加恶化。

美国带去的影响是十分可怕的,并持续了一段时期。仅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150万难民逃离了哥伦比亚,因政治迫害而死的人每天大约有10人,大多数是被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杀害的。哥伦比亚本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可现在那里却充满了贫穷、苦难和饥饿,而正是这些苦难滋生了反政府游击队,现在美国不得不再次介入哥伦比亚局势,去消灭已经发展壮大的游击队。

这才是我们应当去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像《纽约时报》社论所说的那样——那里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越战泥潭?美国介入会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我还想问另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哥伦比亚种植古柯?

美国自己就生产着一种致命的商品,它杀死的人远比可卡因多。最高法院认定它是美国人主要的健康杀手——烟草。我们在其他国家强力推销这种致命毒品,还在东亚国家打出了香烟广告,有的广告宣传的对象是那些不宜抽烟的人群,如妇女和儿童。

在这些问题不断出现的时候,布什总统大张旗鼓地宣称反毒品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却召开了一场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的听证会,主题是泰国拒绝接受美国危害健康的毒品广告。美国恐吓泰国说,如果它再不接受美国生产的毒品或毒品广告,就要对它实施贸易制裁,这将对泰国的致命打击。

实际上,这就如同哥伦比亚企业可以要求美国接受它们的可卡因,并允许在时代广场上树起广告牌,展示小孩吸毒有多酷一样。似乎有数百万中国人死于我们的香烟,因为我们在他们那里大做香烟广告,他们也应该派军队到北卡罗来纳来镇压这里的暴动,并用生化武器摧毁我们的烟草生产地。他们有这些权利吗?如果没有,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对哥伦比亚采取行动呢?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我却发现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即便是那些哥伦比亚行动的批评者。而且提这样的问题丝毫不过分。

中国当然没有那样的权利,如果它胆敢提出那种要求,弄不好会遭到美国的核打击。那么我们在哥伦比亚就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尽管这不是什么量子物理之类的高深问题,可没有人这样做。显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其实美国的毒品问题就在美国自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付毒品

的有效办法。当反毒品拨款得以通过时,加州一位议员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提议将一部分拨款用于吸毒者的康复计划,然而国会和克林顿政府都未通过这项提案。我们都知道康复计划比打击毒品犯罪要有效,也比控制毒品来源国(也就是美国在哥伦比亚的行动)要有效得多。根据兰德公司一项著名的研究成果显示,康复计划的成本效益是打击毒品犯罪的7倍,其有效性是边界封锁的11倍,是控制毒品来源国的23倍<sup>⑤</sup>。可决策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在国内严惩毒品犯罪,在国外耀武扬威。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有了吸毒问题,我们就该采取康复及教育措施,并寻找吸毒的社会经济根源。美国的吸毒问题就出在国内,我们应当找出吸毒者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原因。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对别国动用生化武器或进行军事打击,不管这种军事行动是由我们亲自出马,还是通过代理人实施。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关心的,而不是担心美国是否会陷入另一个“越战泥潭”,或是付出什么高昂代价。越南战争也好,俄国入侵阿富汗也好都是如此。

您说过战争法庭只审判战败者。在波士顿大学举行的“回归权”(Right of Return)大会上,您在回答听众问题时曾举出了一些关于战争法庭的有趣例子。能在这儿谈谈吗?

在被问及北约是否会因在南斯拉夫犯下战争罪而受到战争法庭的审判时,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道:“要是北约飞行

员要接受联合国审判,你更有可能看到的情形是联合国大厦的分崩离析并被扔进大西洋。”<sup>②</sup>事实正如他所说的,联合国不可能审判北约。

去年5月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官方发言人杰米·谢伊(Jamie Shea)也曾被问及类似的问题。他说北约不会有受战争罪审判的危险,因为是北约国家出资设立了战争法庭,并支持其日常运作,它们彼此是朋友。谢伊十分肯定检察官只会起诉南斯拉夫人。上述两个事例均引自匹兹堡大学著名的东欧问题专家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的专题论文《不公平的正义》(*Biased Justice*)<sup>③</sup>。这是一篇出色的论文,它通过讲述战争法庭如何处理由北约和南斯拉夫内战双方(主要是塞族人)所犯的同一种战争罪行,来分析战争法庭的内幕。

您是怎样得到他的论文的?

他给我的。

那么我又要提起那个在洛根机场工作的人面临的困难了——罗伯特·海登不认识我,所以我也没法得到他的论文。

是我向他索要的,其间的过程说来话长。由于共同的兴趣,近來我与他有所接触,我对他的论著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提出拜读他的大

作。但现在这些资源在因特网上都可以获得。

在“回归权”大会上的发言中,您概述了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东政策。最后您是这样总结的:“这些不是大自然的法则,它们是可变的。而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美国,如果它们不发生在美国,那么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就都不重要了。”<sup>④</sup>您的意思是不是美国以外的组织与运动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作用?

不是那样的,你误解了我的原意。美国以外与美国发生的事情有着相互作用。比如说,罗伊对印度水坝工程的抗议如果没有引发这里的抗议,其作用就很有有限。因为美国是世界银行与国际组织决策的地方。并不是说印度发生的事与它们的决策无关,再极权的国家也会受到人民的影响。但是由于各个组织的首脑机构都设在美国,世界力量的重心也在美国。

国外发生的许多事都会引起美国的变化,就像基因变异引起有机体变化一样。诸如印度与欧洲爆发的那些大规模抗议,只有当它们波及美国以后才能产生较大影响。而美国境内的运动常是国外运动影响的结果,就像独立运动的病毒传染的效果一样。

美国国内的运动是固然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它们只是在受到外界影响后才会迅速发展壮大。正如从事生物技术研发的孟山都公司之所以被迫在公众面前让步,就是海外率先爆发的抗议活动波及国内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应忽视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这个事实,美国

的确对世界大部分事件具有首要影响,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

中东问题您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可当您谈论那些历史记录,重复那些历史事实时,您的音调和肢体语言让我感到您对此十分厌倦。后来在回答问题时,您恢复兴趣了吗?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正确。如果真是那样也能理解,对中东问题研究了二十五年之后我发现其中最根本的事实无法进入公开的历史,这并不奇怪,但却十分令人沮丧。我在波士顿大学里谈的那些不是什么内幕,而是最基本的事实,其中包括外交记录、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以及建立“奥斯陆框架”(Oslo framework)的意图。这些是任何了解事实的人都能说得出所以然来的。所以不会改变我针对这一主题所写下的任何内容。

然而,不仅是媒体,就连学术报告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换句话说,它们都被抹去了。在 1976 年 1 月,联合国正围绕一个两国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第 242 号决议——进行辩论时,美国和以色列做了些什么?美国否决了该决议。但是,你却很难找到反映这种重要问题的相关资料。许多重要的学术书籍不是没有收录这样的史实,就是对其进行了歪曲。

您在大会上与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伊兰·帕佩(Ilan Pappé)同在一



个专家组。他与本尼·莫理斯(Benny Morris)、阿维·施雷姆(Avi Shlaim)、汤姆·西吉夫(Tom Segev)和齐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并称为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他们代表了以色列的某个重要方面吗？

这些学者,特别是伊兰·帕佩在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重塑了以色列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著作还成了历史教科书。他的研究在历史学里的重要性就好比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有一点诚恳地看待美洲原住民历史的重要性一样。

在60年代之前我们从没有真正认识过历史上的美洲土著,直到研究机构以外的学者如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等人的著作出现时,我们在当年大规模驱赶印第安人的史实面前才第一次部分地承认了历史。当年种族灭绝的牺牲者们已经进入了美国人的意识中,但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当我们用黑鹰、阿帕奇、科曼奇等名字命名我们的武装直升机时,没有人会联想到当年的美洲土著。我估计如果纳粹德国空军给它们的武装直升机起名为犹太和吉卜赛效果就会不太一样。当然,现在会有人把将他们的形象融入球队的吉祥物当作笑料,尽管这很丑陋,可它说明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

《纽约时报》的头版写道,以色列开始禁止拷问巴勒斯坦嫌疑犯,停止了剥夺巴勒斯坦人定居权的做法,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地区。阿拉伯人平等参与土地分配的权利得到了以色列的保护,而且以色列

史无前例地将夺来的部分城镇还给了阿拉伯人,这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里程碑。以色列内政部长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说过:“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一个稳定、正常、民主的社会,就得给予巴勒斯坦人起码的权利。”<sup>⑤</sup>

这的确是重要的进展,但是还不能过于乐观。夏兰斯基本人过去就曾有破坏巴勒斯坦人基本民权的恶劣行径。他曾拒绝签署保护一名受攻击的巴勒斯坦编辑的声明,因为他认为阿拉伯人的民权与他无关。当然,现在情况有了改变。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对以色列的改变评价过高。当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宣布拷打巴勒斯坦人为非法时,安东尼·刘易斯写了一篇名为“照向世界各国的明灯”的文章——因为以色列禁止拷打,刘易斯就把它称赞为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处在黑暗中需要它来泽被的国家<sup>⑥</sup>。我想禁止拷打当然是件好事,但恐怕还不足以让一个国家成为一盏明灯。

最高法院做出的关于归还土地的决定实在非常令人吃惊。到目前为止,以色列90%的土地都禁止非犹太人居住。西方评论家却无视这一点,称赞以色列是一个了不起的民主国家,是一盏明灯。法院决定允许阿拉伯家庭到由以色列人统治的区域生活,可那儿的制度只为散居全世界的犹太人服务(而不是以色列的公民)——也就是说身处美国的我能到那个地区享受权利,可居住在那里的人却不行。这在现行制度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值得我们去深思。这种改变会是一种进步,但我不打算去夸耀它。

至于夏兰斯基对归还土地的评论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了。被归还的是卡西姆村(Kafr Kasseem),而不是任何一个老村庄,那里曾发生过以色列历史上最野蛮的大屠杀。1956年以色列士兵在那里屠杀了49名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没有听到以色列在入侵埃及时发出的宵禁令。结果负责屠杀的指挥官被处以49便士的罚款——一条人命一便士,级别低一些的军人则坐了几年牢。这有点像美军在越南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美莱(My Lai)大屠杀。屠杀了那些巴勒斯坦人之后,以色列又夺走了他们更多的土地。他们现在归还其中的一部分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庆祝。

您是否觉得《时代周刊》现在来报道那场大屠杀是因为感到游戏已经基本结束了吗?

他们以前可能也报道过,但当时的《时代周刊》并不是亲以色列的媒体,而且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可近几十年来,《时代周刊》变得非常亲以色列,即使是这个报道也是极具误导性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让人感到以色列在巴拉克统治时期收敛了对犹太定居点的扩张,可事实恰恰相反,希伯来的报纸上天天都有这类消息。

在大会召开当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两篇文章,作者分别是“美国-阿拉伯反歧视委员会”的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和以色列小说家兼记者A·B·约书亚(A. B. Yehoshua)。⑤而您将后者归

入了自由左派阵营。

我向伊兰·帕佩问过他的情况,我认为他可能是左翼政党——梅雷兹党(Meretz)的支持者(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认同),总之他应该是属于崇尚自由的左派人士。《波士顿环球报》将他同大会联系起来,你仔细阅读里面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一点。

约书亚的文章相当无耻,他认为巴勒斯坦没有什么难民,他们只是移民。这么说就好像那些巴勒斯坦人和我一样是从剑桥移民到列克星敦,而不是在逃难,即便是被强迫迁移的也一样。仿佛那些阿拉伯人全然不在乎住在哪儿,任意到处搬家。他的言外之意是那些人管自己叫难民是想为杀害犹太人找借口。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就能读出来。

他笔下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大不相同。他说以色列在1948年的战争中失去了6000名战士,他们的生命是永远无法补偿的。这么说当年只是阿拉伯人在攻击以色列。他要是起码的常识就不可能这么想,事实上他对那段历史很清楚。

起初,那是在巴勒斯坦裔英国人的授意下发起的一场内战,交战双方都犯下了许多罪行。当时犹太人的装备和组织都比巴勒斯坦人好,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战争已持续了六个月,并有3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了他们的国土。

以色列建国以后,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的确攻入了以色列领土。大约有一周时间双方不分胜负,但一周之后这场战争就显现出不平衡,

以色列明显比阿拉伯人强大得多。阿拉伯军队中只有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外约旦军\*。但是由于它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与以军达成了某种默契: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对这段历史研究得最好的学者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新历史学家”之一——阿维·施雷姆。<sup>⑧</sup>

所有的战斗都是在本应属于巴勒斯坦国的地域内进行的,因此发生了许多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帕佩的一名学生特迪·卡茨(Teddy Katz)的论文后来被编成专著,讲述了1948年5月底发生在坦图拉(Tantura)的一起大屠杀<sup>⑨</sup>。希伯来媒体已经讨论了此事,约书亚对此不可能一无所闻。

所以事实不会是像他所说那样——巴勒斯坦人不是难民,而只是移居别处,以色列人没什么好道歉的。就好像我们美国人不能说美洲土著切罗基人(Cherokees)没受什么苦难,只是换了个家园罢了。我们对此根本不必在乎?

---

\* the Transjordan army, 约旦的旧称。——译者



# 第七章

## 团结一致

2000年6月12日于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市

我们上次交谈后，您被授予了一连串荣誉学位。几星期前加拿大授予您两个荣誉学位，上星期您的母校哈佛大学又授予您一个。两者应该有些不同吧？

哈佛大学的学位没有涉及我参加的任何政治活动，这在我的印象里是第一次。

在多伦多大学和西安大略大学授予您学位的前几周，《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篇激烈批评您的文章。我还注意到一年前也是在您将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学位时，<sup>①</sup>《华尔街日报》上也刊登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您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两者十分相似。《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时发表的。我不知道编辑是否十分乐于这样做，然后哥伦比亚的校长将这篇文章复制了多份，在庆祝午宴上四处传阅。我猜想人们觉得这么干很有趣。

上次访谈中让我想不到的是，您提到了 T·博恩·斯利姆(T-Bone Slim)\* 演唱的一首歌<sup>②</sup>，您一定是在某本书上读到了他。在您的文章中还提过其他音乐作品吗？

看来你确实没有好好读过我的东西。(笑)我在已出版的书中提到了它，但我想还是让你自己去找出处为好。几年前我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出版商出版的 T-Bone Slim 的一本歌集上读到了它<sup>③</sup>，我很喜欢那首歌。

20 世纪 30、40 年代曾是伍迪·戈斯里(Woody Guthrie)和织工乐队(Weavers)的音乐风行的时期，您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没怎么听过。多年前我常听李德贝利(Leadbelly)的歌，但并不入迷。

---

\* T·博恩，美国著名摇滚乐手，擅长演奏吉他。——译者

今天的一些音乐组合从您这里受到了启发,比如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乐队,U2 乐队,Chumbawamba 乐队和 Bad Religion 乐队,而且您还和他们一同录制过节目。他们还和您联系吗?

我们只是偶尔做一些访谈,几星期前我同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乐队的一名音乐人访谈过。我有时也听听他们的音乐,但坦率地说,我对此一窍不通。

能否请您用大众的语言来讲解一下您的语言学理论。

首先,理论不是个人所有的,我只是众多研究语言的学者之一,大家的研究成果多有交流。语言学始于一个并不太有争议性的事实,即语言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也就是说,每个正常人都有语言能力,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能力。

能力不是单一的事物,而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比如说,我在说话时需要使用舌头,但这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其他一些动物也有舌头,如猫。毫无疑问,所谓的能力肯定还有许多方面是灵长类的动物,或哺乳动物,或可能所有的动物所共同拥有的。

但语言能力的一些关键方面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生物拥有。地球上不存在与我们同宗同源或结构基本相似的物种,尽管原始人在进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高等智能动物,但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我们人类,所以人类智慧

的某些方面是十分独特的。

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可能是一个相当小的种群,可能只有几万人,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这么一段时间还不足以使人类出现任何进化的迹象。也就是说据我们所知,相比其他物种,人类从出现至今几乎没有基因的改变。所以我们人类是一个相当同一的物种,所有人的语言能力都是近乎相同的。比如说,如果你的小孩在东非长大,那他们将说一口标准的斯瓦希里语(Swahili),如果他们的孩子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长大,那么那些孩子就会说一口地道的波尔德方言。

这些特点似乎是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传天赋。我们对这些天赋还很不了解,只知道它使初生的和还未出生的婴儿(已有相关的证据)能做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先,婴儿必须从他们周围各种杂音和行为中分辨出哪些是语言,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有些物种也遇到了同人类相似的问题,在这方面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是与人类没有任何进化关联的昆虫。例如蜜蜂能从同伴的各种复杂的动作中识别出它们自己特有的“摇摆舞”,这种舞姿能表示花的距离和质量。没人知道它们是怎样做到的,也没有人能理解蜜蜂的舞蹈。如果谁能解决如此复杂的科学问题,他一定可以因此荣获诺贝尔奖。

而人类识别语言的能力更为复杂,而且是为人类所独有的。如果给一只猿猴这样的环境,不管它是否接受过特别训练,它都无法从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识别人类语言。对于它来说,这一切只是乱糟糟的一

团。而婴儿天生就具有这样的特殊能力。

语言能力是人类智力的特殊部分,为婴儿所拥有。婴儿通过这种能力识别出与语言有关的东西,经过各种过程最后习得我们大家都掌握的语言。掌握了语言,你就能自如、多样地描述新情况,不是让你的表达受限于你所处的环境或你的内心状况,而是有条理地恰当地表达你的意思。这是人类观察自身语言数百年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人类由于共同的基因而拥有的同等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是什么?人类在语言的初始状态下掌握了什么?处于初始状态下的人如何通过交流和环境的影响塑造、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语言能力,最终达到掌握语言的程度?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

为了研究这个过程,必须先使初始状态理论满足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这种初始状态至少包括以下一些条件,即根据零星的证据显示,婴儿具有高度明确、十分清晰、极为具体、丰富多样、并能适应新环境的智力水平,并且能够通过非常复杂多样的方式来体现出来。

因此这种初始状态的水平必须高到足以能够实现未来语言的转换和习得。但又不可能太高。比如,你不能说婴儿的初始能力就是理解我的英语方言,那他就理解不了你的英语方言或日语。这就是初始语言状态的上限和下限:它不能超越上限,也就是它不应过于复杂和丰富,以至于排除某种语言环境里可能存在的其他语言,而只能习得某一种语言;它也不能低于下限,也就是说它至少得具备一定的内容,

使得各个语种区域里的正常婴儿能够获得一种丰富的复杂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人类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就处在这两种极限之间,在研究它的时候必须首先了解这两个极限。语言在被组织成一种复杂的体系时必须遵循什么原则?由于语言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者难以在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上走得太远。这就是问题所在。

最近,您写的关于“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方面的作品比较多,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近二十年里出现了对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大量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语言或多或少都是相似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去学习其中的任何一种语言。这些语言的基本结构,包括词汇的含义、句子的性质等等,都源自于语言的内部体系。我们无法掌握如此海量的知识。

语言的内部结构一定会有共同之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一个火星人眼里,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就好像在我们眼里某个物种的动物都相差不多。那么在火星人眼里人类最共同的东西会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得经历各不相同的人彼此差别如此之小?我们需要解开这个谜团。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了解了很多,同时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最简方案”的来历。这是一个提出问题

而不是给出答案的理论,它提出了许多以前没人思考过的问题。<sup>④</sup>

可能这些问题提出得早了一些,但也许我们已掌握了足够的语言学知识,能够这样发问:语言符号系统是如何设计的?语言必须满足特定条件才具有可用性。比如说,它必须是人类的感官能够接收到的,否则语言就无法传递。它还必须是人类思维能使用的,否则连你自己都无法使用它,因为你不能通过你的语言来思考和表达你的思想。这些都是所有语言都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

那么理论上你也许会这样问:语言距离解决那些“界面条件”(interface conditions)问题——即满足外部条件——的最佳方案还有多大差距?这种问题促使人们开展了非常有趣和令人惊喜的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系统的最佳设计中存在着一些不平凡的要素,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项研究。

您有没有想过不同的文字是怎样形成的?比如希伯来语、乌尔都语、亚美尼亚语、韩语、中文和印地语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统。

实际上这些语言的文字并没有如此大的不同,此外,我们也知道字形也只是语言的表层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文字无法互换使用。



但我们能肯定地说它们之间是很相似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对象十分近似,那就是人类语言。我说它们只是语言的表层是因为它们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即使今天也只有一部分人使用文字。不管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表达(postmodern discourse)是怎样的,文字在语言中的地位都无疑是次要的,它们反映的语言能力也是次要的。文字的内容有时还能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如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当然这样的形式并不多。

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的是对哑语的研究。人们直到近几十年才发现哑语与口语也十分相似,婴儿学习这两种语言的过程和经历的阶段也十分相似,此外这两种学习所涉及到的大脑区域可能相同或相近。所以现在看来,它们似乎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同样的语言能力,这个有趣的假想是在近三四十年才出现的。

1953年当您乘船横渡大西洋时,您突然悟出了语言学方面的一些真谛。

当时我极度晕船,更糟的是旁边还有人说那次航行真平稳,大海就像湖面一样平静,但这却使我晕得更厉害了。那时战争刚结束没几年,我与妻子卡罗尔带着我们的研究生到海外四处旅行。我们选择了加拿大太平洋航运公司(Canadian Pacific),因为它的船票最便宜。于是我们从蒙特利尔出发,可快要上船时那艘船出事沉没了,于是公司很快找了另一条船替代它。那是一艘被德军击沉在鹿特丹港的船,

当时刚刚被打捞上来清洗干净,由于适航性较差,这艘船航行时倾斜得十分厉害。我们往一边船舷看是海,另一边则是天空。到了利物浦后我们还能轻易分辨出谁坐过那条船,因为那些人下船后还是斜着身子走路。

我们来谈谈在那次旅行中发生的事。在那之前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研究语言学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在学校学到的所谓“语言程序理论”(procedural),其观点是语言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将全部的语言素材加以组织,形成一个简化的整体以应用于各种场合,那是一个将各种文本加以筛选并组织成一个结构清晰的形态的过程。我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并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还在研究另一个课题,即后来形成的“生成语法学”(generative grammar)。当时我正在独自思考那个题目,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疯狂,可我还不知道我所研究的东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的古印度语法学,那是后来才了解到的。

我同时进行着这两项研究,一直认为学校教给我的那条理论一定是正确的,而自己的研究肯定是荒谬的,后者就只当是消遣。然而随着我努力为学校所学到的理论进行分析技巧的完善、定型和提高时,却发现自己已走入了死胡同。我能将相关的论文发表在《符号逻辑杂志》(*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上,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些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相反,我自己脑子里的那条理论倒是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成果。正当我在海上颠簸时,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了,那条消遣才是正道。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专门从事自己的

生成语法学研究。

我们来谈谈语言对政治言论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举例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现被更名为“减少贫困与增长技能”计划(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再比如说,设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为拉美军事人员提供训练的“美洲学校”(The School of Americas)早已臭名昭著,现在却改名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协会”(the 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与语言学没有任何关联。玩文字游戏显然不是研究语言的结果。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奥威尔曾讽刺过这种现象,就好像两个交战国的任何一方都永远不会说自己是侵略者,双方都声称是在进行自卫,而且都是在为人道主义的伟大目标而战。再举一个奥威尔曾举出的例子,即如果你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控制一国人民,你的行为将会被称作是“安抚”(pacification)<sup>⑤</sup>。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美国制定了威慑战略,而美国的敌人并没有这种战略,如俄国。但俄国才是二战后真正成功的威慑者,它吓阻了美国对古巴的打击。可我们不能把那叫做吓阻,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我们想进攻古巴。美国不会承认这个,它永远只会防御。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伎俩,我想在成吉思汗的历史里都能找到佐证。

而在另一方面,近几年来,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把

戏变得越来越富有喜剧色彩。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其前任相比,他对公共关系问题十分敏感。看看“与美国订约”(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计划及国会接下来的行动,你会觉得十分可笑,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突变。奥威尔如果知道了恐怕都要发疯了。

共和党内主管民意调查的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在参加公众保健问题辩论时被问及共和党内制定计划的决策过程。他说:“我们先找一群人做测验。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问题,然后通过他们的不同反应确定哪些表达效果最佳,哪些让人听了会起负面作用。接下来我们再对这些表达进行修饰润色,找出最动听的辞藻放到政策里面。”<sup>⑥</sup>

结果那些政策的实际内容与它们动听的辞藻完全相反,但这并不重要。例如,《非洲发展与机遇法》(*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是一个既不会带来发展又无任何机遇的法案。再比如《责任与工作机会法》(*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其实只是给取消社会福利赋予了一个动听的说法。还有《农业自由法》(*Freedom to Farm Act*),按金里奇的说法,这部法案将结束美国目前“东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式”的政策——以政府法令规定农民的经营和以补贴扰乱市场。其目的在于解放农民,还他们以自由。可一年还不到联邦农业补贴就增长了三倍,而那仍然符合《农业自由法》的规定。

这类闹剧已经屡见不鲜了,包括你提到的那个“结构调整计划”,

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拙劣的笑话(a poor joke)。我猜他们都是请的同一个公共关系顾问,用的都是奥威尔说的那一套伎俩。

我们都对批评比较敏感,特别是来自于朋友或盟友的批评。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是受人尊敬的《独立报》驻中东记者,可他在“回归权”大会(“Right of Return” conference)上尖锐地抨击了一些阿拉伯裔美国人组织。我感觉他的批评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还冒犯了一些人。您如何使自己的批评能够为人所接受?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困难。首先你要确保你批评的内容是正确的。菲斯克是一个有成就的杰出记者,但当时他的批评并不正确。也许他并不了解他谈到的那些人,他们中许多人多年来积极勇敢地从事的事业在菲斯克的批评中被一笔勾销了。这样的批评产生的效果当然是十分消极的。

另外,当时我坐在主席台上,听到许多年轻人对他的批评报以掌声。显然他们喜欢看到长辈受到攻击,而不管这种攻击正确与否。实际上,那些组织的成员不仅了解菲斯克所说的事,更是已经为之奋斗了多年。的确,官方的阿拉伯人组织多少有些沉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强权,阿拉伯社团也不太活跃。但我觉得菲斯克的批评不仅不准确,而且有失公允,因为阿拉伯人的沉默是有原因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小的时候,犹太人聚居的社区都十分相似。二战结束后,许多犹太人在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集中营里朝不保夕,而

那些犹太社区却没有尽一点努力去帮助他们进入美国。只有一个犹太组织一直在积极活动,叫做“美国犹太教协会”(America Council for Judaism),但这是一个非主流组织,而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由于主要的犹太组织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幸存者极少得到帮助进入美国。我们也不了解那些幸存者的意向,因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严密控制着来自集中营的报道,使得那些报道失去了可信度。

在那种情形下,美国无法了解到欧洲犹太人的真实意愿。但毋庸置疑,他们大多数都希望到美国来,因为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尤瑟夫·格罗德津斯基(Yosef Grodzinsky)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名为《好人的材料》(*Good Human Material*)<sup>①</sup>,可惜全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每一个活着离开集中营的人都乐意来美国。可他们却没能实现他们的愿望。

那是个有趣的故事。看着那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犹太社区对自己的同胞却袖手旁观保持沉默,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在那个时候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美国有一股反犹太势力,尽管那与种族歧视不一样,但它的确存在。

那些是我儿时的记忆。后来我进了哈佛大学,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犹太人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不愿招惹麻烦。现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社区似乎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在美国,官方对反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最为宽容,甚至在主流和公开的场合都有不信任甚至仇恨、诅咒阿拉伯人的言论。因此阿拉伯人组织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阿拉伯人时刻



都能感受到自己在美国的少数民族地位。

在这种处境下站出来说话是需要勇气的,那种勇气不同于站在敢死队面前的胆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被社会接受而采取低姿态是不足为奇的,尽管他们的姿态不值得称道,但可以理解。身处其外的人没有资格去谴责他们,况且他对台下阿拉伯人的批评并不正确,许多勇敢的阿拉伯活动家已为自己种族的利益奋斗多年,他们当然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什么也没做。

那么我们该如何批评别人呢?正确的批评。不要带有敌意,完全尊重事实,这才是正确的批评之道。我也批评过阿拉伯人,而且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第一次是在三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发言稿里猛烈抨击阿拉伯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行为。我的措辞大概是“是人类文明所不可容忍的”。这比我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组织的批评要严厉,但我知道自己批评得对。

我与阿拉伯人的组织有许多分歧,有些分歧后来公开了。我极端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它所谓的建立一个非宗教民主国家的纲领,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骗局。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建立一个阿拉伯宗教国家并容纳犹太教,但绝不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我就此写过文章,发表过演说。二十五年前,我与我的对手在当时的左翼期刊《社会主义革命》里有过交锋,现在那家杂志已改名为《社会主义评论》。<sup>⑧</sup>

与我交锋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用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们俩心照不宣,除此之外,在一些书中我们也有交锋,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对抗,我们仍然是朋友,只

是在某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罢了。相互批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您是否会同您通常不与之交往的人或组织结为战术性的盟友？

我觉得为某个问题结盟没什么不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不会参加纳粹组织。同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在其他方面有很大不同是正常的。举例来说，有几年时间，只有一家刊物一直在刊登我的文章，那是一家右翼自由派杂志叫《询问》，可能是由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资助的。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和利益，我与编辑还是私人朋友。同时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巨大分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不应该在那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知道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因而不会过度自信。分歧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了。你只能自己做出选择，但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

所以您不会赞成拉尔夫·纳德对您的批评，即您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一起共同反对世贸组织和中国贸易法案，是吗？

我不会。如果与上面是同一种情况。你说和他一起指的是什么意思？

和他持相同的言论……

那不相干,许多年前托洛茨基在批评斯大林主义时用了与法西斯分子同样的措辞,因而被指控为一个法西斯分子。只要批评得对,即使有人的批评言论与你一样也该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不存在谁和谁在一起的问题。但如果你是指与他人形成一个组织,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来谈谈教育问题吧。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是著名的巴西教育家。他的重要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问世已近三十年。他曾说道:“不参与强弱之争并不是中立,这等同于支持强者。”<sup>⑨</sup>

我完全同意,并希望人们接受这条不言自明的真理。弗莱雷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撰写《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时,正值巴西和拉美的教会反思过去,开展“给穷人更好的选择”(the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的活动之际。它们认识到自己过去一直都是压迫者的帮凶,而要改变自己过去的行为仅仅保持中立是不够的,还要投身于广大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奋斗事业。

活动的一部分是唤醒人民心中的意识,弗莱雷在他的教育学著作中生动地讲述了这个问题。牧师、修女和工人们构成了活动的主体,他们读着《福音书》并思考着书中所讲内容对他们生活的现实意义。他们组织了起来,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我认为那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目前,美国教育界正进行着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改革”一词经常被提及。

“改革”是一个应当慎用的词,它是个奥威尔式的术语。强势一方支持的改变才被叫做改革。比如说,波尔布特给柬埔寨带来了许多改变,可美国不把那称为改革,因为美国不支持那种改变。打着教育改革的旗号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积极的事物,我们还应当客观地评价它,许多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毁灭性的。

阿尔菲·柯恩(Alfie Kohn)的著作《不要竞赛:对竞争的控诉》(*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sup>⑩</sup>出版后,您对该书予以了好评。足球教练文斯·隆巴尔迪(Vince Lombardi)曾说:“胜利不是一切,而是惟一。”这样的思想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足球场上的球员全都这样,那球赛就会变得很低俗,而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那将是文明的倒退。我来给你讲一件事:我有一个孙子是个体育迷。一次他告诉我他很沮丧,因为有他参加的一场球赛被取消了。那是一群7岁大的小孩组织的一次垒球赛。这原本是件好事,但由于对方有些队员没到场因而人数不够,尽管他们一方有多余的球员,比赛还是不得不取消。

孩子们都很失望,可他们没有采用一个十分明显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让一方多出的队员加入另一方,这样比赛仍能进行。让那支混合

球队的队员上场击球,他们仍可以玩得开心。但在他们看来这就不能成为一场比赛了,因为这样一来一支队伍中就有了其他队伍的球员,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对比赛竞争的崇拜到了荒谬的地步。

如果这样的意识进入了生活的其他部分,那将是非常有害的。人类的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同情、团结和互助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把“胜利就是全部的思想”演绎到极致,那一个家庭里最强壮的成员就会把所有食物都吃掉。这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行为。

有人说竞争不仅是人类的本性,它还塑造了人类的性格。您对此作何评价?

它塑造了人类争强好胜的性格。那么说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对不对呢?首先我们得明白,说任何性格是人类的天性都没有根据,因为人类对此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猜测所有的性格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我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善恶两面,要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人的天性里包含各种各样的性格,没有理由说人一出生时就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性格要素。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性格部分反映了他的天性,同时也反映了他成长环境的影响。我相信一定的社会环境能让竞争来主宰人的天性。

但那种状况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比如说需要市场制度作为刺激人的竞争性的环境。但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他六十年前

左右出版的经典著作中指出,人类社会中自发产生那种环境的情况并不多,那需要强力推动才能产生。<sup>①</sup>

教育体系很大部分是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的,你在考试中超过了其他学生并且名列前茅,就会得到老师的表扬。

是这样的,可是这是一种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对个人也非常有害。教育中当然不需要这种训练方法。

它怎样对个人构成了危害?

通过这种训练,学生不会去欣赏他人的成就,而是喜欢看到别人被击败或压倒。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我不会去欣赏他的琴艺,反而会因为自己不是小提琴家而嫉妒他,甚至想去摔了他的琴。这种体制把人变成了魔鬼,它十分有害,而且是毫无必要的。在这方面我的经历便很具有代表性。

很难想象在时时刻刻都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学生们是如何应付的。我12岁前的学生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竞争,我从不知道自己是个好学生,也没有任何竞争的概念,那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上高中之后,我跳了班而其他同学没有,我也并没有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大家都被鼓励做得尽可能好,别人成功时为他庆祝,别人落后了去帮助他们迎头赶上。直到上了高中我才真正知道竞

争升级的概念,而学校教育水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倒退的。

我教育经历的最后四十五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的,在那里进行的学习是没有竞争的。在研究生院科学系里,学生仍须打分,但那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大家在一起学习和研究,你无须一定要超过他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你想进行研究探索,那么大家就一起来钻研。这无疑是最积极的教育或科研方式。

如果在学生时代形成了要当第一的竞争观念,那么,等到开始工作后再想改变这种观念,几乎就不太可能了。

也许吧,可如果真是那样就太糟了,因为工作应该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再以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为例,我深知也曾经亲眼目睹,如果没有合作,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其结局都将是毁灭性的。因为不通过合作就不可能完成课题。更好的一种结果就是不要发生上述的这些情况。由于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大家反而可以团结合作,也不会有谁会去处心积虑地破坏他人的实验。

如果是在别的环境里呢?比如在汽车厂里,老板要求你这星期多工作8小时,作为回报,他会给你涨100美元的工资,并额外给你一星期假。

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跟其他人的利益无关。这个问题涉及到



生存在一个非人性的制度下你如何去应对。在这种制度下,别人控制着你,你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服从,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这像是在监狱里,而不是在一个文明社会。在这里别人用一套赏罚制度控制着你,你会问自己该如何去适应这种环境。但你应该明白这与竞争无关,除非你做得好其他人就要受罚。

您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官方的解密文件。《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央情报局 1953 年关于伊朗政变的部分报告。那场政变推翻了民选的穆罕默德·莫撒德(Mohammed Mossadegh)政府,使王权复辟。<sup>⑫</sup>您看了这则报告后如何分析判断里面哪些是多余的成分,哪些是歪曲的成分,此外还有哪些是捏造的成分?

如果这里面有编造的成分,那应当是类似官僚体系里的编造,目的是迎合上级,将那些上级爱听的内容上报。在基层将情况逐级报到决策层时肯定会发生这样的捏造,所以我们在读官方文件时必须注意辨别这些成分,在一些实例报道中,我们通过从基层至高层的证据链(chain of evidence)能发现这一点。这就是越战时美国政府总是弄不清战场上发生了什么的原因——信息在基层产生时是准确的,可当它经过逐级歪曲被传到中央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当你在阅读官方文件时,你一定希望能够发现其中被歪曲的部分。但我怀疑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有意识的歪曲,当然那种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很高程度的无意识的思想

控制,它来自于人们的信念。在解密的文件里能找到这样的典型例子。最惊人的是《五角大楼文件》里有关越战的大量资料,这些文件本来是不准备公开的,所以这里公开的报告并不是正常的政府文件解密。《五角大楼文件》里常包含有征服别国和获取别国档案的记录,这导致了大量其他文件的公开,通过它们我们能了解许多内部情况。

《五角大楼文件》里最有趣的也许就是情报记录及这些记录反映的政府的倾向,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还没有被讨论过。

这方面我已有详细的论述,简单地说是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支持越南的民族主义,无疑就是指支持胡志明。文件里说得很露骨:美国面临的选择是支持越南的民族主义或支持法国。大概在1950年,政府决定支持法国。于是情报部门获令立即散布消息:美国的敌人——不再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越共——是中国或俄国在越南的代理人(具体是谁的代理并不重要)。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情报部门一直在试图完成这项任务,这个过程有些戏剧性。有人还在越南驻曼谷大使馆发现了前苏联《真理报》的一份拷贝。经过几年后他们还是决定放弃这项证据,因为它实在难以证明越南与中国或俄罗斯之间有什么关联。那就是情报部门在东南亚有所“收获”的惟一一次行动,泰国也是他们找到“证据”的惟一一个国家。

可就在那个时候,华盛顿下了定论,认为那份报纸就证明了胡志明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忠实奴才,忠实到都不用他们下命令就主动追随。从那以后,情报部门就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

越南也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就算它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奴才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可从那以后就再没人提过这个问题,或者准确地说有那么一份助理报告提到了,但该报告却并没有被提交给高层。

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情报记录。没有人去理会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越南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会简单地去听命于他人),大家都在欺骗自己,就像得了集体精神错乱。要知道这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核心,它们的任务不是取悦高层,而是告诉决策者准确的情况。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并不是惟一的。所以当你阅读内部文件时一定要看透其中的歪曲现象,那是官僚系统迫不得已采纳的思维方式,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样。

另外,在官方文件中很多事实都被隐瞒了,我就曾被愚弄过。那是政府关于1958年印尼起义的记录,那次行动的目的是将印尼的外围群岛分离出去。我曾经认为美国一定卷入其中了,而且有相关的证据:当时有一架美军飞机在当地被击落坠毁。可令我吃惊的是官方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似乎没有卷入进去。后来东南亚奖学基金(Southeast Asian scholarship)的创始人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和奥德丽·卡欣(Audrey Kahin)利用他们在印尼军队中的关系发现,美国不仅卷入了那场战争,而且那可能还是美国在战后主要的一次秘密行动。他们将这一发现写进了《颠覆作为外交政策》(*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sup>⑬</sup>一书中。显然官方文件隐瞒了事实真相。

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发生了一些令人关注的事件。当时的官方文件应当在里根当政时期解密公开,可里根政府却拒绝公开大量

有关伊朗和危地马拉问题的档案资料,甚至可能已经将部分文件销毁了。

在《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关于伊朗的报道里,行政当局业已承认了这一点。

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国务院历史学家委员会是由一些十分保守的大学历史教授组成的学术团体。这些人在负责监督解密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肆无忌惮,后来,在人们纷纷抗议里根政府销毁 50 年代早期的档案资料时,他们均被迫辞职。但是我们却永远都无法了解当时发生的事了,而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学家尼克·卡拉瑟(Nick Cullather)曾写过一本关于危地马拉的书<sup>④</sup>。他在中情局工作时以为自己看到了全部有关记录,后来他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材料被有意销毁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它们。所以关于伊朗的文件只是一面之词,没有揭露任何实情,我只是出于好奇才收集了部分资料,但却从未从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有人常问我,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么好?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准备,您却举出了那么多的事实,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我倒是经常为自己的健忘而苦恼。当读到自己二三十年前写的

东西时,我对自己说,天哪!我怎么都忘了?事实上,我的真实情况与你所说的正相反。

您对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红袜(Boston Red Sox)棒球队还有什么计划?

我马上要和我的孙子一同去红袜公园,我们每年都要出来感受一下身边的世界。其他的事我还没想过。

您有没有想过退休?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 第一章

- ① Noam Chomsky, "Domestic Constituencies," *Z Magazine* 11: 5 (May 1998), p. 18.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chomskymay98.htm>.
- ②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 *A Guide to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New York: USCIB, 1996).
- ③ Glenn Burkins, "Labor Fights Against Fast-Track Trade Measur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1997, p. A24.
- ④ Anne Swardson, "Global Investment Accord Put on Hold,"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1998, p. C13. See also Fred Hiatt, "Foreign Affairs in Annapolis,"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1998, p. A25.
- ⑤ Jane Bussey, "New Rules Could Guid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iami Herald*, July 20, 1997. See also the references in Noam Chomsky, "The Ultimate Weapon," in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p. 129 - 55.
- ⑥ Paul Magnusson, with Stephen Baker, "The Explosive Trade Deal You've Never Heard Of," *Business Week* 3564 (February 9, 1998), p. 51.
- ⑦ Burkins, "Labor Fights Against Fast-Track Trade Measur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1997.

- ⑧ Archdiocese of Guatemala Human Rights Office, *Guatemala: Never Agai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9).
- ⑨ Lou Cannon, "Reagan Praises Guatemalan Military Leade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1982, p. A1.
- ⑩ Associated Press, "Guatemalan Questioned in Bishop's Death," *New York Times*, May 1, 1998, p. A5.
- ⑪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second edition forthcoming), pp. 37 - 86.
- ⑫ 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1), p. 75.
- ⑬ Michael Prowse, "World Bank/IMF Meeting: Theorising on an Eastern Promise: An Attempt to Explain East Asia's Dynamic Growth,"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7, 1993, p. 3.
- ⑭ David E. Sanger, "America Is Prosperous and Smug, Like Japan Was,"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98, p. 4: 1.
- ⑮ Sylvia Nasar, "Chaos Theory: Unlearning the Lessons of Econ 101," *New York Times*, May 3, 1998, p. 4: 1.
- ⑯ 艾伦·格林斯潘在1997年2月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格林斯潘说，“持续的经济扩张”是源于“对增加报酬的反常抑制，而这看来主要是工人更加缺乏安全感的结果”。



- ⑰ See Doug Henwood, "Miscellany," *Left Business Observer* 91 (August 31, 1999), p. 8. See also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s biannual book series,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 ⑱ Louis Uchitelle, "Second Thoughts about Being Better Off: The Rehabilitation of Morning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97, p. 4: 1.
- ⑲ Quoted in Uchitelle, "Second Thoughts about Being Better Off,"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97.
- ⑳ See Editorial, "America's Bubble Economy," *The Economist*, April 18, 1998, p. 16; "America Bubbles Over," *The Economist*, April 18, 1998, p. 67; Editorial, "Bubble and Squeak," *The Economist*, May 9, 1998, p. 17; and "Hubble, Bubble, Inflation Trouble?" *The Economist*, May 9, 1998, p. 78.
- ㉑ Doug Henwood, *Wall Street: How It Works and For Whom* (New York: Verso, 1998).
- ㉒ Chris Black, "Cohen Vows Swift Strike if Iraq Bars Inspections," *Boston Globe*, March 5, 1998, p. A1. See Brett Mahoney and Asha Blake, "Foreign Policy Team Tries to Sell Iraqi Policy," ABC, *World News This Morning*, February 19, 1998.
- ㉓ Alan Greenspan,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Washington, DC, April 2, 1998. See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p. 192 – 98 and notes.
- ②④ Joshua Cooper Ramo and Debra Rosenberg, “The Puzzle of Genius,” *Newsweek*, June 28, 1993, pp. 46ff.
- ②⑤ Walter Lippmann, *The Essential Lippmann: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Liberal Democracy*, ed. Clinton Rossiter and James L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See 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pp. 367 – 68.
- ②⑥ Robert W. McChesney, “On Media, Politics, and the Left, Part 1: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Against the Current* 10: 1 (March-April 1995), pp. 27 – 32, and “On Media, Politics, and Ourselves: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Part 2,” *Against the Current* 10: 2 (May-June 1995), pp. 21 – 25.

## 第二章

- ① Editorial, “A Just Attack,” *Boston Globe*, December 17, 1998, p. A30. See Noam Chomsky, “US Iraq Policy: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in *Iraq Under Siege: The Deadly Impact of Sanctions and War*, ed. Anthony Arnove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p. 47 – 56.
- ② David Frost, interview with General H. Norman Schwarzkopf, “Sizing Up Iraq,” *USA Today*, March 27, 1991, p. 11A. See

- also Russell Watson et al., "The Gulf: After the War," *Newsweek*, April 8, 1991, pp. 18ff.
- ③ Thomas L. Friedman, "A Rising Sense That Iraq's Hussein Must Go,"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91, p. 4: 1.
- ④ Associated Press, "US General Criticizes Policy on Destabilizing Hussein," *Boston Globe*, January 29, 1999, p. A17, and Philip Shenon, "U. S. General Warns of Dangers of Trying to Topple Iraq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99, p. A3.
- ⑤ Noam 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expanded edi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1), pp. 113 - 49.
- ⑥ Tim Weiner, "The Man Who Protects America from Terroris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99, p. A3.
- ⑦ Doug Henwood, "Antisocial Insecurity," *Left Business Observer* 87 (December 31, 1998), p. 1.
- ⑧ Leslie Stahl, "Punishing Saddam," produced by Catherine Olian, CBS, *60 Minutes*, May 12, 1996.
- ⑨ Adlai Stevenson, speech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ay 21, 1964. See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second edition forthcoming), pp. 182 - 84.

- ⑩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3, 14 (1963), cited in Lou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olumbia UP, 1979), pp. 333 - 34.
- ⑪ “Council at U. N. Meets on U. S. -Libya Clash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7, 1986, p. A9, and John M. Goshko, “Administration Acts on ‘Self-Defense’ Principle Espoused by Shultz,”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1986, p. A20.
- ⑫ *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ne 27, 1986. See Loren Jenkins, “World Court Says U. S. Violates International Law by Aiding Contras,” *Washington Post*, June 28, 1986, p. A1, and Associated Press, “Court Decries U. S. Actions on Nicaragua,” *Toronto Star*, June 27, 1986, p. A1.
- ⑬ Editorial, “America’s Guilt - Or Default,”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86, p. A22.
- ⑭ Abraham Sofa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ourt*,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Current Policy Series, number 769 (December 1985).
- ⑮ Steven Lee Myers and Barbara Crossette, “Iraq Is Accused of New Rebuffs to U. N. Team,”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8, p. A1.

- ⑩ Editorial, “Babes and Bloodlust,” *Observer*, January 3, 1999, p. 23.
- ⑪ Editorial, “Containing Ame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Nation* (Thailand), January 10, 1999.
- ⑫ Richard Lawrence, “US Will Snub WTO Panel on Anti-Cuba Law,” *Journal of Commerce*, February 21, 1997, p. 1A.
- ⑬ William Preston, Jr., Edward S. Herman, and Herbert I. Schiller, *Hope and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5 - 198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 ⑭ Serge Schmemmann, “The Critics Now Ask: After Missiles, Wh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98, p. A23.
- ⑮ Noam Chomsky, Edward S. Herman, Edward Said, and Howard Zinn, “A Call to Action on Sanctions and the U. S. War Against the People of Iraq.”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CrisesCurEvts/Iraq/callaction.htm>. See also, Noam Chomsky et al., “Sanctions Are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in Arnove ed., *Iraq Under Siege*, pp. 181 - 83. Initial statement drafted by Robert Jensen.
- ⑯ Barbara Crossette, “U. S. Plans to Sharpen Focus of Its Sanctions Against Haiti,”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92, p. A8.

- ②③ John Solomon, "Agency Head Failed to Stop Texaco Leak, Citing Bush Treasury Secretary,"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8, 1994.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Noam Chomsky, "Democracy Restored," *Z Magazine* 7:11(November 1994), pp. 49 - 61.
- ②④ See, for example, Stephen Kinzer, "Many Arabs See Double Standard for Israe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1998, p. A15.
- ②⑤ Noam Chomsky, commentary, National Public Radio, *All Things Considered*, February 22, 1991.
- ②⑥ David E. Sanger, "Real Politics: Why Suharto Is in and Castro Is Ou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95, p. A3.
- ②⑦ Mark Achbar, ed., *Manufacturing Consent: Noam Chomsky and the Media*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pp. 146 -49.
- ②⑧ John Diamond, Associated Press, "U. S. Should Appear 'Irrational, Vindictive,'" *Ottawa Citizen*, March 2, 1998, p. A7.
- ②⑨ David Lamb, "Vietnam Study Finds Dioxin in Food Chain,"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1, 1998, p. A5. See also David Lamb, "Vietnam Ends Silence on Issue of Wartime Exposure to Agent Orang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6, 1998, p. A14.
- ③⑩ Peter Waldman, "Body Count: In Vietnam, the Agony of Birth

Defects Calls an Old War to Mind,”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2, 1997, p. A1.

- ③① Barbara Crossette, “Study of Dioxin’s Effect in Vietnam Is Hampered by Diplomatic Freez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92, p. C4.
- ③② Amnon Kapeliouk, *Yedirot Abronot*, April 1, 7, and 15, 1988.
- ③③ Waldman, “Body Count,”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2, 1997.
- ③④ Lamb, “Vietnam Study Finds Dioxin in Food Chain,”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1, 1998.
- ③⑤ Derek Davies, “The Reg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Yearbook* 1971, p. 38; 1972, pp. 37 – 40.
- ③⑥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77, See also Noam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Vintage, 1973), pp. 31 – 66.
- ③⑦ Barbara Crossette, “Hanoi Said to Vow to Give M. I. A. Dat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92, p. 1:1. See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p. 170 – 72.
- ③⑧ David E. Sanger, “Japan’s Emperor Tells China Only of His ‘Sadness’ on Wa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92, p. 1:1.
- ③⑨ See Crossette, “Hanoi Said to Vow to Give M. I. A. Dat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92, and Jane Gross, "Hanoi Photos Leave Families of U. S. M. I. A. 's Asti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92, p. 1: 2.

- ④⑩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9).
- ④⑪ John W. Powell, "Japan's Germ Warfare: The U. S. Cover-Up of a War Crim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2: 4 (October-December 1980), pp. 2 - 17.
- ④⑫ 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Vintage, 1970), pp. 188 - 258.
- ④⑬ Barry Wain, "The Deadly Legacy of War in Lao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4, 1997, p. 10. See also Simon Ingram, "Laos Struggles to Clear Leftover US Bomb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4, 2001, p. 1.
- ④⑭ Keith Graves, "US Secrecy Puts Bomb Disposal Team in Danger," *Sunday Telegraph*, January 4, 1998, p. 20. See also W. F. Deedes, "Nation Tied to the Land Learns to Live with Deadly Harvest,"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14, 1997, p. 14.
- ④⑮ Reuters, "French to Clear Unearthed Mines," *Peacework* 291 (December 1998-January 1999), p. 7.
- ④⑯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68th Annual Report*, June

- 8, 1998, Basle, Switzerland. Cited in Chakravarthi Raghavan, "Globalization Not Without Risks, Says BIS," *Third World Economics* (June 16-July 15, 1998).
- ④⑦ Jeffrey Sach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110 (Spring 1998), pp. 97 - 112. See also Robin Hahnel, *Panic Rul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9).
- ④⑧ David Felix, "Asia and the Crisi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Dean Baker, Gerald A.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 ④⑨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78: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 56 - 74.
- ⑤⑩ Randolph E. Schmid, "U. S. Drivers Absorb Cost of Bad Roads in Cities," Associated Press,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7, 1997.
- ⑤⑪ Dom Hélder Câmara, *Revolution Through Peace*, trans. Amparo McLe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⑤⑫ Alan Cowell, "Annan Fears Backlash Over Global Crisi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99, p. A14.
- ⑤⑬ Sarah Delaney, "Peace Can Be Won Through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Pope Say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1999, p. A20,

and John Tagliabue, "Looking Back at 20th Century, Pope Says Respecting Human Dignity Is the Key to World Peac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99, p. A4.

- ⑤ Noam Chomsky, "Market Democracy in a Neoliberal Order: Doctrines and Reality," Davie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May 1997.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chomksydavie.htm>. See also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p. 89 - 118.

### 第三章

- ①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p. 18. Fyo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 ② Quoted in Michael Sheldon, *Orwell: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p. 367.
- ③ Noam Chomsky, *Turning the Tide: U. 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5), p. 9. Ignazio Silone, *Fontamara*, trans.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London: Redwords, 1994), p. 32.
- ④ See Human Rights Watch, *Limits of Toleranc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Public Debate in Chile* (Washington, DC: Human Rights Watch, 1998). On-line at <http://www.hrw.org/reports98/chile/>.

- ⑤ Kimmo Kiljunen, ed. , *Kampuchea: Decade of Genocide: Report of the Finnish Inquiry Commission* (London: Zed, 1984).
- ⑥ Richard S. Ehrlich, “Ponchaud’s Warning on Cambodia’s Future,” *Cambodia Today*, July 14, 1997.
- ⑦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second edition forthcoming) , pp. 260-96.
- ⑧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1975 - 198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p. 17.
- ⑨ Seth Mydans, “A Tale of a Cambodian Woman: Assigning the Guilt for Genocid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9, p. A1.
- ⑩ John Holdridg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7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September 14, 1982, p. 71.
- ⑪ See John Pilger’s articles, “The Monster We Created,” *Observer*, April 19, 1998, p. 19; “In the Service of a Murderer,” *Guardian*, October 16, 1990; and *New Statesman*, November 2, 1984.

- ⑫ Alexander Cockburn and Ken Silverstein, "Was Carter Worse?" *CounterPunch* 6:1 (January 1 - 15, 1999), p. 2.
- ⑬ Deborah Sontag, "Orthodox Confront U. S. Reform Rabbis at Western Wal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99, p. A3.
- ⑭ Sontag, "Orthodox Confront U. S. Reform Rabbis at Western Wal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99.
- ⑮ See David Barsamian, *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 ⑯ Jack Katzenell, "State Says Israel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on Torture Issue,"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3, 1999.
- ⑰ Amnesty International, *Newsletter* (September 1977). See 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G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p. 454 n5.
- ⑱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s reports on to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line at <http://www.amnesty-usa.org/>.
- ⑲ 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Classics, 1999).
- ⑳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p. 560. Bill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ociety Since 1800*, second ed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 270.

- ②① David Bar-Illan, interview with Victor Cygielman,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3:3 - 4 (Summer-Autumn 1996), p. 14.
- ②② Noam Chomsk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Palestine," *New Outlook* (Israel) (November-December 1969). Reprinted in Noam Chomsky,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Reflections on Justice and Nationhoo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p. 49 - 92.
- ②③ Meron Benvenisti, *Intimate Enemies: Jews and Arabs in a Shared 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②④ See Azmi Bishara, "Where Suicide Bombs Come Fro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95, p. A31.
- ②⑤ Edward W. Said, "The One-State S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0, 1999, p. 6: 36ff. Or see Edward W. Said,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0), pp. 312 - 21.
- ②⑥ Bob Edwards, interview with James Glassman, NPR, *Morning Edition*, January 21, 1999. Peter Jennings, "No Easy Way to Save Social Security," ABC, *World News Tonight*, December 8, 1998.
- ②⑦ Frank Ackerman, *Hazardous to Our Wealth: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80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 ⑳ Richard B. Du Boff, “Social Security Is Not in ‘Crisis,’” National Jobs for All Coalition *Uncommon Sense* 21 (February 1999).
- ㉑ See Dean Baker and Mark Weisbrot, *Social Security: The Phony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See also <http://www.cepr.net/> for additional publications.
- ㉒ David E. Rosenbaum, “Social Security on Wall Stree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1999, p. 4:3.
- ㉓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 Nation at Risk: The Full Account* (Cambridge: USA Research, 1984). See David C. Berliner and Bruce J. Biddle, *The Manufactured Crisis: Myths, Fraud, and the Attack on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5).
- ㉔ Robert Pear, “Americans Lacking Health Insurance Put at 16 Percen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98, p. A1.
- ㉕ *Boston Globe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87, cited by Jules Lobel in Jules Lobel, ed., *A Less Than Perfect Un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U. S. Constit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p. 3.
- ㉖ See Chapter 1.



## 第四章

- ① Noam Chomsky, "Why Americans Should Care About East Timor," MoJo Wire, August 26, 1999. On-line at [http://www.motherjones.com/east\\_timor/comment/chomsky.html](http://www.motherjones.com/east_timor/comment/chomsky.html).
- ② Philip Shenon, "Clinton Welcomes Suharto's Exit But Says Indonesia Still Needs 'A Real Democratic Change,'"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98, p. A8, and Andrew Higgins and Mark Tran, "US Pulls Plug on Suharto After Army Clears Streets," *Guardian*, May 21, 1998, p. 2.
- ③ Arnold S. Kohen, "Beyond the Vote: The World Must Remain Vigilant Over East Timo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5, 1999, p. B1, and Philip Shenon, "Timorese Bishop Is Calling for War Crimes Tribunal,"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99, p. A6. See also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p. 51 - 61, and Noam Chomsky,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New York: Verso, 2001), pp. 48 - 93.
- ④ Seth Mydans, "The Timor Enigm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1999, p. A12.
- ⑤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with Suzanne Weaver, *A Dangerous Pla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p. 247.

- ⑥ Ted Bardacke and James Kynge, "China Lashes Out at US 'Gunboat Diplomac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4, 1999, p. 4.

## 第五章

- ① Andrew Simms, "Unctad Offers Way Forward for Talks on World Trade," *Guardian Weekly* (Manchester), February 23, 2000, p. 12.
- ② Susan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127.
- ③ See the articles on-line at <http://www.twinside.org.sg/unctad.htm> and <http://www.twinside.org.sg/title/focus15.htm>.
- ④ Martin Wolf, "The Curse of Global Inequalit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6, 2000, p. 23.
- ⑤ Thomas L. Friedman, "Senseless in Seattl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99, p. A23.
- ⑥ Doug Henwood, "Miscellany," *Left Business Observer* 91 (August 31, 1999), p. 8. See also [http://www.panix.com/~dhenwood/Gini\\_supplement.html](http://www.panix.com/~dhenwood/Gini_supplement.html) and [http://www.panix.com/~dhenwood/Wealth\\_distrib.html](http://www.panix.com/~dhenwood/Wealth_distrib.html).
- ⑦ Patricia Adams, *Odious Debts: Loose Lending, Corruption, and*

*the Third World's Environmental Legacy* (Toronto: Earthscan, 1991). See also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p. 82 - 92 and 101 - 107.

- ⑧ Karin Lissakers, *Banks, Borrow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A Revisionist Accou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bt Cri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 ⑨ Michael Elliott et al. , "The New Radicals," *Newsweek*, December 13, 1999, p. 36ff. See sidebar on "The New Anarchism. "
- ⑩ Lynda Gorov, "Seattle Caught Unprepared for Anarchists,"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1999, p. A11.
- ⑪ Interview, Boulder, Colorado, October 3, 1996.
- ⑫ Andrew Pollack, "Talks on Biotech Food Today in Montreal Will See U. S. Isolat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00, p. A10.
- ⑬ Edward S. Herman, "Corporate Junk Science in the Media," Z Net. On-line at <http://www.zmag.org/ScienceWars/junk3.htm>.
- ⑭ See Dean Baker, "The High Cost of Protectionism: The C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im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1996, and Dean Baker, "The Real Drug Crisis," *In These Times*, August 22, 1999, p. 19.
- ⑮ 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orker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p. 109. Cited in Jerome Levins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 Flawed Architecture," *Fletcher Forum* 23:1 (Winter-Spring 1999), pp. 1 - 56. Additional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s* are online at <http://www.worldbank.org/wdr/>.

- ⑩ Norman Solomon, "What Happened to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Z Magazine* 13:2 (February 2000), pp. 11 - 13.
- ⑪ See Anthony Lewis, "It Tolls for The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7, p. A15.
- ⑫ Martha Honey and Tom Barry, eds., *Global Focus: U. S. Foreign Polic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第六章

- ① T-Bone Slim, *Juice Is Stranger Than Fric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T-Bone Slim*, ed. Franklin Rosemont (Chicago: Charles H. Kerr Publishing, 1992).
- ② Sean D. Murph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 ③ See Noam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1969), Chapter 2.

- ④ David Schmi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scist Italy, 1922 - 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Schmitz, *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21 - 196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John P.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2). See also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6), pp. 37 - 44.
- ⑤ See references from note 4 above.
- ⑥ See 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pp. 37 - 45.
- ⑦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63: American Republics*, vol. 1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 ⑧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63*. See also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p. 63 - 87.
- ⑨ 这段引文不知出自何处,它最早出现于 *Time*, November 15, 1948,此后经常被反复引用,有时是在提到 Somoza 的时候,有时是在提到 Trujillo 的时候。参见 Schmitz, *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p. 313.

- ⑩ Cited in *New Internationalist* 314 (July 1999).
- ⑪ See Alex Carey, *Taking the Risk Out of Democracy: Corporate Propaganda Versus Freedom and Liberty*, ed. Andrew Lohre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Noam Chomsk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reprinted in 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pp. 60 - 85;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2; and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Chapter 4.
- ⑫ Edward L.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 Liveright, 1928).
- ⑬ Walter Lippmann, *The Essential Lippmann: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Liberal Democracy*, ed. Clinton Rossiter and James L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 ⑭ Michael J.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The Search for a Just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78: 3 (May-June 1999), pp. 2 - 7.
- ⑮ Noam Chomsky,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New York: Verso, 2001), pp. 48 - 93.
- ⑯ Chomsky,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pp. 94 - 147,

especially 109 – 12.

- ⑰ See references in Chapter 4, note 3.
- ⑱ Jan Mayman, “Ethnic Conflict — Fighting for Surviva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4, 2000, p. 34.
- ⑲ Peter Hartcher, “The ABC of Winning US Support,”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eptember 13, 1999.
- ⑳ John M. Miller, “Indonesian General Sued in U. S. Court,” *East Timor Estafeta* 6:1 (Spring 2000), p. 3. *Estafeta* is published by East Timor Action Network and is on-line at <http://www.etan.org>.
- ㉑ William Cohen, “Turkey’s Importance to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of Defense Briefing, Washington, DC, March 31, 2000, Federal News Service. See Chomsky,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p. 16.
- ㉒ See Steve Biko, *I Write What I Like: 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 ed. Aelred Stubbs (Randburg, South Africa: Ravan Press, 1996).
- ㉓ Barry Feinberg and Ronald Kasrils, *Betrand Russell’s America 1945 – 1970*, vol. 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 ㉔ Margaret Ramirez, “Salvadorans Honor Slain Archbishop,”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9, 2000, p. B3.
- ㉕ Václav Havel, “Upheaval in the East,”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2, 1990, p. A 14.
- ②⑥ Anthony Lewis, "Out of This Nettl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90, p. A33.
- ②⑦ Barry Bearak, "Pakistanis Are Uneasy Over Clinton's Visit,"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00, p. A4.
- ②⑧ John J. Mearsheimer, "India Needs the Bomb,"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00, p. A21.
- ②⑨ Se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56: 2 (March-April 2000), pp. 22 - 41.
- ③⑩ Tariq Ali, "The Panic Button," *Guardian*, October 14, 1999, p. 21.
- ③⑪ Marc L. Miringoff and Marque-Luisa Miringoff, *The Social Health of the Nation: How America Is Really Doing*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 ③⑫ Bretton Woods Commission, *Bretton Wood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Bretton Woods Commission, 1994). See Martin Wolf, "Bretton Woods at an Awkward Ag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7, 1994, p. 19, and Michael Prowse, "IMF and World Bank 'Must Adapt to New Global Financial Landscape,'" *Financial Times*, July 7, 1994, p. 5.
- ③⑬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Geneva: UNCTAD, 1999). For a review, see Chakravarthi Raghavan,

*Third World Economics*, November 1 - 15, 1999. See also John Eatwell and Lance Taylor, *Global Finance at Risk: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p. 295, estimating a decline of growth rates to two-thirds below the pre-reform period.

- ③④ Henry Tricks, "Latin America No Better Off Now, Says World Bank,"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4, 2000, p. 5. See also Richard Lapper, "Policymakers Focus on the Region's Poor," *Financial Times*, Latin American Finance Survey, March 24, 2000, p. 2.
- ③⑤ See David Felix, "Asia and the Crisi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Dean Baker, Gerald A.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and Felix, "IMF Bailouts and Global Financial Flow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3: 5 (April 1998). See also Eatwell and Taylor, *Global Finance at Risk*.
- ③⑥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P, 2000). On-line at <http://www.undp.org/hdro/>.
- ③⑦ Amartya Sen, "Indian Development: Lessons and Non-Lessons,"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18: 4 (Fall 1989), pp. 369 - 92.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P, 1989);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eds., *The Amartya Sen and Jean Drèze Omnibus: Comprising Poverty and Famines,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and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Jean Drèze, Amartya Sen, and Athar Hussai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and references in Noam Chomsky,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pp. 237 - 38 n4 - 12.

- ③⑧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
- ③⑨ Alan Ryan, "The Evil Empir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2, 2000, p. 7: 12. John F. Burns, "Methods of the Great Leade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February 27, 2000, p. 7: 6.
- ④⑩ See books cited in note 37 above.
- ④⑪ Gerald K. Haine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razil: A Study of U. S. Cold War Diplomacy in the Third World, 1945 - 1954*

-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Books, 1989). See also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7.
- ④② See pp. 80 – 81 and 159 – 62 above.
- ④③ Arundhati Roy,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and Arundhati Roy, *The Cost of Living*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9).
- ④④ Amy Dockser Marcus, “Class Struggle: MIT Students, Lured to New Tech Firms, Get Caught in a Bind,”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1999, p. A1.
- ④⑤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 ④⑥ 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 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Press Release, “U. S. Policy in Colombia: Towards a Vietnam Quagmire,” March 7, 2000. Editorial, “Dangerous Plans for Colombi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0, p. 4:16.
- ④⑦ Associated Press, “5 More Die in Bolivia Protests After Emergency Is Declar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0, p. A3. Fo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see Chomsky, *Rogue States*, pp. 77 – 78.
- ④⑧ Kirk Semple, “Antidrug Efforts Sowing Fear in Colombia,” *Boston Globe*, April 10, 2000, p. A1.
- ④⑨ Human Rights Watch, “The Ties That Bind: Colombia and

Military-Paramilitary Links,” *Human Rights Watch* 12: 1 (February 2000).

- ⑤⑩ Michael McClintock, “American Doctrine and Counterinsurgent State Terror,” in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ed. Alexander Geor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39, and 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U. S. Guerrilla Warfare,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unter-terrorism, 1940 - 199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p. 222. See also Chomsky, *Rogue States*, pp. 62 - 81.
- ⑤⑪ See Derrick Z. Jackson, “Study Strikes a Blow Against Mandatory Sentencing for Drug Crimes,” *Boston Globe*, May 14, 1997, p. A15, and John Donnelly, “Narcotics Bill Reopens Drug War Debate,” *Boston Globe*, April 1, 2000, p. A2.
- ⑤⑫ See John Robson, “Tell It to the Judge ... If He Doesn’t Eat You First,” *Ottawa Citizen*, June 2, 1999, p. A17.
- ⑤⑬ Robert M. Hayden, “Biased ‘Justice,’ Humanright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47: 4 (1999), pp. 549 - 74. A version of the report is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ics.si.edu/ees/reports/2000/191hay.htm>.
- ⑤⑭ See Naseer H. Aruri, ed., *Palestinian Refugees: The Right of Retur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回归权”大会 2000 年 4 月

8 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波士顿大学举行。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可从互联网上获得,网址是 <http://www.tari.org/>。

- ⑤⑤ Deborah Sontag, "Israel Is Slowly Shedding Harsh Treatment of Arabs,"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00, p. A1.
- ⑤⑥ Anthony Lewis, "A Light Unto the Natio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99, p. A23.
- ⑤⑦ Hussein Ibish, "They Still Have Their Rights," *Boston Globe*, April 8, 2000, p. A11. A. B. Yehoshua, "They Exiled Themselves," *Boston Globe*, April 8, 2000, p. A11.
- ⑤⑧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 ⑤⑨ See Phil Reeves, "Teddy Katz, Justice Campaigner: The Man, the Massacre, and Israel's Secrets," *Independent* (London), January 29, 2000, p. 19. Katz 后来被以诽谤罪起诉,他声称自己被迫收回了控诉。他被剥夺了在法庭上重新申诉的权力。Ilan Pappé 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将详细提供关于这次屠杀的有力证据,该证据来源于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方面的直接证词。

## 第七章

- ① Eli Schuster, "Noam Chomsky: A Degree Too Far," *Globe and Mail*, April 18, 2000, p. A 17. Peter Hellman, "A Dishonorable

Honorary Degre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1999, p. A22.

- ② See Chapter 6.
- ③ T-Bone Slim, *Juice Is Stranger Than Fric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T-Bone Slim*, ed. Franklin Rosemont (Chicago: Charles H. Kerr Publishing, 1992).
- ④ See 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and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 ⑤ George Orwel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61), pp. 353–67, especially p. 363.
- ⑥ Michael Weisskopf and David Maraniss, “Republican Leaders Win Battle by Defining Terms of Comba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1995, p. A1. Knight-Ridder/Tribune, “GOP Pollster Never Measured Popularity of ‘Contract,’ Only Slogans,”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2, 1995, p. 11. See also Elizabeth Kolbert, “Shifting Public Opinion by the Turn of a Phrase,”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95, p. A1, and “On the Other Hand: Framing the Question,” graph, p. B6.
- ⑦ Yosef Grodzinsky, *Chomer Enoshi Tov* [Good Human Material] (Tel Aviv, Israel: Hed Artzi, 1998).
- ⑧ See Noam Chomsky,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Socialist*



Revolution 24 (June 1975), pp. 45 - 86 and 133 - 141. See also the Introduction, pp. 4 - 6.

- ⑨ Paulo Freire,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trans. Donald Macedo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5), p. 102. See also Paulo Freire,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 ⑩ 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revise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 ⑪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⑫ James Risen, "Secrets of History: The C. I. A. in Iran — A Special Report,"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0, p. 1: 3.
- ⑬ Audrey R. and George McT.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 ⑭ Nick Cullather, *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 - 1954*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9).